

#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 目 录

### 专 论

- 3 张德广  
上海合作组织：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
- 11 B. 努尔加利耶夫  
中俄关系：战略基础与发展趋势

### 专题文稿·转型反思

- 14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1989-2029 年大转型  
——可以更好或将会更好吗？
- 29 余南平 李 享 吴皓伟 梁 菁  
金融危机下中东欧转型模式再评估
- 55 徐坡岭 张鲁平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经济走势分析及特点

### 欧亚·斯拉夫

- 68 冯绍雷  
从俄格冲突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危机政治经济学”——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87 高 歌  
科索沃政治发展：从托管到“独立”

### 历史·文化

- 97 林精华  
俄罗斯问题的西方表述  
——关于欧美俄苏研究导论
- 124 刘亚丁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对中国智者形象的建构
- 135 于 璐 辑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封面设计：王 洪

###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9 年 6 月 23 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09 年第 3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 *Чжан Дэгуан*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нов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и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с новыми вызовами..... (3)

### *Б. К. Нургалиев*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ов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новые способы их разрешения..... (11)

### *Гжегож В. Колодко*

Великий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1989-2029 годов  
Могло ли это быть лучше? Будет ли лучше? ..... (14)

### *Ю Наньпин, Лм Сян, У Хаовэй, Лян Цзин*

Переоценка модел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условиях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29)

### *Сю Полин, Чжан Лупин*

Анализ тенденц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условия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55)

### *Фэн Шаолэй*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кризиса»: от российско–груз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до миров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 Изменения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давшие Китаю повод для размышлений ..... (68)

### *Гао Гэ*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Косово: от опеки к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87)

### *Линь Цзинхуа*

Формулирование Западом проблем России — Вве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Европе и Америке.....(97)

### *Лю Ядин*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Россией образа китай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 в 90-е годы 20 века .....(124)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09 年第 3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 *Zhang Deguang*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Grasp new Opportunities and face new Challenges ..... (3)

### *Bolat Nurgaliev*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New Problems and New Methods ..... (11)

### *Grzegorz W. Kolodko*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89–2029  
Could It Have Been Better? Will It Be Better? ..... (14)

### *Yu Nanping, Li Xiang, Wu Haowei, Liang Jing*

Revaluation of Transition Model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 (29)

### *Xu Poling, Zhang Luping*

Analysis on Economic Trend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under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 (55)

### *Feng Shaole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isis": from Russia-Georgia Conflict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 Changes of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Great Powers and Lessons for China ..... (68)

### *Gao Ge*

Kosovo's Polit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Mandate to "Independent" ..... (87)

### *Lin Jinghua*

Western Comprehension and Expression of Russian Issues — An Introduction to Russian/Sovie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 (97)

### *Liu Yading*

Russia'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ages' Images in 1990s ..... (124)

## 专 论

**【编者按】**2008年10月17日，国家开发银行和华东师范大学正式签署了《合作共建开发银行—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协议书》。2009年6月1日，“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与“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华东师范大学逸夫楼举行。

研究院理事长、开行董事长陈元率开行各部门负责人一行20余人，研究院理事会各理事，上海合作组织首任秘书长、前中国驻俄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张德广，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努尔加利耶夫，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潘世伟，俄罗斯驻上海总领馆副总领事祖耶夫，华东师大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揭牌仪式，一起见证了由我国重要金融机构和985重点大学的一次历史性联手合作的阶段性成果。

陈元理事长与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张济顺教授为“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揭牌，华东师大校长俞立中教授与努尔加利耶夫秘书长为“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揭牌。张德广大使受聘为“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名誉院长，潘世伟、努尔加利耶夫和杨成绪大使被聘为研究院首批顾问。

揭牌仪式后，华东师范大学为张德广大使举行了隆重的名誉教授受聘仪式。其后，张德广大使发表了精彩学术演讲。

这两个研究院的成立，是国家开发银行继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作办学后的又一战略举措，是当前我国经济界和高校联手，共同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次新尝试，旨在将学院建设成为一个以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研究为核心、在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领域具有与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学术前沿水准相匹配的鲜明特色、具有较强的研究与咨询服务能力、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并拥有多学科研究梯队的研究机构。

本期特刊发张德广大使与努尔加利耶夫秘书长的学术演讲，以飨读者。

# 上海合作组织：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

张德广\*

首先，我对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的揭牌表示热烈祝贺。我对上海合作组织有着深厚的感情。从这个组织一开始，甚至还没有产生，我就参与了这个过程。现在虽然离开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但我一直关心着这一组织的发展。因此，尽管有点勉为其难，我还是接受了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名誉院长这个称号，并愿为学院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在中国，各类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的机构相继成立，说明上海合作组织问题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也充分说明了该组织的活力。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为何在上海产生这一组织？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在新的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面临哪些新机遇和新挑战？这既是老话题，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脱离不了的大视角。

## 一、“上海五国”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上海合作组织前身——“上海五国”的历史。为什么 1996 年在上海召开了五国元首会议？现在很多重大外交活动在上海或其他地方举办，但在当时，据我所知，不在首都而在上海召开国家元首会议尚属首次。作出这样的政治决断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出于大小国家平等的考虑。

1996 年 4 月 24 日，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俄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准备签订《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如果叶利钦先来中国进行会谈达成协议，其他国家再来签署，在外交上给人造成的感觉是不平等，好像是中俄做成的事情让其他国家来认可。这显然有悖于中国一贯推崇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因此最终选择了上海。叶利钦访华结束后直接赴沪参加五国领导人活动，其他国家元首，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也要飞到上海，从而体现平等。中方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各国的积极反应，哈、吉、塔

---

\* 张德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上海合作组织首任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名誉院长。

三国外交部均表示同意，第一次五国会议就这样在上海召开了。

1997年，五国边界谈判又取得一些进展，莫斯科峰会期间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对“上海五国”而言，1998年是个很重要的关口。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这个会议还开不开？毕竟五国虽然开了两次会议，但除了边界问题外没有固定议题，而关于边界问题的两个协定已经签完，似乎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大家普遍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希望继续召开五国峰会，尤其是苏联解体后新独立而迫切需要获得国际地位的中亚国家。那时，对他们而言参加峰会达成何种协议不是最重要的，能以平等身份参会才是头等大事，因此都很愿意继续举行五国峰会，特别是哈萨克斯坦，非常强烈地要求在阿拉木图举行第三次会议。现在看来，如果1998年的五国峰会不举行的话，就不会形成机制，也就很难有今天的上海合作组织。正因为这次会议，在上海开始的五国峰会的进程保持了下来，哈萨克斯坦的媒体上有了“上海五国”的说法。从此，这个新词不胫而走。阿拉木图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在讨论中增加了经济、交通运输、能源、环保等方面的议题，议题范围的扩大为今后五国合作进程的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

## 二、“上海精神”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八年了。2001年成立之时，正当旧世纪刚刚过去，新世纪刚刚开始，可以说，它是世界从旧格局向新格局过渡时期的产物，是世界政治经济进程大变革的产物。八年来，它也正是在这种剧烈的变动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许多人对他的前途表示怀疑。而今天，人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上海合作组织的欧亚大陆，甚至也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上海合作组织的世界。这个组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是非常重要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我想强调的是，上海合作组织不仅是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榜样，更是新时代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经常使用“international system”这个词。美国尤为重视中国对国际体系持什么态度。但西方专家学者有一个成见，即认为大国崛起之后必然要重新分配权力，从而导致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由新兴国家来决定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国际体系。实际上中美关系的本质一直是这个问题。将来国际体系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很多国际组织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兴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话语权，包括中国。对照现有各类国际组织，其内部的机构、机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认为，应该从上海合作组织中寻

找榜样和方向。

上海合作组织的理念和宗旨，特别是“上海精神”，西方是推不倒的。我在跟西方学者接触时，他们没办法批驳这一观点。“上海精神”短短 20 个汉字，但寓意深刻，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通俗的表述，是这一原则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提升。“上海精神”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包括发展观、文明观和安全观，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其中“平等、互利”是核心价值观；“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其中“尊重多样文明”，它把政治制度、不同的发展模式、世界的多样性都涵盖了。这些是同西方激烈碰撞的价值观。我们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的，这一条以前西方根本听不进去或是半信半疑。这两年我发现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们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好的，独一无二，其他国家就应按照它的自由市场模式去做，现在被各种麻烦弄得焦头烂额，开始认为中国挺有远见。事实也是如此，“谋求共同发展”，我们 1996 年就提出来了。

“上海精神”，并不是说这些是在上海酝酿诞生的，而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在上海宣布的，这是很宝贵的价值观念。我曾经讲过，这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灵魂。如果讲意识形态、价值观，这是优势。我们讲和谐世界，讲世界未来的秩序，那么“上海精神”是优势。尤其在人类经受了冷战，以及冷战后时代超级大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失败之后，上海合作组织对世界提供的启示、宝贵的价值观尤其发人深思。

### 三、新举措与新机遇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走到现在，继续前进很困难，很可能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我想，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一个积淀的过程，成就积累到一定程度，要进一步发展，就要有更深层次的反思。上海合作组织前八年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点毋庸置疑。

今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将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第 9 次峰会，各方正在认真准备。人们将看到上海合作组织在这次峰会期间或之后，深化安全、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中取得的新进展，采取的新举措。

#### （一）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长久使命

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提出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组织。近几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观和安全战略日趋完善，其行动目标和具体任务也更加明确。

上海合作组织把一国的和地区的安全放在全球安全的大局中加以审视和应对，主张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通过多边机制共同应对新挑战和新威胁。在安全理念方面，上海合作组织把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保障经

济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乃至预防自然和技术性灾害，维护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开展不同文明和宗教的对话，尊重国家统一和尊严等，一并纳入安全构想范畴。

上海合作组织重申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除了打击“三股势力”之外，还加强禁毒合作，共同反对来自阿富汗的毒品威胁。阿富汗问题是涉及地区安全的一个复杂问题，它的六个邻国中有五个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或观察员国，上海合作组织关注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是理所当然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七年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尽管美国新政府采取了新战略，但人们对于战争解决问题仍无信心可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争的合理性、目的性和有效性受到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质疑。我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与西方在阿富汗问题上既有不同的关切和考量，也存在合作的空间。我们都希望阿富汗早日稳定下来，达成民族和解，恢复经济建设，成为地区经济稳定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动乱的策源地。如果阿富汗问题不解决，中亚的长治久安就很困难。因此，阿富汗问题对上海合作组织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必须认真加以对待。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通过情报交流，联合办案，反恐军演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安全合作，对震慑、打击“三股势力”，稳定地区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合作如果吸收观察员国参加，将会更有成效。

2009年的峰会，成员国有可能就打击非法移民、促进人员往来，以及保障信息安全、反恐工作具体化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在新安全观和安全战略的指导和激励下，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欧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方面将开辟新的合作局面。

## **（二）拓展经济领域的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任务**

有一种意见说，上海合作组织应集中于政治、安全合作，经济合作让其他机制去做，这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关于安全、经济领域的合作，到底哪个最重要？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各种意见都有。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宪章。有些人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就应该搞安全，依我看，这等于要改变宪章。宪章中写得很清楚，规定上海合作组织是多领域的合作组织，这是定了性的，是国家元首签署的。我认为，坚持宪章，对于一个国际组织来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而且这样做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是中亚各国的共同愿望。人们不能想象上海合作组织不搞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也是不会同意的。

其次，宪章列出的各个领域都重要，不能说哪个最重要。由于每年讨论的重点不同，关注点不同，应该有所侧重。但发展经济是每个成员国，也是中亚地区长期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一地区的经济并不发达，如果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将对



政治稳定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可能给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土壤。经过几年的努力，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在经济合作领域确定了长远目标、阶段性任务和实施步骤，在能源、交通、电信、环保、农业、科技等领域商定了 80 多个合作项目，其中许多项目已经开始实施，如海关互助与合作协定、跨国运输便利化协定。这两个协定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为今后本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 2009 年峰会以及接下来的总理会晤，能就成员国共同有效应对金融危机达成共识，并就建立“上合基金”或“上合银行”之类的金融机制、以及贸易结算货币多元化等方面取得进展，那将具有重要意义。这既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办法，也是促进成员国经济往来、贸易发展的措施，存在良好的机遇。

能源合作对各国经济持续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为此，成员国正在开展能源对话，期待峰会或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总理会晤，能进一步探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及地区能源战略等问题，以促进能源生产国、过境国、消费国之间的务实合作。

### **（三）加强人文领域的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迫切需要**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经签署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可以预期，上海合作组织在人文领域的合作将逐步取得具体成果。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方案正在酝酿之中，这是我在任秘书长时提出来的。这表明各方对能力建设，即人才培养已经给予高度重视。中亚各国，首先是哈萨克斯坦总统非常支持，希望这个大学能够很快建立起来。现在的设想是一个网络状大学，不是在特定地点建立大学，而是由成员国指定哪些学科、哪些系来参加这个大学，为上海合作组织培养各方面的专家和人才。如果上海合作组织大学能够挂牌成立，这将是人文合作领域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 **四、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挑战**

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中亚地区形势的变化，是影响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说是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挑战。

有理由认为，中亚能够保持政治稳定，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各国独立以来在经济建设层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重要成就，相信能够经受住金融风暴的冲击。诚然，中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政治与社会矛盾，但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干预，许多问题完全可以按照本国的国情，在正常的轨道上得到解决。中亚有其历史、文化特性，那里的一切终归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而非外部设计的方案（包括所谓“颜色革命”，以及企图用新的地区架构取代上海合作组织）发生、发展。这一点已被近几年的事实一再证明。经过 18 年之久的变革，中亚各国独立自主、抵御外部势力干扰的能力也明显增强。当然，“三股势力”仍然相当活跃，对各国的安全与稳定继续构成威胁。

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这些都是影响地区形势和上海合作组织议程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不断有人提出：上海合作组织是否正在成为一个反西方的军事政治集团？甚至有人已经称上海合作组织为“东方的北约”、“中俄军事联盟”等等。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程的见证人，我始终坚信，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和平、合作、开放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它是在各成员国深刻认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基本趋势的背景下，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而成立的。与西方对抗不是它的宗旨。对此，只要看一看它的成员国是怎样努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保持和发展良好关系的，即可确信无疑。西方不应把上海合作组织摆在自己的对立面加以反对。反对上海合作组织，等于硬把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改造成自己的敌手，这是极不明智的。

中亚存在众多的区域合作机制，其宗旨和作用各不相同，而上海合作组织是该地区最大的，也是最具潜力的、最重要的政府间多领域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不结盟和开放政策，从未把中亚当作自己独占的“领地”。无疑，中俄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在中亚、在上合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上合和中亚不会出现中俄联盟。当然，中俄也不会坐视其他势力的排挤。同样，这里也不会出现中美两国集团，即一段时间以来被媒体热炒的所谓 G2。温家宝总理 5 月 20 日在布拉格中欧首脑会议上作了明确的表态，可以说是批驳了这种所谓 G2 论调。我想在欧洲是这样，在中亚也是这样，在上合组织也是这样。我们既不搞中俄联盟，也不搞中美联盟或者中美共治。

中亚结束了封闭的历史，向世界全面开放了，中亚应当可以成为互利共赢、平等合作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倾轧、恶性竞争的角斗场。我一向不赞成把欧亚地区视为一个“大棋盘”的思想。因为那是零和游戏，仍然是以冷战目光看世界、看中亚。而所谓中美两国集团也是如此，就是说一国控制世界有困难了，拉一个来帮忙，还是一个或两个国家来控制、统治世界的思想，还是一种霸权主义的思想。一口一个领导世界，就是完全听它的，这完全是幻想、是空想。无论是中美两国集团，还是大棋盘的思想，都没有上海合作组织提倡的“平等、互利”这种核心价值来得先进。我主张，各大国，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世界力量，都应当对中亚的和谐稳定和繁荣作出各自应有的积极贡献。

此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从来没有认为美国在全球成功地建立过世界霸权。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两霸，而不是美国一霸，还有一半是苏联霸权。冷战结束以来，不少学者都说世界会演变成单极世界，实际说来，也很勉强。它最厉害的时期，打科索沃战争，打伊拉克战争，能不能说就是单极世界呢？起码我们没有听它的，俄罗斯也从来不听它的，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多少跟它走的。那最近几年就更明显了，

金融危机之后的形势更为清晰。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某些势力不想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是否享受世界霸权的地位？是否建立了世界霸权？与它推行这种政策，想要取得这种地位是两码事。

最后，我想指出，2007 年上合峰会签署的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条约，是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提升，也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的深化与发展，为该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长远和坚实的法律保障。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地区的思想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可以预测，2009 年上海合作组织将为维护欧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帮助成员国尽快摆脱金融危机，促进地区经济稳定发展，采取更多更有效的积极行动，并取得更多合作成果。相信上海合作组织将坚持其既定的宗旨和原则，不断加强自身团结和内部协调，进一步提高行动能力，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沿着既定道路扎实向前迈进。

（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审定）

（责任编辑 常喆）

## 上海合作组织：新问题与新方法

Б. 努尔加利耶夫\*

首先，对“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落成揭牌，我谨向研究院的领导和成员表示衷心的祝贺，并祝愿你们在研究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现实问题这一责任重大的使命中取得成就。上海合作组织被公认为是一个新型的区域联合组织，是在真正平等、相互照顾彼此利益、尊重观点、文化和精神价值多样性原则基础上建立关系模式的典范。

感谢华东师大领导和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大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的领导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仪式并提供机会，介绍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潜力和近期发展计划。

当我在各地与外交官和记者见面的时候，人们常常问，我是什么时候到的，什么时候从上海来的。我只得解释，尽管我们的组织称作上海合作组织，但是其总部在北京，上海是我们六个成员国的领导人2001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协议和其他主要文件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组织以上海冠名。当我们说到“上海精神”、“上海原则”、“上海进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联想起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上海。我们尽力与此殊荣相吻合。

今天在座的有专门从事上海合作组织各方面事务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借此机会，我想就上海合作组织在国际和地区机构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实现其旨在维护和平、安全和稳定的主要功能的进程，以及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等问题，与各位分享一些看法。

上海合作组织八年的变化展示了该组织良性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平台上协商、制订、实施共同策略，应对实际的挑战，应对针对六国的安全、发展的威胁。已积累的经验证明，我们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的战略决定是正确的。这一决定是，把我们的优势，也就是牢固的友谊、长期睦邻、和平共处的历史传统和在相互信任与平等基础上和平解决出现的问题等变成我们集体的利益。

---

\* Б. 努尔加利耶夫，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顾问。

对挑战与威胁性质的共同理解、在尊重彼此合法利益基础上探寻解决甚至是最复杂问题的共同理念，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团结在一起。我们的出发点是，任何分歧、矛盾、争论和纠纷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和互让的途径加以解决。我想向各位证明，在我担任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两年半的时间里，从未出现过任何一个成员国的立场观点因其政治和经济地位而受到忽视或者受到格外重视的现象。

尊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利益的原则在每年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会晤上都得到展现。

各位都知道，再过两周，在叶卡捷琳堡将举行第九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这次会议，将讨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对国际和地区局势的现状和前景作出评价。我建议研究上海合作组织事务的专家们关注按计划将由各国元首们通过的叶卡捷琳堡宣言。以往历届峰会通过的宣言，在结构上，总体是相似的，区别在于内容，内容的不同反映了上海合作组织及其责任范围内所发生的变化进程。对于专家们来说，研究八年来对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评价的变化，是很有益的。有一些主要的、基本的东西，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在世界事务中的关键作用，在及时、相应地应对时代的挑战和在变化着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中提高联合国各机构的效力。基本原则还包括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多元化以及不按集团原则划分国家。

叶卡捷琳堡峰会将通过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是关于上海合作组织针对威胁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局势所采取的政治外交应对机制。

我想强调的是，区域组织的效力，在危机局势中能得到特别明显的体现。上海合作组织也是如此。当威胁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局势在我们地区或者上海合作组织某个成员国中出现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能表现出一致的团结。每个成员国的安全，是整个组织共同关心的对象。所以，反对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毒品非法交易一直被列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重中之重。提高与这四股势力斗争的效力也需要借助专家学者缜密深入的研究。我希望，这一课题能得到贵院的高度重视。

研究上海合作组织政治、经济和人文领域这三个主要方面的均衡性，对组织框架内的实际工作是很有益处的。上海合作组织的综合性反映了其成员的现实要求，我认为，我们的组织在未来将继续作为一个多功能的组织不断发展，尽管，有关三个方面中哪一个最为重要的争论一直在继续。

华东师大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是在国家开发银行支持下成立的。银行董事长陈元先生亲自出席今天的仪式。我想指出，85个方案拨款最佳模式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就不会有成效，这些方案被包含到新的实现全面的金融合作计划之中。在这方面，国家开发银行代表中国参与其中的银行联合体和实业家委员会应该能起关键性的作用。

研究这两个民间机构（银行联合体和实业家委员会）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可以作为贵研究院的课题，甚至可以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因为其他现有的研究院，还没有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阿富汗的复杂局势引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高度关注。随着阿富汗国内不稳定局势的加剧，因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有组织跨国犯罪而引起的对民族安全的威胁也不断加剧。研究该国及其周边的局势，就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应对的可能措施提出建议，是有实际意义的。

而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伙伴组织、区域外组织的相互关系，上海合作组织与观察员、对话伙伴关系的建构也是很有前途的研究课题。这一课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包括在研究界，流传着一些看法，认为在我们地区存在着一些组织，它们的任务相似，能在某种程度上彼此复制。所以，提供经过科学论证的有关上海合作组织的特殊作用和地位的结论就很重要。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使其成员国全面接近的独特使命。

我还想把通过吸收新成员扩大上海合作组织的问题归入到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实际问题当中。各位知道，各方对此都很注意，各方都在猜测，这将会如何影响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作用和威信。

上海合作组织的内部结构将继续完善。承担着协商上海合作组织各方在各领域立场重任的协调员机制有效运行。还有上合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机制执委会下属各成员国常设代表机制。有人建议在秘书处和反恐机制执委会之外增设其他常设机构。研究其他地区组织运作的有益经验，为优化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结构提供借鉴，也很有需要。

当然，这并没有穷尽研究课题的全部。我相信，贵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在先前中外上海合作组织研究机构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将积极参与到成功运作的上海合作组织论坛当中来。不久前，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伊塞克湖州举行了第四届上海合作组织论坛，专家学者就上海合作组织的工作发表了很有意思的、有些是批评性的见解。

对于具体从事上海合作组织事务的人士来说，专家学者的批评性评价至关重要。我希望，华东师大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的研究成果也将促进上海合作组织的完善，开掘出内在的、尚未利用的潜力。我祝愿你们一切顺利、取得成功，并且保证，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将始终不渝地愿意与上海的同行人开展建设性的合作。

谢谢大家！

（贝文力 译，译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常喆）

专题文稿·转型反思

## 1989-2029 年大转型 ——可以更好或将会更好吗？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东欧国家自1989年以来发生的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进行了理论和现实的阐释，考察了其历史特性，批驳了该地区已经在制度上成为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的论点，而认为中东欧国家在转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强调，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进程不会呈直线型发展。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市场改革与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只有在更加精确地确定目标，同时不是将制度转型当作是自我实现的目标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才会取得更好的转型绩效，否则会朝相反方向发展。

**【关键词】**大转型 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 现实社会主义 新兴市场

**【中图分类号】**F13/17.51.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3-0014-(15)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postsocialist system transformation)这么巨大的变化，尚不多见。这个转型发生在1989年到今天的这段时间内。有人认为10个中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已经属于欧盟的一部分，转型已经成功，其理由是该地区已经在制度上成为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但也有人认为，该地区在转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人赞同后一种看法。尽管根据1992年确定的哥本哈根标准，成为欧盟正式成

\*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转型、一体化与全球化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员国的事实本身就表明，新成员国是“发挥功效的市场经济体”，有能力在欧洲一体化内部进行竞争，但这并不能确定制度的真正成熟与否。有关成熟的唯一合理标准是广义的市场文化的质变和制度的可靠性，即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可操作性。这些要素能够确保机制的有效运作、创造和分配资本以及划分产出。在讨论机制的有效运作时，人们需要记住经济过程的能动性和平衡性。因此，为了达到这个意义上的市场制度和文化的状态，未来许多年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后苏联的中亚地区，如果将一般性的转型过程忽略不计，这些国家甚至不能称为后社会主义国家，最多只能称为实行制度变革的国家。毫无疑问，1989年时的匈牙利、波兰或南斯拉夫，毕竟要比20年之后的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或土库曼斯坦更加市场化和自由化。不过，由于时代背景的缘故，没有人在当时会将前者称为“转型经济体”，现在也没有人会将后者称为“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体”。

## 一、瀑布

1989年春天，波兰具有历史意义的圆桌会议辩论达成了妥协性协议。参加圆桌会议的，有当时政权的代表和反对派代表，包括知识分子、商界人士、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这个协议成为制度大转型的催化剂，大转型涵盖了世界广大地区，起初是东欧，很快扩展到前苏联地区。其推动力对中国和印度支那地区，特别是越南的市场化和结构、制度转型，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从易北河到太平洋的三十多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市场经济和民主转型之路。其人口超过18亿，高于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新阶段以及剧烈的文化和政治变革背景下，经过20年的转型，这个进程不仅使世界这个部分焕然一新，而且甚至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事实上，1989年对于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而言，从南美洲和中美洲经过非洲和中东到南亚和东亚，同样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年头。其中，智利和尼加拉瓜、加纳和南非、也门和叙利亚、印度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较为突出。

1989年的转向(turnaround)更为剧烈（更为剧烈的原因是，转向的许多因素在这之前已经接连出现，在不同程度上为特定国家的转型做了准备）<sup>①</sup>，同时是指冷战的

---

<sup>①</sup> Bąk, Monika, *Europa Środkowa i Wschodnia wobec wyzwania transformacyjnego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s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Gdańsk: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Gdańskiego, 2006.; Koźmiński, Andrzej K., "How It All Happened",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Warszawa: Difin, 2008.



结束。结果，冷战双方的冲突，即第一世界（由美国领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前殖民地宗主国）与第二世界（由苏联和中国领导的国家）在第三世界领土上的冲突，也宣告结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 20 年之后的影响更大，而且在按不同方式划分的世界某些部分的影响首屈一指，并仍在继续增强……。

造成文化、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环境转型瀑布效应的原因，是一系列积累而成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现实社会主义”模式(real socialism)的崩溃、冷战的结束、后社会主义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的扩展、后殖民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市场的“出现”、现阶段全球化、信息革命、大规模移民浪潮的高涨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等等。

确实，我们必须始终应对正在出现的连续性和变革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然而，在某些时候，积聚的变革会同时发生，引发别具一格的“瀑布”。不过，历史进程不会呈直线型发展。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状况。局势之所以是这样的原因，在于其同时发生的特性。变革的瀑布汹涌澎湃，冲击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体，造成与自然、文化和技术的碰撞，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构造上的变动。一种新的特性应运而生，可以在共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加以解释<sup>①</sup>。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对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进程的历史特性进行考察。

## 二、判 定

假如我们向人们提问，包括向杰出的经济学家（指那些精通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了解 1989 年以来后社会主义国家实情的经济学家）提问：在转型开始 20 年之后（不含中国和印度支那，其发展十分独特），平均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如何？我们会发现，得到的回答中没有一个是仅仅高出 20%。如果只是谈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指数在二十年之后提高了 120%，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所谓的巨大变革就显得毫无意义。为何变革制度的目的只是为了判定下一代（4 亿人）患上佝偻病，甚至只是实现年平均增长率 0.9%？然而，这就是所做的一切……。

20 年之前，没有人敢于预测（此举看上去荒唐可笑）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不是五分之一而是 5 倍。在这段时间里，这个仍然被某些人视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大国，将生产水平提高了 420%。中国通过走自己的道路和不理会西方的压力和“忠告”，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这与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某些国家不同，这些国家均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压力和“忠告”。中国完美地实现了市场看不

---

<sup>①</sup> Kolodko, Grzegorz W., *World on the Move*, New York (forthcom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见的手与国家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合作。在中国温和地从改革计划经济过渡到逐渐创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两种对社会再生产的控制之间的良好合作，决定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成功。尽管中国仍然不承认这一点，现在正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仍在弘扬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中国已经踏上了建立市场经济的道路，具有长期的涵义。

对于反事实或他择性的历史问题：假如怎么样，会发生什么？我们永远不能得到满意的回答。假如中国选择了叶利钦统治时代俄罗斯式的政治混乱和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会发生什么？是不是会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口，或比 1989 年更低的生活水平，同时使得数千万悲惨的移民充斥于世界各地呢？

假如由波兰为先导的东欧国家，然后是苏联，没有出现进行复杂和深刻制度变革的政治条件，假如这些国家走上了与中国和印度支那国家相似的渐进和有效的市场改革道路，而不是实行后社会主义的急速转型的话，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作出推测：情况会更好些，1990-2009 年的增长速度也会比可怜的年平均增长 0.9% 要快很多。事实上，这个增长速度与之前的 20 年，即 1970-1989 年相当，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与更早的 20 年——1950-1969 年相当。

但也有观点认为，由于 80 年代与 90 年代之交的危机和莽撞地实行快速和平衡的增长方式，这些国家会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生产水平也许会更低。但是，考虑到 80 年代末进行的市场改革，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进行的这类改革，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第一个选项更有可能：一个比实际增长率更高的增长速度。

毫无疑问，在进行更深刻改革的社会主义现实中，不论形式如何，再分配机制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收入不平等的差距肯定会比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时期更为悬殊，但要比实际情况小一些<sup>①</sup>。但是，这个假定也可以受到质疑，比如中国和越南的案例就不能证明这一点。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迅疾改革，造成了不平等程度的逐渐加大，甚至超过了那些实行渐进转型的国家的贫富差距。表明收入差距水平的基尼指数足以证明这一点：中国的基尼指数是 0.47（2007 年），越南为 0.37（2004 年），而波兰为 0.35（2005 年），匈牙利只有 0.28（2005 年）<sup>②</sup>。

---

① Kolodko, Grzegorz W., *From Shock to Therap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Tomkiewicz, Jacek, “Nierówności dochodowe w krajach posocjalistycznych – mechanizmy i uwarunkowania na tle tendencji światowych” (“Income Inequality in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 Determinants and Mechanisms Against the World Tendencies”), *Problemy Zarządzania*, 2007, No. 3, pp. 121-135.

② CIA, “The World Factbook 2008”, 2009([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http://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 三、改革与转型

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市场改革与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对于前者，所做的一切是改变现存制度的运作方式，目的是保持这个制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改革者就要使制度更有弹性，增强应对不断变化的文化和技术条件的能力。为此，需要提高公司效率和赢得社会支持，或至少是要使社会能够接纳制度功能。因此，在改革方面，尽管变革时常具有深刻和超前的特性，但其目的是维护现存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是要否定它们。这就是苏联在 80 年代末改革的目的，是波兰在同一个 10 年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匈牙利于 1968 年启动的转型的含义，也是南斯拉夫在 50 年代开始的不同形式的自治社会主义的基础。

至于第二个选项，即后社会主义转型，其目的是废止先前的制度，通过大规模实质性的重建，由新制度（事实上就是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地区很少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汇，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本身。尽管像“市场经济”这样的委婉语用得更为频繁，但其资本主义的性质昭然若揭。

除此之外，存在着（虚构的）弊端的前“共产主义”与存在着（假定的）优点的“市场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仅是命运使然。这种在并不存在的色彩黯淡的“共产主义”和理想化的、同样也不存在的“市场经济”之间的故意对比（出于意识形态动机，无实际意义但在政治上有用处），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因此混乱不堪，漏洞百出。而适当的对比则必然与现实发生冲突，即以前的现实与现在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指被贬损的过去形象与被美化的现在形象，或现在与虚构的未来之间的冲突。

因此，所谓的事实上的现实社会主义，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与所谓的真正的当代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应当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对比<sup>①</sup>。令人感到惊异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都没有准备好作如此客观和广泛的比较。我们必须等待，也许要等 20 年甚至更长时间……。

### 四、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这个术语得到普遍的使用（也误用于指后社会主义的现实，却没有进行必要的思考），但它不是用来描述制度转型下国家复杂的经济新现实。该术语

---

<sup>①</sup> Główny, Jan, *Szalbiarczy urok transformacji (The Cheating Charm of Transformation)*, Warszawa: Fundacja Innowacja, Wyższa Szkoła Społeczno-Ekonomiczna, 2003.

属于又一个新自由主义概念。它与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的扩张相关联，其延续的时间与长达 20 年的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相同<sup>①</sup>。不过，这些“新兴市场”并没有出现，也没有促使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政治民主的进化和成熟。正在出现的是世界上富裕国家的经济活动，特别是投机行为。这些活动早就“出现了”，而且已经在制度上和金融上成熟，因此这些强大和富裕的国家打算在传统的支配范围之外运用其财富力量。请参阅 1989 年之前世界分野状况的地图，当时非市场化地区的形势驱使它向资本打开大门。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才行。

按照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新兴市场”被作为一种工具、作为更多的商机来对待，而没有考虑到实行市场化地区的社会成本。但按照那些对“出现”感兴趣的国家和经济体的观点，其目的完全不同：卓有效率、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将能够以理想的方式满足其自身社会的需要。

简言之，在有关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的新自由主义路径与社会市场经济路径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前者集中于正在出现的营商机会之上。人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而是有必要加以了解，作出恰当的反应。后者集中于创造和发展基于新的市场管理原则的新型社会契约。所以，所出现的不仅仅是“市场”，而且还包括基于社会的市场经济。这是很不相同的……。

因此，西方对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和进步、发展和财富所表达的关切，主要是一种文字游戏，是一种对自己利益的关切。在利益当中，西方关切的不仅有政治利益，而且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利益，尤其是富裕国家金融精英的利益。我们不应对此一现实感到忿忿不平，因为这只是极为天真的反应而已。我们需要在实际生活中进行调整，因为新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即由自由化的推进和市场的一体化所产生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不仅会产生新的危险和风险，而且甚至会产生更多的新机会。然而，其益处将在长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体现，所以在精确的经济理论上确定发展目标，进而形成有效的战略，十分必要。

至于上文提及的历史判定，考虑到整个发展过程的辩证性，这是不可避免的一环。但其规模还需要从政治和**严格的**科学方面作严肃的思考和辩论以及可靠的评估。

二十多年以前，“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经济运作的环境是缺乏政治民主，以国家对财产的支配权、中央分配资本和官僚控制为基础——正在走向终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其原因在于这种制度的发展能力已经消耗殆尽。人们对其发挥的所

---

<sup>①</sup> Harvey, Davi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有三个方面的社会功能，越来越表示不满<sup>①</sup>：

- 生产者：由于错误的生产组织未能带来所期望的效果，而越来越感到失望
- 消费者：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短缺和短缺—物价稳定综合症<sup>②</sup>，消费者的满意度较低（在生产增长的背景下）。有时处于绝对的低水平上，因为不仅挣钱困难，而且花钱也不容易。
- 公民：所谓的人民民主和或多或少自由化的政党制度远远没有为人们提供有组织的、创造性的表达意见和对公共事务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制度产生的问题要多于能够解决的问题。“物质疲劳”（“material fatigue”）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制度本身在自身功能失效的重压之下必然崩溃。

这一切都发生在 1989 年及此后的数年里，当然本可以发生在数年或十几年之前或之后。但是，这一切必然发生。首先，在持续加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团结工会”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自相矛盾，转变为大众的或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波兰的例证最为明显）<sup>③</sup>。同样在波兰，主张改革的政府最早了解其含义，决定与圆桌会议分享权力。罗马尼亚的变革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其他国家的过程采取了以上两个极端例子之间的方式。

显然，外部压力发挥了作用，但起作用的主要是内部进程，对外部压力不可估计过高。外部压力利用了内部的瓦解进程，而不是下达指令或确定变革的步调。即使在美国，当政的民主党采取和解和合作的态度，对制度改革释放善意，寄希望于“人道的社会主义”，与持对抗态度的共和党不同。英国则是工党执政，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求“第三条道路”，与对东方抱有敌意的保守党不同。但无论如何，“现实社会主义”必然失败。假如这一切没有在 80 年代末发生，也将会在不久之后发生。不过，在这之后 20 年里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必然性，而且仍然在此过程之中。

## 五、事实、解释与推论

过去涉及到事实及其解释，而未来除了至关重要的主动掌控之外，还涉及推论和解释。前者较为困难，后者则更具吸引力，因为未来与事实无关，但将会提供事

---

① Kolodko, Grzegorz W., *Cele rozwoju a makroproporcje gospodarcze (Development Goals and Macrorrelations)*, SGPiS, Warszawa, 1984 (Second edition, PWN Warszawa 1986).

② Kolodko, Grzegorz W. and Walter McMahon, “Stagflation and Shortagefl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Kyklos*, Vol. 40, Fasc. 2, 1987, pp. 176-198.

③ Ost, David, *Defeat of Solidarity.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NY., 2005.

实。至于会提供何种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上和实践上刻意作出的思想和政治假设及其后果。因此，对于未来的推测性思考，尽管存在某些思想和形式上的局限性，但仍然十分有趣，具有创造性和丰富性。那些不作推论者，不会预测未来。而没有预测，就不可能参与创造未来。

对于此前的后社会主义转型过程的估价仍然存有争议，而且如果不是永远争议下去的话，也会争议很长时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某些领域的理论概括已经完成<sup>①</sup>。同时，虽然有时在有关经济增长路径的问题上存有严重的争议，但所有人似乎都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本应当更快些。毫无疑问，在转型以后的 20 年，其经济增长的速度本可以大大加快，其社会成本（失业、不平等、排斥边缘margin of exclusion、贫困和过高的死亡率等等）本可以大大降低。相似的情形将会在未来看到。

新自由主义旨在提供错误的转型路径（人们对此无法作出选择）。面对其刻意宣传以及根据以往情况展示的形象，人们很少尝试对 1990-2009 年的经济增长作出评估。显然，即使是参考了对生产和消费增长所作评估的精确结果，也不足以用来评估目前的情况，因为所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类别并不能覆盖社会经济状况的所有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虽然不够完美，但实用性更好。但这个指数也没有考虑到自然环境或闲暇时间及其使用的问题。在考虑到时间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文化价值观、对于现存权力运作方式和经济功能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综合的关注，比如综合幸福指数(Integrated Well-Being Index)<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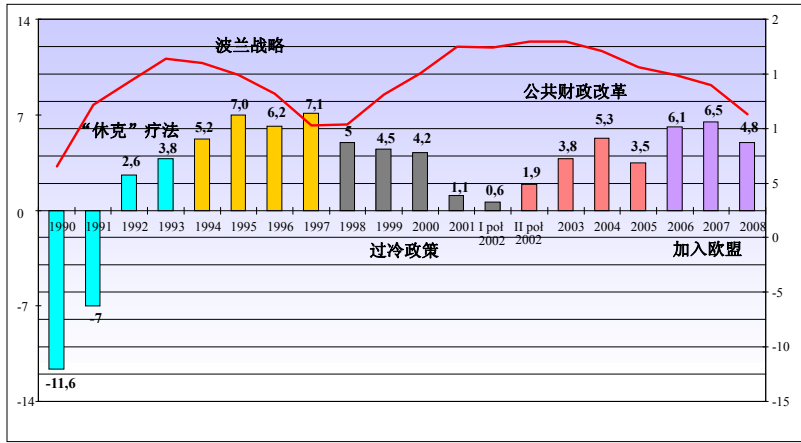
我们以波兰（欧盟新成员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为例，该国 200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 1989 年的约 180%。除了中国和越南之外，这是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不含土库曼斯坦，该国情况特殊，由于近年来能源价格的猛涨而增速加快，增长率达到 220%）<sup>③</sup>。必须指出，波兰 80% 的增长，主要发生在 1994-1997 年和 2002 年第二季度—2008 年中的快速增长时期。而在 1990-1993 年和 1998-2001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接近于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势头和生产水平的变化与就业率和失业率密切相关。（图一）

---

① Blanchard, Olivier, *The Economics of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saba, Laszlo,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Emerging Europe*,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2007.

② Kolodko, Grzegorz W, *World on the Move*, New York (forthcom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08. Growth in Transition*,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资料来源：中央数据局(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华沙（所涉不同年份）。

图一：1990-2008 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左侧刻度）与失业率（右侧刻度）  
（从无治疗的休克到无休克的治疗）

有人试图评估波兰在过去 20 年中假定的增长速度。评估的基础是将 1990-199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值与政府的原始计划（1990 年下降 3.1%，然后出现增长）挂钩；将 1998—2001 的增长比照 1994—1997 年的实际增长速度，同时参照政府计划<sup>①</sup>。这样做具有可能性。兑现这样的预设情况，只需要避免明显的错误：其一，上一个 10 年开始时破坏稳定的政策；其二，那个 10 年末不必要的冷却经济政策，当时的增长速度从达到最高值（指转型时期）的 7%（1997 年）下降到处于停滞的 0.2%（2001 年底）<sup>②</sup>。

假如经济增长按照基于合理的建立市场制度政策和负责任的经济发展的预设情况发生，假如我们更加有效地应对 2008-2009 年的经济危机和保持约 4-5%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势头，那么 200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就不会是 20 年前的 180%，而是要高一半，即相当于当时的 280%。（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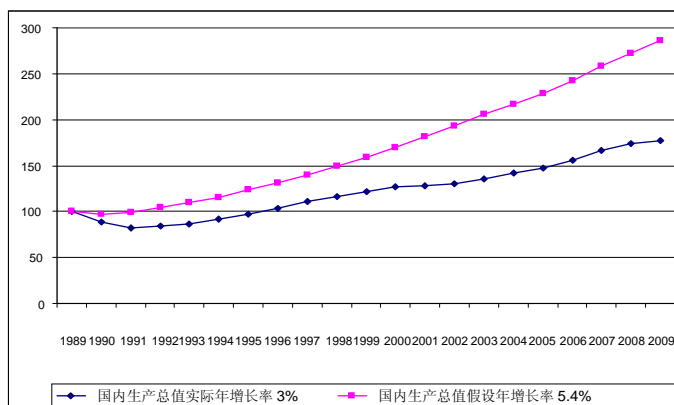
根据绝对价值，人均产值就不是与拉脱维亚相当的 18000 美元（购买力平价），而是超过 28000 美元（购买力平价），高于葡萄牙。这表明了未能利用增长潜力的程度和不可挽回损失的数额。在可获得收入方面的失败及其造成的影响，是某些时期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产生的后果。

至于其他转型国家，总体上到 2007 年才恢复到 1989 年的水平，出现错误的程度甚至要高于波兰，因此，未能利用增长潜力的情况也比波兰严重。其原因各不相

① Kolodko, Grzegorz W, "A Two-thirds Rate of Success. Polish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1989-2008", WIDER Research Paper, No. 2009/14 (March), 2009.

② EBRD, *Transition Report 2008. Growth in Transition*,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同，但通常政治方面的原因多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事实上，无休无止的政治争论有时转为民众运动，有时趋于新自由主义，导致无法实施保持理性和符合实际的经济平衡增长政策。



资料来源：中央数据局(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华沙（所涉不同年份）。2009 年的水平为作者的预测，假设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作者的计算结果。请见本文文字解释。

图二：1990-2009 年波兰事实的与假设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1989 年=100）

同时，必须强调的是，波兰保持 3% 的年增长率并不是不可避免之事，而 5% 的年增长率也不是不可实现的目标。

同样，转型国家也不是必然会陷入 0.9% 的缓慢年增长率。在对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和狭义上的经济政策必不可少的结构变革和新制度建设方面，这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目前造成的损害有：公司相对较低的竞争力、较低的生活水平、过高的外债和对外来资本和政治的依赖。

我们在未来会被迫付出类似的代价吗？我们希望不会这样，但我们看到对自己错误的认知是如此缓慢，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把握。所能观察到的惯性作用，有一部分是来自后社会主义构建所依赖的低效原则，一部分是来自为确保特定利益而进行国内外游说所造成的压力。

2008 年，欧盟 10 个后社会主义成员国的人口为 1.03 亿，占世界人口的 1.53%。这些国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1.86 万亿美元(购买力平价)，占世界总产值(GWP)的 2.6% 和欧盟总产值的 12.4%。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比例相对而言要低于（而不是高于）20 年之前。其原因在于，在 1990-2009 年这个时期内，无论是世界整体还是富裕国家（包括欧盟的西部地区）的产值增长率，都比后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许多。

而在未来的 20 年（2010-2029），情况有可能、也应该有所不同。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即使是在目前的 10 年（直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时），也表现出比高度发达国



家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两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的制度改良、技术进步、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和管理技能的改善，导致了比西方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由于微观经济管理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这个趋势在未来应当会保持下去。显然，微观经济本身的变革还不够，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可或缺。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和持续，2009年和接下来的几年都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sup>①</sup>。不可否认的是，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合理预测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势头绝非易事。但是，对于制度变革的长时段分析表明：考虑到全球政治、制度、文化、人口和技术各个方面，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在长时期内将会比欧盟的“老”成员国保持更快的增长速度。

在长期的消除发展方面的历史差异时，每一个百分点都十分重要，因为时间和复利都在起作用。不过，促进快速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必须付诸实施。其基础必须是新实用主义<sup>②</sup>，以及遏止民众运动的威胁和新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上的偏差。以上威胁和偏差的合流仍不时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对于经济平衡和增长势头尤为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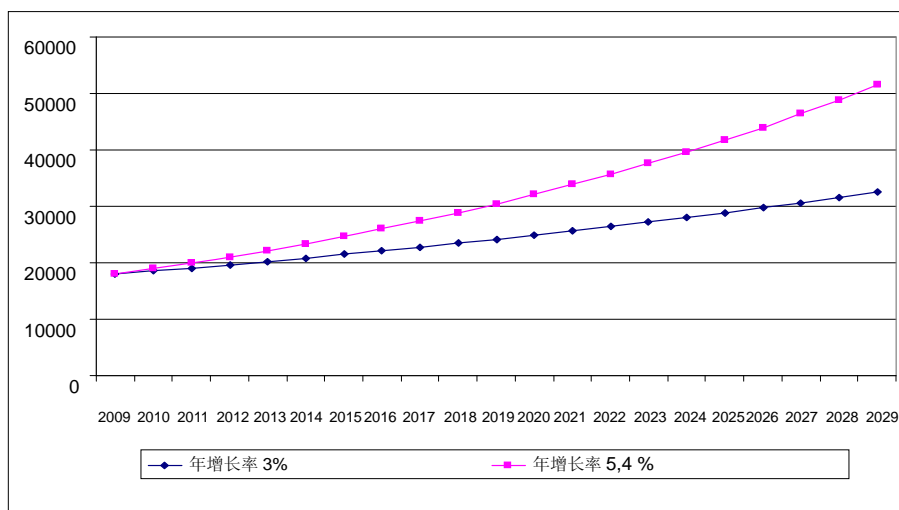
## 六、未 来

展望未来之时，我们再次考察波兰的例子。现在就如同1989年及此后几年一样，我们又面临着选择不同经济增长路径的机会。我们再次观察一下，可以看到这些路径处于很高的约年均5%的增长率（并非不可能达到）和较低的约3%的年增长率之间。之所以认为后者较低，是考虑到了可能性，特别是雄心壮志的要求。让我们审视未来2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的平均值在3%与5.4%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前者是1990-2009年的实际年增长率，后者是假如同时期避免了经济政策错误，特别是在前一个10年开始时实施的无治疗的休克政策和那个10年结束时实施的不必要的冷却和过度杀伤政策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的年增长率。在特定情况下，未来20年里5%的年增长率是有可能达到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将长期战略建立在适度的经济政策之上。（图三）

---

① Orłowski, Witold M, *Świat, który oszalał, czyli poradnik na ciekawe czasy (World Going Mad, or a Guidelines for Interesting Times)*, Warszawa: Agora, 2008.

② Kolodko, Grzegorz W, *World on the Move*, New York (forthcom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结果。请见本文文字解释。

**图三：2009-2029 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不同曲线**  
(2009年GDP=18000美元, 购买力平价)

在未来 20 年，如果欧盟所有 10 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年增长率都达到较快的 5.4%，那么 202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达到 5.33 万亿美元，几乎是目前的 3 倍。假定同期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约为 3.5%（那么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只有 2.5%），欧盟的 15 个“老”成员国的年增长率不超过 1.5%，那么在 20 年之后，前面 10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将从目前占欧盟的 12.4%和占世界的 2.6%，分别增加到约 30%和 3.8%。这将大大增强东欧地区的相对地位，尤其是在欧洲的地位。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到 2029 年，其余 10 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也许已经加入欧盟，其中包括：所有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科索沃、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和一些后苏联共和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2008 年，这 10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为 7290 亿美元（购买力平价），乌克兰占其中一半，约 3600 亿美元。这 10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分别等于已加入欧盟 10 国、整个欧盟和世界产值的 39.2%、4.9%和 1%。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7 个巴尔干国家和 3 个前苏联共和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只比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高一点（按购买力平价分别为 7290 亿美元和 6850 亿美元）。（表一）

表一 2008 年中欧和东南欧国家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

国 家	人 口 (百万)	国内生产总值 (十亿美元, 购买力平价)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购买力平价)
保加利亚	7.3	95.9	13200
捷克共和国	10.2	273.7	26800
爱沙尼亚	1.3	28.6	21900
匈牙利	9.9	205.7	20500
拉脱维亚	2.2	41.6	17800
立陶宛	3.6	65.8	18400
波兰	38.5	684.5	17800
罗马尼亚	22.2	278.4	12500
斯洛伐克	5.5	123.1	22600
斯洛文尼亚	2.0	61.8	30800
<b>以上 10 国</b>	<b>103</b>	<b>1859</b>	<b>18100</b>
阿尔巴尼亚	3.6	23.1	6400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4.6	30.5	6600
克罗地亚	4.5	73.4	16900
科索沃	2.1	5.0	2300
马其顿	2.1	19.0	9200
黑山	0.7	7.2	10600
塞尔维亚	10.2	83.1	8200
白俄罗斯	9.7	116.7	12000
摩尔多瓦	4.3	10.8	2500
乌克兰	46.0	359.9	6900
<b>以上 10 国</b>	<b>87.7</b>	<b>728.6</b>	<b>8300</b>
<b>以上 20 国</b>	<b>190</b>	<b>2588</b>	<b>13600</b>
<b>欧盟 27 国</b>	<b>491</b>	<b>14960</b>	<b>34000</b>
<b>世界</b>	<b>6707</b>	<b>70650</b>	<b>10500</b>

资料来源：CIA, “The World Factbook 2008”, 2009 ([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http://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仍在欧盟以外的后社会主义经济体，由于起点较低，所以其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更快。这样，关于这些国家到 2029 年增长三倍的预估（达到 2 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应当是符合实际的。而欧洲 20 个后社会主义国家（10 个国家已经加入欧盟，另外 10 个国家应当会在今后某个时间入盟）将会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5.3%。那时的世界人口将会在 80 亿左右，东欧则会大体上保持不变，即 1.9 亿-2 亿。因此，占世界人口四十分之一，即 2.5% 的东欧地区，将会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二十分之一。目前，这个地区占世界人

口的 2.84%，占世界生产总值的约 3.7%。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根据年增长率 5.4% 的乐观预期，10 个已入盟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增加 34000 美元（购买力平价）（从目前的 18000 美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52000 美元），这意味着人均近 190% 的增长，其前提条件是居民人口保持不变。随着产值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当然是件好事。这是后社会主义的制度转型应当达到的目标，绝不要像时而发生的那样，将行为方式与目标相混淆。

## 七、结 语

总之，对于这样问题：本可以更好吗？将会更好吗？答案显而易见：对于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对于特定个人和社会集团在不同范畴内，当然是本可以更好。其前提条件是更加精确地确定目标，同时不是将制度转型当作自我实现的目标，而是当作取得更高目标的工具。这个更高目标指的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并能够弥补历史造成的落后<sup>①</sup>。

将会更好吗？就绝对意义而言，当然是这样。在未来 20 年的转型之后，生产和消费水平将会翻番，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增加三倍。欧盟后社会主义新成员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20 年之后会达到 50000 美元（购买力平价）吗？对于欧洲这个地区的 1 亿人口来说，可能性不大。但某些能够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按地区、而不是按国家来考虑问题）来说，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实现了这个目标的地方，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高于欧盟 15 个“老”成员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当然，后者将会继续发展，将生产和消费增加至少三分之一，但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缩小。不过，即使在 20 年之后，许多方面的差距仍然会明显存在，仍然会导致社会紧张状态和政治问题。

但是，情况也许不会更好，因为主观看法并不取决于对于过去和现在差别的确 定，也不取决于与世界上富裕社会和国家差距的缩小，而完全取决于人们对个人、团体、社会和国家状况的自我评价，所考虑的相关问题包括人们的愿望、期望和主张。无疑，这一切都会高于实现的机会和实际实现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这些愿望、期望和主张将是进一步变革和发展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它们将是导致无休止沮丧的原因。

考虑到未来在这些领域中的增长势头和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情况仍然会比就

---

<sup>①</sup> Kolodko, Grzegorz W., *Globalization and Catching-up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Rochester, NY and Woodbridge, Suffolk, U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

能达到的更差。与以往一样，潜力不会得到充分利用，其原因与过去 20 年相同。在经济政策上，由于不能妥善处理集团利益冲突，未来这个时期肯定会错误百出。究其深层原因，一是不够精确的理论评估所致；二是理论落在现实和没完没了的问题之后。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将总体发展目标具体化和将总体目标分解为分项目标。情况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将会如此。

对于过去 20 年以及之前年代的归纳总结，应当有助于缩小未来 20 年，即 2010-2029 年的潜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即使到 2029 年，仍然会有人像在 1989 年和 2009 年那样提问：“何时最终会更好？”带有讥讽口吻的回答将会是这样：“已然……。”

（潘兴明 译，译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st-socialist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since 1989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It examines its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riticizes the views that this region has institutionally matured to a full-blooded market economy. Instead,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post-socialist market transformation won't develop perpendicularly. There is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market reforms of a real socialism economy and a post-socialist market transform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results would have been better for various countries to various extents if the objectives had been more accurately determined and the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had been treated not as a self-contained aim but as an instrument to achieve the superior aim.

**【Key Words】** Great Transformation, Post-socialist System Transformation, Real Socialism, Emerging Market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еликий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пост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еаль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формирующийся рынок

---

（责任编辑 常喆）

## 金融危机下中东欧转型模式再评估

余南平 李享 吴皓伟 梁菁\*

**【内容提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与政治体制转型是转型问题研究的焦点，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模式也作为一个范例持续得到来自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的关注。本研究以金融危机发生、演化为背景，旨在检测金融危机背景下中东欧国家的整体经济表现与金融市场表现，并通过分析对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转型优等生”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模式进行再评估和反思。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中东欧 转型模式

**【中图分类号】**F13/17.51.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3-0029-(26)

### 一、全球性金融危机与全球市场表现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在2008年秋进一步加剧。自2008年9月以来，虽然各国出台了广泛的政策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和减少信贷损失，但由于信贷市场在全球金融体系“有毒资产”的机体中，其正常运行循环机制被打破，全球范围内的消费、生产和贸易都受到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下跌造成的财富大量缩水，以及房市和股市的高度不确定性继续影响全球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消费不振，投资也明显低迷。总体来说，2009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全球主要国家的外部环境将持续严峻。

当前的危机对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巨大且范围很广。据估算，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工业产出下降4.5%，按经季节调整后的年变化率（SAAR）则是下降20%，其中

\* 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霍普金斯—南京大学中美中心客座研究员，捷克查理大学访问学者。李享、吴皓伟、梁菁均为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工业生产性的企业所受冲击最为明显，而在分区域表现中，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所受影响最为负面，在全球GDP近乎同步迅速下滑的同时，几乎所有世界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2008年第四季度的GDP 都出现同比大幅度下滑。第四季度全球GDP可能下降了5%（季节调整折年率），2009 年第一季度预计出现相似幅度的下降（见图1）。在工业产出创记录下降的背景下，世界贸易增长在2008 年迅速减缓，年终几个月的世界贸易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负增长（图2），似乎对应着全球化减速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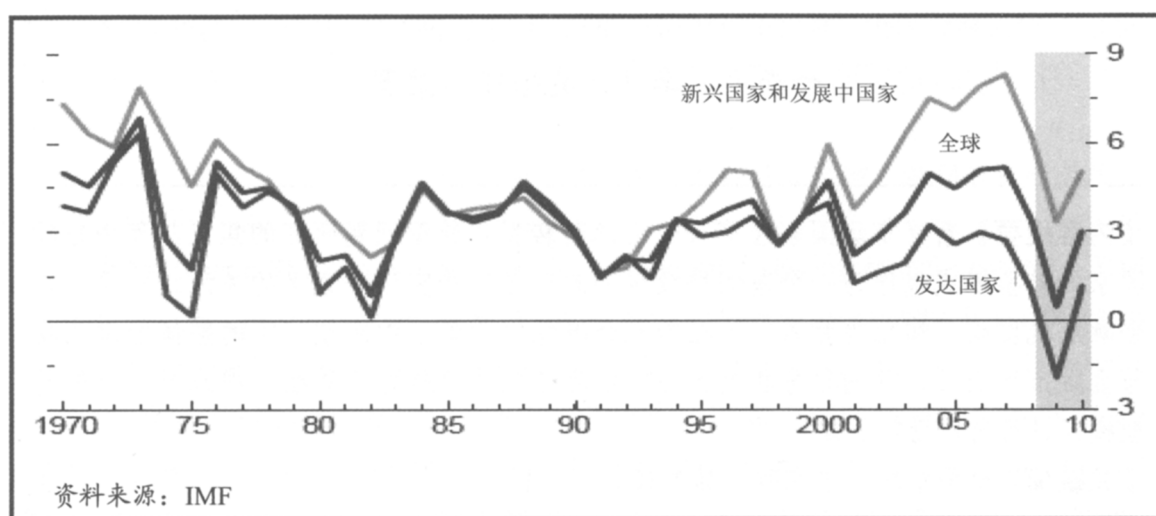


图1 1970-2010 年全球 GDP 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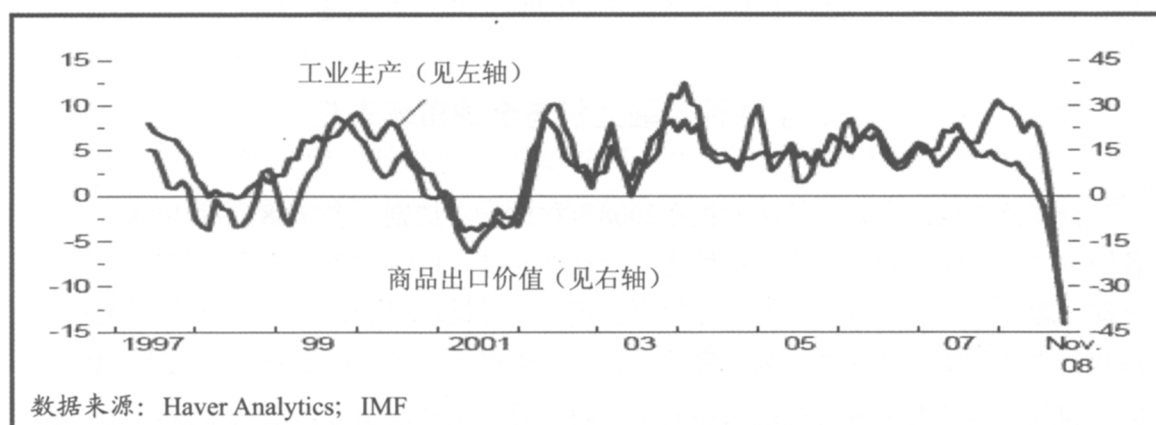


图2 1997-2008年11月全球工业生产与贸易增长率

就金融危机的演化而言，目前，虽然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已经从高点回落后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2008年夏天，以美元标价的能源与谷物价格增长了近80%，使得世界各国都被动承受着通货膨胀的影响，也使得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大幅减少。石油与食品价格的大幅下降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通货膨胀，减轻了消费者的压力（见图3）。但突如其来的通胀-通缩的过程，使得全球许多企业被动地面临着快速的“去库存化”，从而导致的急剧的帐面资产计价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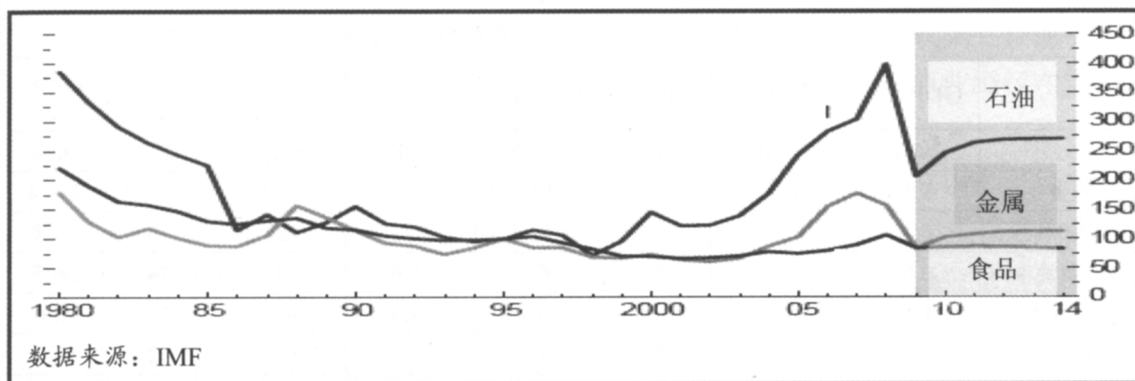


图3 实际产品价格（以1995年为基准）

在金融危机的循环中，由于美国房屋市场价格下跌和债务拖欠率的提高，与房贷有关的金融产品价格暴跌，其影响已经扩散到了其他许多国家的金融与信贷市场。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股市都大跌，在危机最严重阶段，其中美国与欧元区股票市值下跌了40%，中国和俄罗斯的股市下跌了几乎70%（见图4）。

在这样一个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那些之前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转型优等生”的中东欧转型国家，近一年以来的表现如何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市场表现。



图4 2007/1-2008/10 MSCI与S&P500指数

## 二、金融危机对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影响

### （一）金融危机中的中东欧国家总体描述

不幸的是，从数据表现来看，中东欧转型国家不仅没有能够有效抵御此次金融危机，而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东欧国家还面临着经济与金融“双向硬着陆”的风险，出现了典型的“区域性危机”。大部分中东欧国家货币自2008年中旬以来以大幅贬值，宏观经济指标愈加恶化（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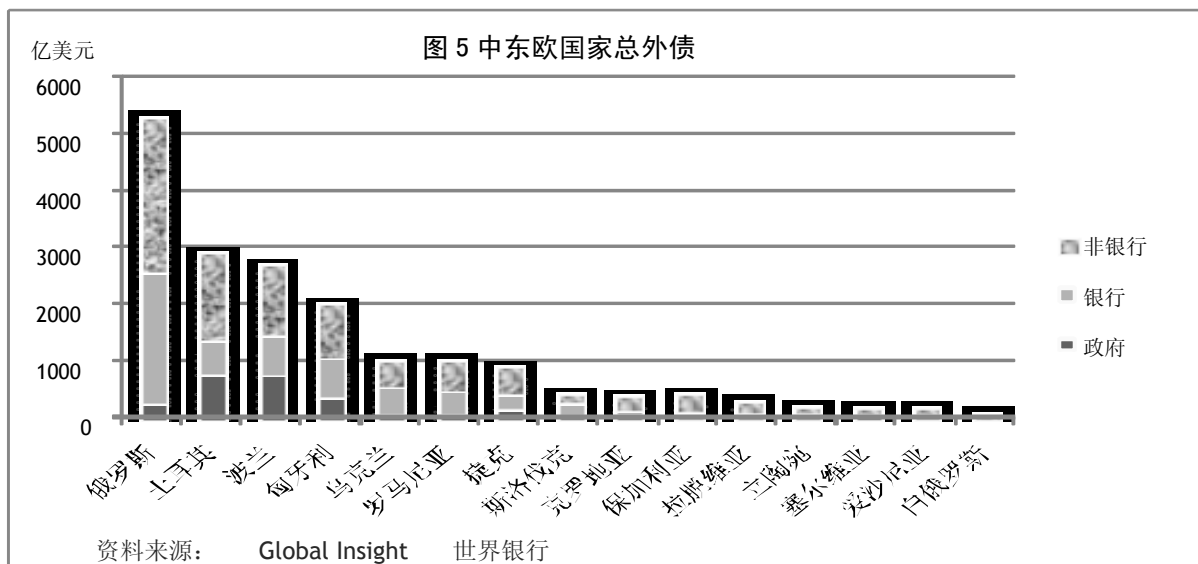
表 1: 中东欧国家宏观经济指标

	GDP 增速 (同比%)		CPI 通胀率 (%)		经常账户 (在 GDP 中的占比)		外汇储备 (十亿美元)	
	2007	2008F	2007	2008	2007	2008F	2007	2008
俄罗斯	8.1	6.0	9.0	14.1	6.1	6.0	465.5	441.4
保加利亚	6.2	5.4	8.4	12.4	-22.0	-22.8	16.4	16.8
捷克	6.0	4.0	2.9	6.3	-1.9	-3.1	34.4	36.5
匈牙利	1.1	0.8	8.0	6.1	-4.9	-5.6	23.8	33.6
波兰	6.7	5.1	2.4	4.4	-4.7	-5.6	62.7	58.9
罗马尼亚	6.0	7.8	4.8	7.9	-13.9	-13.3	37.2	36.7
斯洛伐克	10.4	6.8	2.8	4.6	-5.3	-6.1	18.0	17.8
斯洛文尼	6.8	4.0	3.6	5.7	-4.2	-6.1	0.9	0.8
土耳其	4.6	0.8	8.8	10.4	-5.8	-5.4	73.2	70.5
乌克兰	7.7	2.1	1.3	1.7	-3.7	-6.2	31.8	30.8

数据来源: Datastream, CSI

2009 年 3 月 20 日, 欧洲理事会同意将对中东欧国家的国际收支方面支持扩大至 500 亿欧元, 解决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与流动性危机问题。而分析这些国家难以靠自身能力来克服货币贬值的下行压力, 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巨大的外债负担, 中东欧国家对外债务的巨大敞口是引发该地区危机的重要因素。在这些中东欧国家中, 外债占 GDP 的比重极大(匈牙利 113%、罗马尼亚 51%、捷克 39.3%、波兰 42%、保加利亚 74%, 见图 5)。



事实上，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包括那些得到欧盟东扩经济政策支持的中东欧新兴市场国家近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欧商业银行在当地分行提供的贷款扩张支持和 FDI 资本的流入（在俄罗斯、土耳其、波兰、匈牙利等国还可以看到长期非银行债务融资比率高于短期外债），这些中东欧国家来自外国银行的 1.7 万亿美元贷款中，有约 90% 是来自西欧银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西欧银行已遭遇严重的流动性问题，为满足本国业务的需要，而把资金从新兴欧洲市场撤离，造成新兴欧洲市场货币急速贬值和外汇储备显著下降，使其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少于其在 2009 年内到期的短期外债。可以预见，虽然 IMF 和 EBRD（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伦敦 2009 年 4 月的 G20 峰会前后，已经对中东欧国家提供了紧急流动性支持，但预计未来一个时段内中东欧国家向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通过向欧盟组织寻求进一步的金融支持还会增加。

2、区域性外债违约风险显著存在。从数据角度分析，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外汇储备难以支付其三个月的进口额以及 2009 年的到期外债。因此，这些国家主权债务和企业融资债务都存在违约的风险（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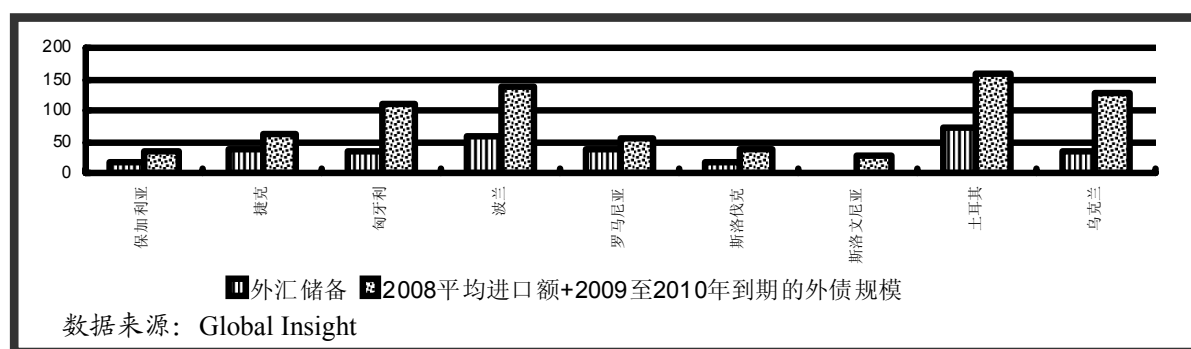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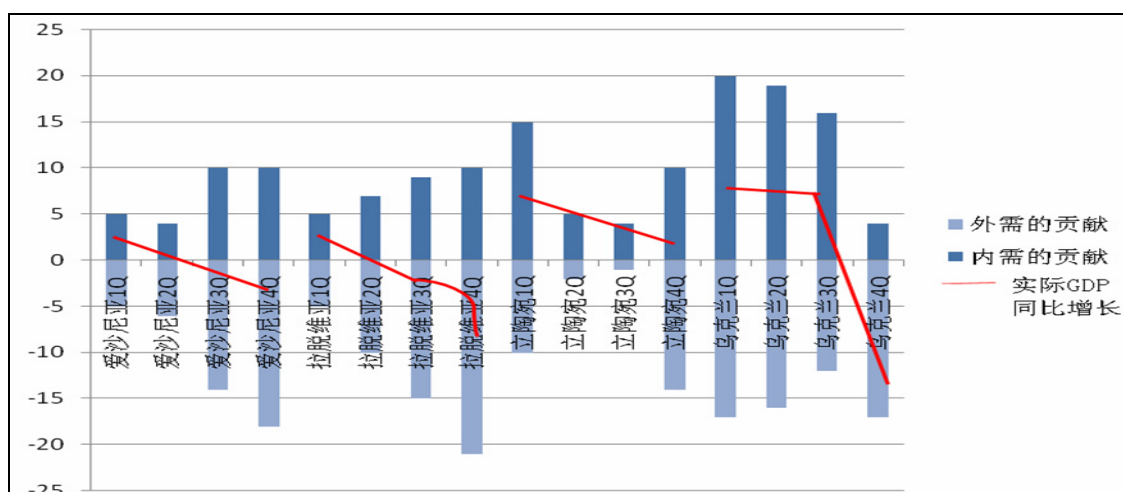


图 6 中东欧外汇储备与三个月进口额及 2009—2010 到期外债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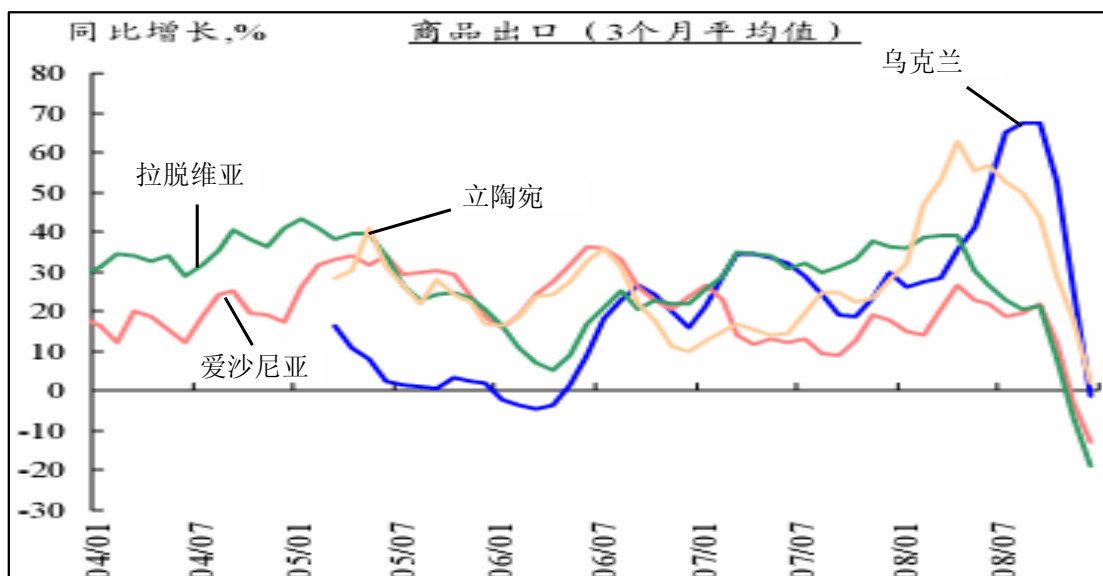
3、出口萎缩以及国内需求锐减，加之政府财力与外汇储备不足，使其难以采用非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和拉动内需。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与乌克兰的经济已经严重萎缩，病有崩溃的风险（见图 7、8）。

显而易见，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首先造成了这些国家货币汇率不可控制地大幅下滑。同时股票市场也走低，价格下跌了约 22%-25%，达到这些国家近三、四年股市的最低点（见表 2、图 9）。这样反过来更会增加银行外债的违约风险。



数据来源: Global Insight

图7 波罗的海三国与乌克兰 2008 年实际 GDP 情况



数据来源: Global Insight

图8 波罗的海三国及乌克兰 2004-2008 年商品出口增长情况

表2 中东欧国家汇率、股市情况

中东欧国家	2009 年至今			08 年 9 月至今		
	兑美元汇率	对欧元汇率	股市指数	兑美元汇率	对欧元汇率	股市指数
保加利亚	-9	0	-26	-14	0	-74
捷克	-13	-4	-25	-24	-12	-57
爱沙尼亚	-9	0	-2	-14	0	-51

匈牙利	-20	-11	-17	-32	-21	-51
拉脱维亚	-10	0	—	-14	0	—
立陶宛	-9	0	-10	-14	0	-62
波兰	-19	-11	-23	-38	-28	-47
罗马尼亚	-15	-6	-35	-29	-18	-65
俄罗斯	-18	-10	-14	-31	-21	-67
斯洛伐克	-9	0	8	-13	0	-25
土耳其	-9	0	-11	-30	-19	-40
乌克兰	-6	3	-30	-46	-37	-60

注：截至 2009 年 2 月数据；斯洛伐克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采用欧元作为其货币。  
数据来源：彭博、中金公司研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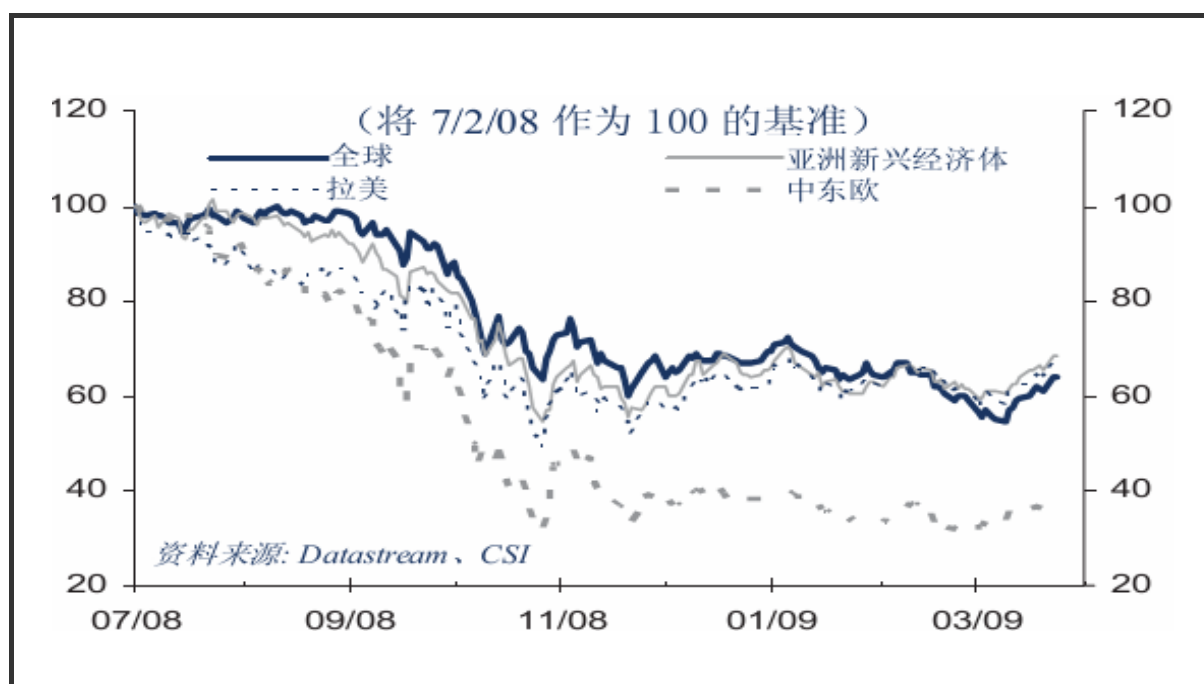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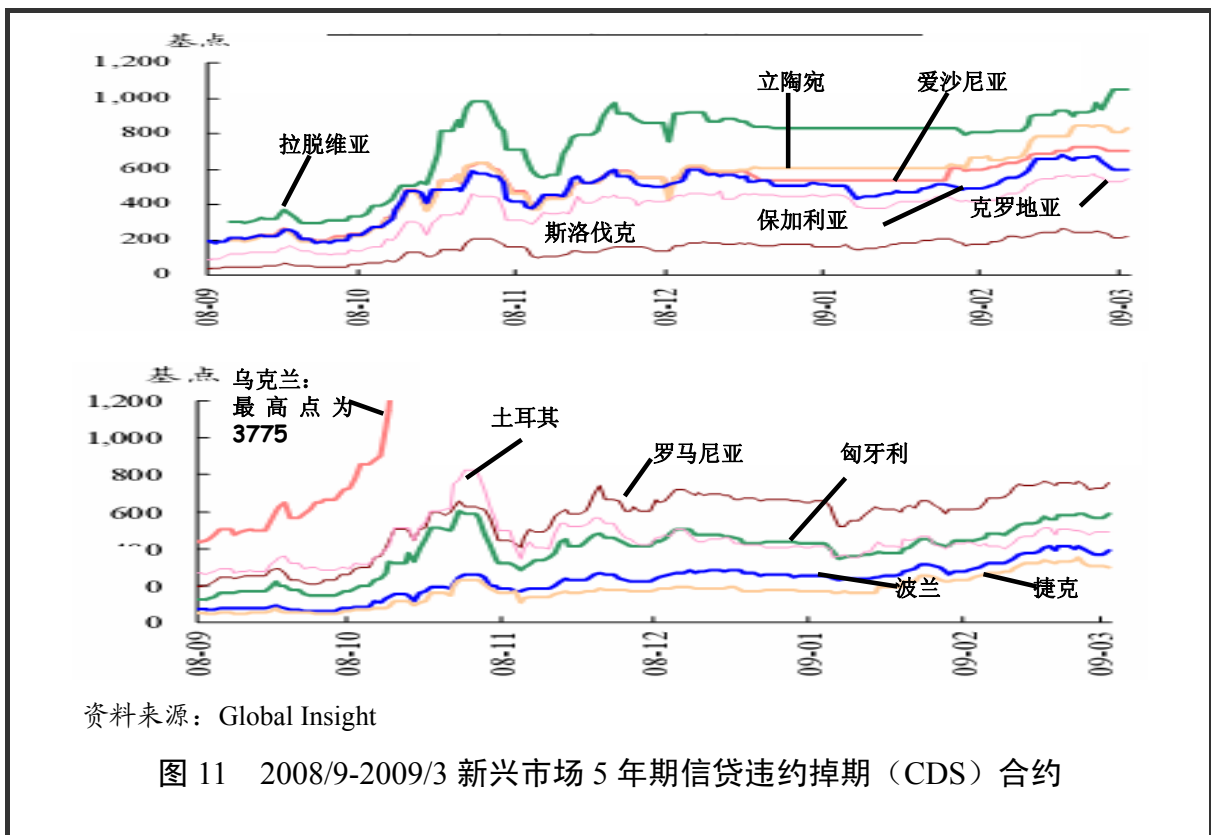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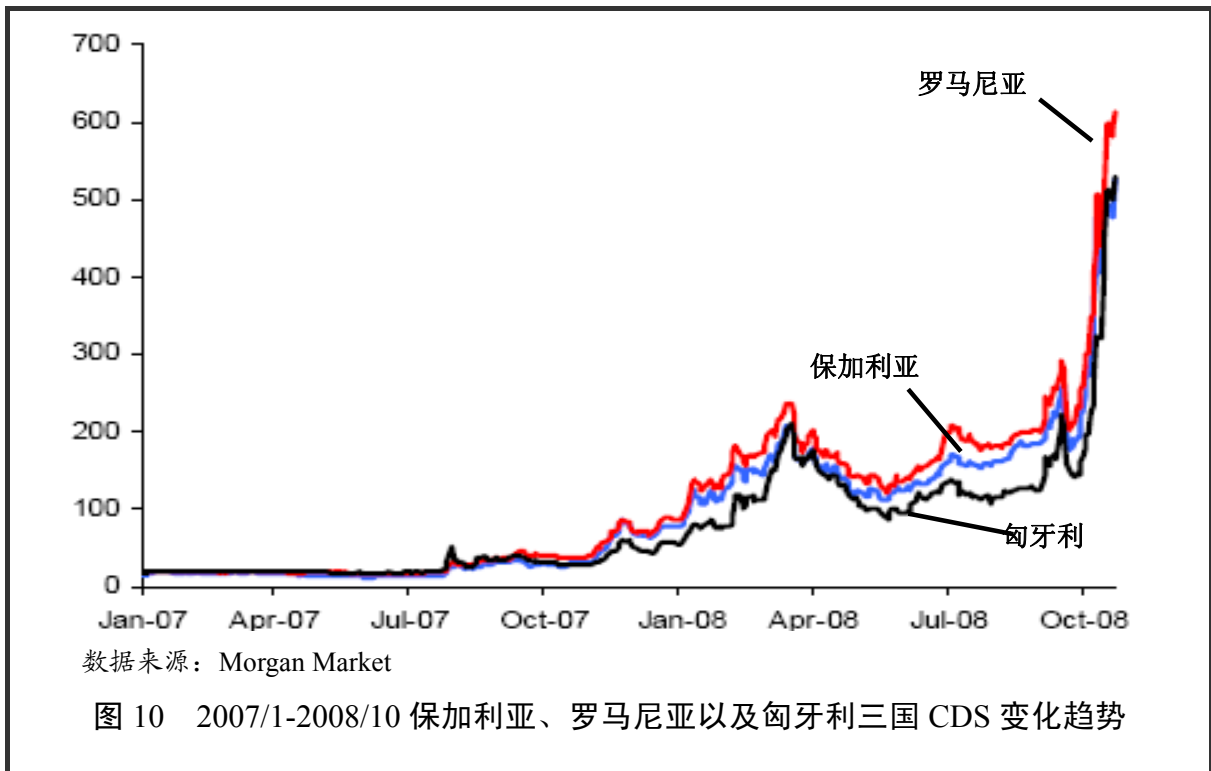


图 9 2008 年 1 月-2009 年 3 月 MSCI 指数变化趋势

此外，如果我们采用信用违约互换（CDS）指标，可以发现在大多数波罗的海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等国有关该指标的各类数据都在急剧放大（见图 10、11）。



而从图 12 中, 我们可以发现, 外汇风险与市场认知违约风险之间有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如果还伴随着货币强烈贬值的话，在这些拥有大规模资产负债不匹配的国家，情况就会更加糟糕。此外，即使最近在其中一些国家资产负债情况被可控汇率所掩盖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这些汇率政策是否能够持续地抬高风险溢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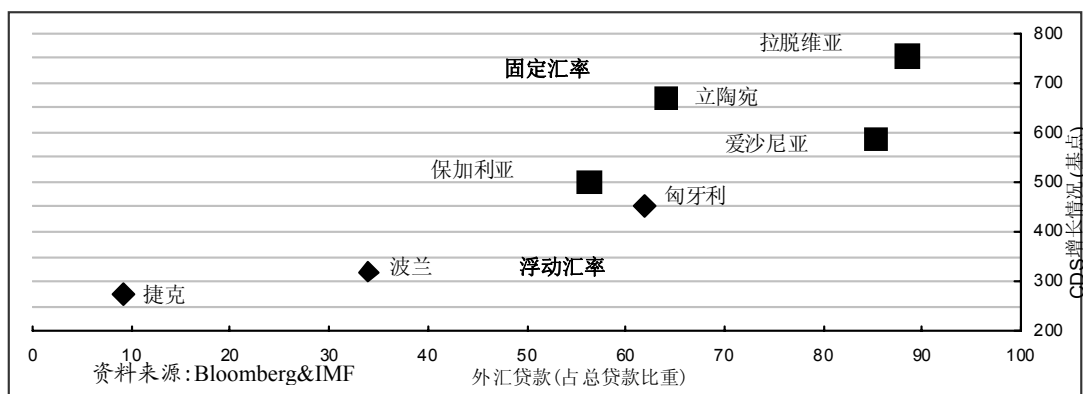


图 12 2008.1—2009.2 外汇贷款与 CDS 之间关系一览

以拉脱维亚为例，5 年期信用违约互换已经上升到超过 900 个基点。与之相似的是，以外币计价的债券价格也大幅上升。这些国家还面临着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反映在迅速增长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上。拉脱维亚在 08 年前两周隔夜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提高了一倍多。而拉脱维亚承诺落实其经济稳定计划，维持货币稳定，LAT 与欧元挂钩，1 个 LAT 等于 0.702804 欧元，汇率幅度不超过 1%。同时，罗马尼亚三月期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已经上升到 14.6%（见图 13）。因此，为了稳定汇率，这些国家不得不忍受高利率困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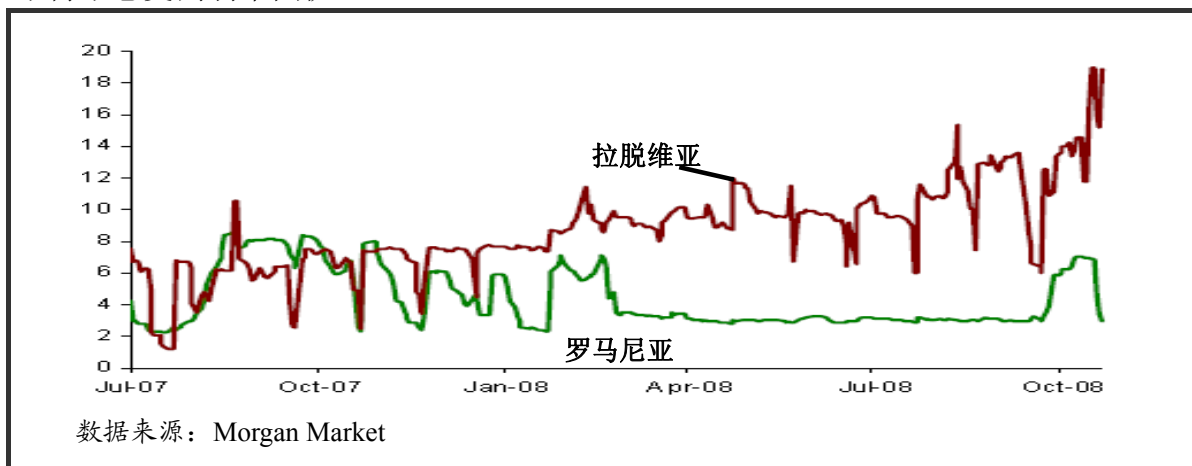


图 13 2007/1-2008/10 拉脱维亚与罗马尼亚银行间拆借利率变化

这些金融市场数据表明，面对金融危机，中东欧国家不仅面对实体经济和外贸进出口急剧下降的影响，同时最重要的是其金融体系面临全面风险。

## （二）金融危机下中东欧国家具体个案分析

在这次经济危机冲击中，匈牙利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尽管匈牙利政

府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削减了财政赤字，努力减少对外部投资的依赖，但是由于其之前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对欧盟的出口以及以外汇计价的私人信贷，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受到的风险就首当其冲。尽管匈牙利净对外开放只占其 GDP 的 54%，远低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冰岛（达到 270%），其总外债已经达到了其 GDP 的 113%。而且，短期外债占匈牙利全部外债的 10%左右，这几乎等于其所有的外汇储备。由于银行部门的货币错配，导致匈牙利外汇储备结构主要是以欧元和瑞士法郎为主。在金融危机中，由于避险的需求，全球瑞士法郎的流动性短缺，使得匈牙利本国的投资者对匈牙利银行提供相对便宜的瑞士法郎贷款的能力提出了质疑。而股市的暴跌，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枯竭，福林相对欧元贬值了 13%。由于外国投资者大幅减少了传统上达到 3-3.4 万亿福林规模的政府债券的购买，匈牙利的债权收益曲线达到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毫无道理的高度（见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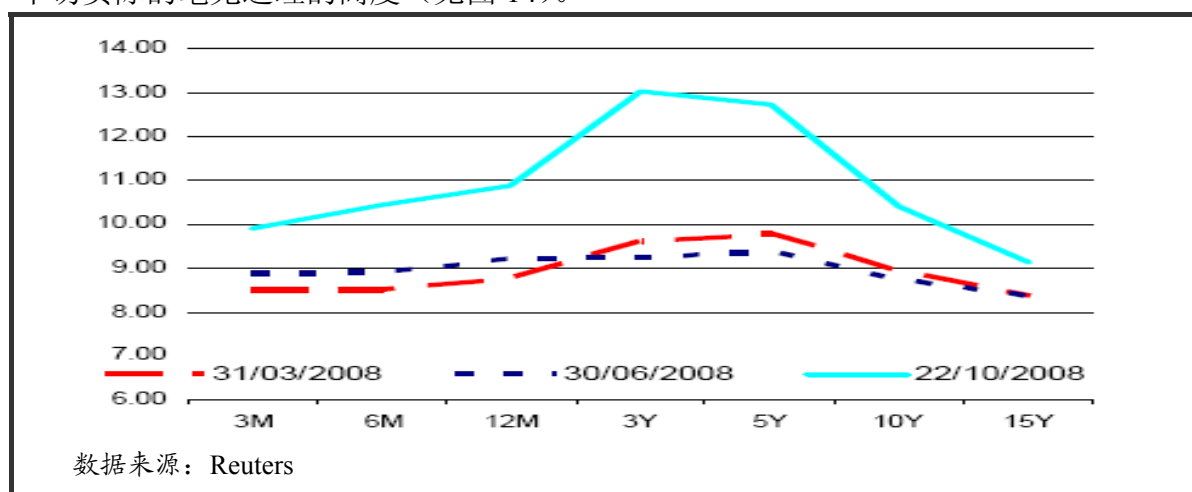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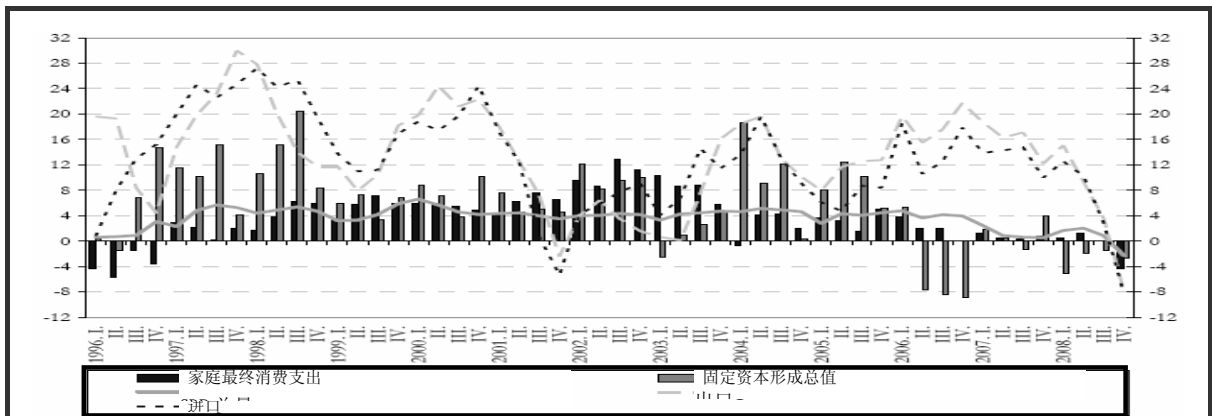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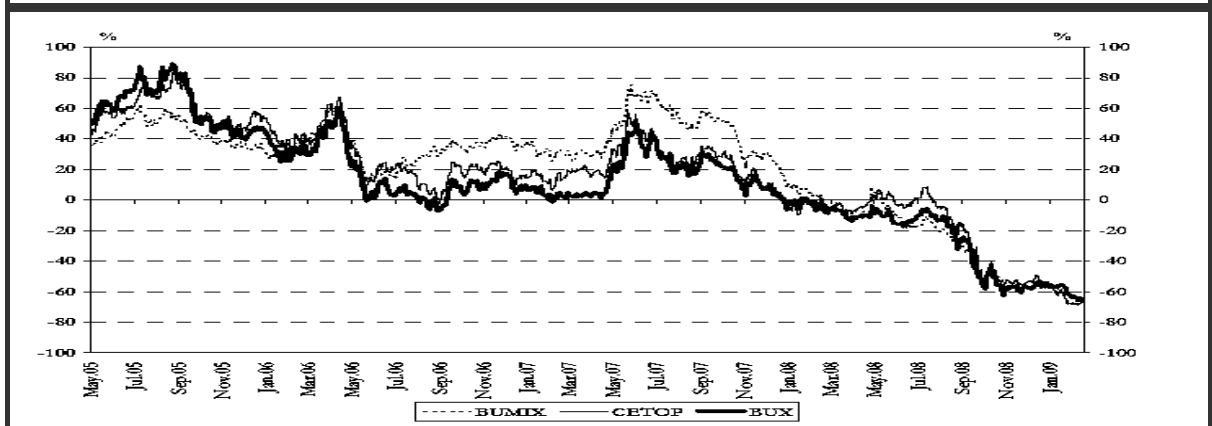
图 14 匈牙利 2008 年前三季度债权收益曲线

图 15 主要关注匈牙利 GDP 增幅情况及其组成部分。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自 2007 年以来，匈牙利的 GDP 增长率急剧下滑，至 2008 年已经为负增长，其中快速下滑的部门是出口与固定资产形成。而如图 16 所示，以 2006 年 1 月为基准的话，至 2009 年 1 月，匈牙利股市已经下跌了近 60%。图 17 体现的是自 2005 年 5 月以来，匈牙利货币福林对瑞士法郎、欧元以及美元的汇率变化情况。我们发现，从 2008 年至 2009 年 2 月，福林对三种主要外汇的汇率波动十分剧烈。而从反映对外债务水平的图 18、19 中我们可以发现，匈牙利不论是净外债水平还是总公共债务水平在近几年都呈现出大幅上升的趋势。其中，银行与企业的外债增长十分显著。正如图 20 所示，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匈牙利的外债和公共债务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这也是其历史最高点。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与此类似的是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问题主要也在于外债的比例过高，其背后隐藏的风险也是巨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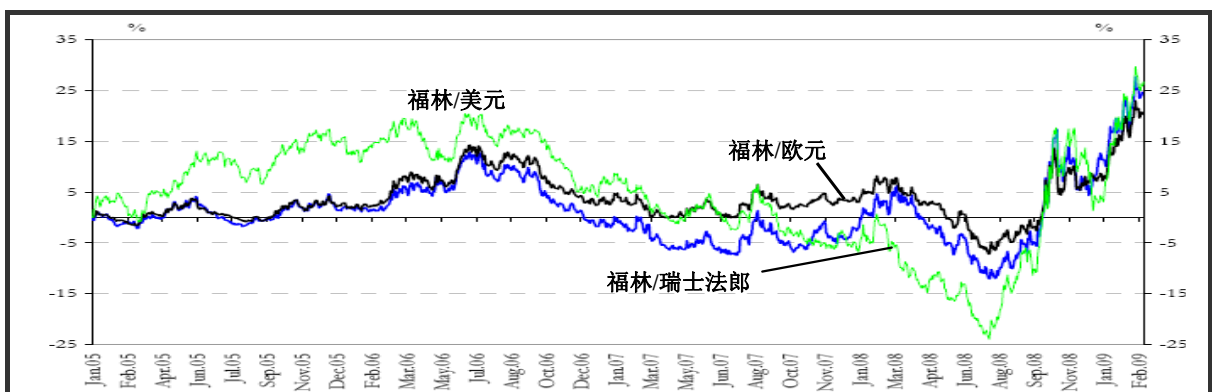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HCSO

图 15 1996-2008 年匈牙利 GDP 增长情况及其构成 单位: %



资料来源: BSE, fortfolio.hu

图 16 2005/5-2009/1 匈牙利三大股指的变化



资料来源: Reuters

图 17 2005/1-2009/2 福林对瑞士法郎、欧元、美元汇率波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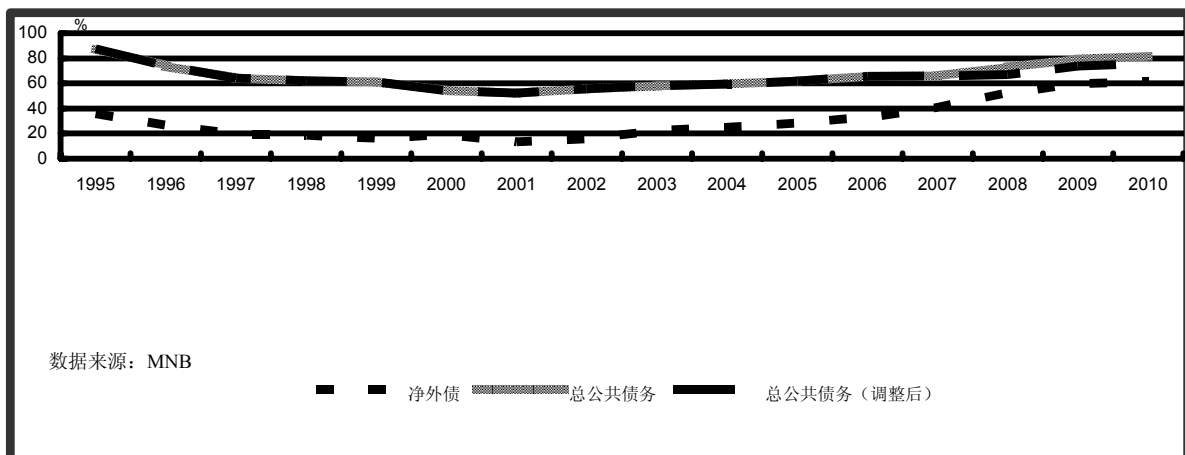


图 18 1995-2010 年匈牙利净外债及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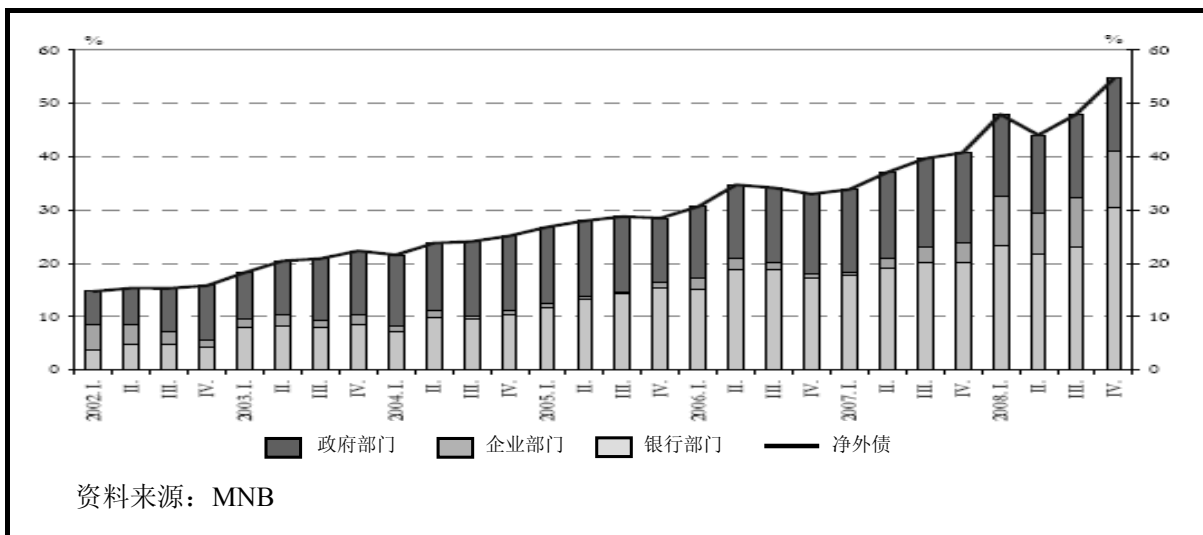


图 19 2002-2008 年匈牙利分部门净债务所占 GDP 的比例

简而言之，匈牙利的情况在中东欧国家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它大体上反映了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和金融体系转型中出现一系列致命问题。

### 三、中东欧国家转型模式的问题

从总体上说，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加以概括。从经济角度说，由于中东欧转型国家纷纷加入欧盟或者准备加入欧盟，国内市场面向外国全面开放，特别是金融市场在自身金融体系尚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完全暴露于国际大环境之下，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因素，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导火索。从政治角度说，中东欧转型国家普遍走的是快速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在政治民主上不十分成熟的情况下快速民主化的必然结果是政局的动荡，从而也对阻碍了

经济的进一步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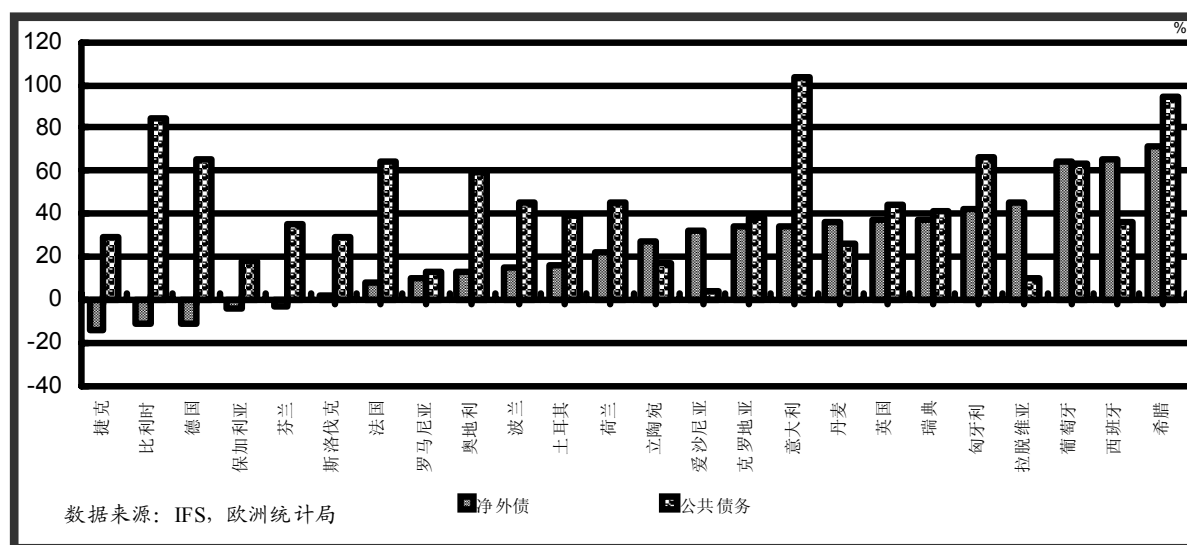


图 20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欧洲各国净外债及公债占 GDP 之比重

### (一) 转型国家的金融体系开放与外债依赖模式

首先, 中东欧转型国家的金融体系模式问题。从评估数据看, 中东欧国家金融体系普遍脆弱, 国际应对经验欠缺 (见表 3)。从表格 3 中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评估), 我们可以发现, 尽管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 但能够达到 4 分以上的国家以及领域并不多, 而且, 很多国家在过去 10 年里分数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没有任何的提高, 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 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可能存在着, 事实上的确存在着很大问题, 只是他们并没有遇到如此激烈的金融风暴, 体系的弊端并没有显露出来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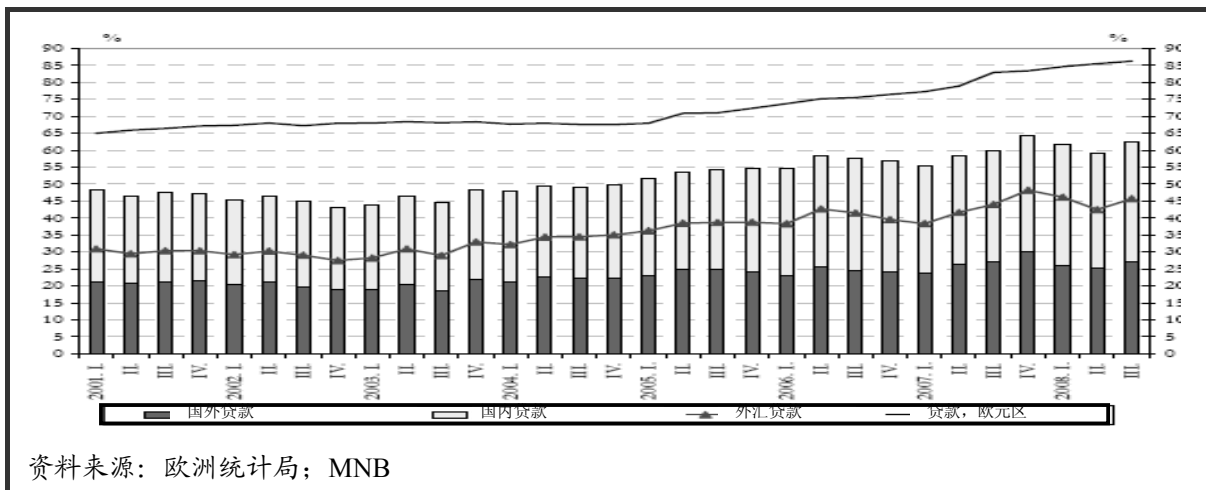
另外, 中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等银行体系过度开放, 许多国家按照美国的金融模式进行构造和运作。但因金融机构弱小、债务过重、应对危机管理水平偏低, 一些中东欧国家模仿美国的高赤字、高举债经济模式, 对外部的依赖度较高, 如匈牙利的外债高达 GDP 的 60%, 且外债的 1/3 是以外币方式存在的 (见图 21、22)。此外, 拉脱维亚的经常项目赤字也高达 20% 以上。由于过分偏重借助外资加快发展, 加上加入欧盟的便利条件, 2007 年中东欧吸引了全球新兴市场流入资金约 7800 亿美元的近一半。其中, 大部分体现为外资对当地银行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购买, 而吸引的外资又被大量投入到美国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购买。从 2007 年下半年开始, 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 一度被称为外资天堂的中东欧在西方资金短缺大量抽逃时, 其经济因“失血过多”而陷入困境, 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巨大。

表3 欧洲主要转型国家绩效评估

国家	金融市场改革						贸易及汇率体系自由化		
	银行改革和利率自由化			证券机构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自由化		
	1989	1999	2008	1989	1999	2008	1989	1999	2008
白俄罗斯	1.00	1.00	2.00	1.00	2.00	2.00	1.00	1.00	2.33
保加利亚	1.00	2.67	3.67	1.00	2.00	3.00	1.00	4.33	4.33
捷克	1.00	3.33	NA	1.00	3.00	NA	1.00	4.33	NA
爱沙尼亚	1.00	3.67	4.00	1.00	3.00	3.67	1.00	4.00	4.33
匈牙利	1.00	4.00	4.00	1.00	3.33	4.00	2.00	4.33	4.33
拉脱维亚	1.00	3.00	4.00	1.00	2.33	3.00	1.00	4.33	4.33
立陶宛	1.00	3.00	3.67	1.00	2.67	3.33	1.00	4.00	4.33
波兰	1.00	3.33	3.67	1.00	3.33	3.67	1.00	4.33	4.33
罗马尼亚	1.00	2.67	3.33	1.00	2.00	3.00	1.00	4.33	4.33
俄罗斯	1.00	1.67	2.67	1.00	1.67	3.00	1.00	2.33	3.33
斯洛伐克	1.00	2.67	3.67	1.00	2.33	3.00	1.00	4.33	4.33
斯洛文尼亚	1.00	3.33	3.33	1.00	2.67	3.00	2.00	4.33	4.33
乌克兰	1.00	2.00	3.00	1.00	2.00	2.67	1.00	3.00	4.33

注：指标分数区间为 1-4+，超过 4 分表示该国在领域的改革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国家市场经济的标准水平。

资料来源：ERBD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MNB

图21 2001-2008匈牙利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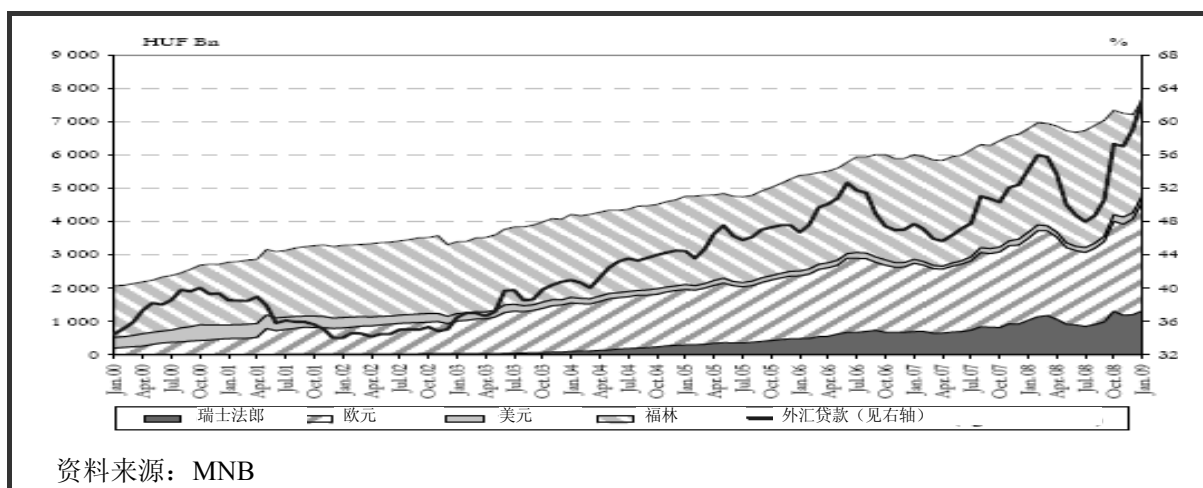


图 22 2000/1-2009/1 匈牙利非金融企业债务构成

其次，金融市场开放与结构构造问题。中东欧转型国家的金融市场普遍为外资银行所控制（见表 4）。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无论对公有部门还是对私有部门的信贷规模都在逐年增长。但很明显，作为放贷者，国有银行的地位已逐渐为外资银行所取代。1993 年，国有银行还是公有部门及私有部门贷款的主要来源；而到 2000 年，外资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已控制了这两个市场。除捷克外，其他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外资银行对私有部门的贷款自 1998 年起就已经超过对公有部门的贷款，且国有银行一直主要向公有部门放贷。除斯洛文尼亚外，其他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外资银行则更大比例地向私人放贷。最典型的例子是爱沙尼亚，其国有银行几乎不给私有部门提供信贷，私有部门的贷款基本由外资银行承担。然而，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外资银行必然收缩项目活动，带给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就是无法控制的巨大的流动性缺口。

表 4 2005 年外资银行在中东欧转型国家市场的占有率

国 家	外资银行所占市场份额 (%)
斯洛伐克	95
克罗地亚	92
捷克	84
保加利亚	80
匈牙利	76
波罗的海国家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69
波兰	65
罗马尼亚	57
斯洛文尼亚	38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05 年 5 月 1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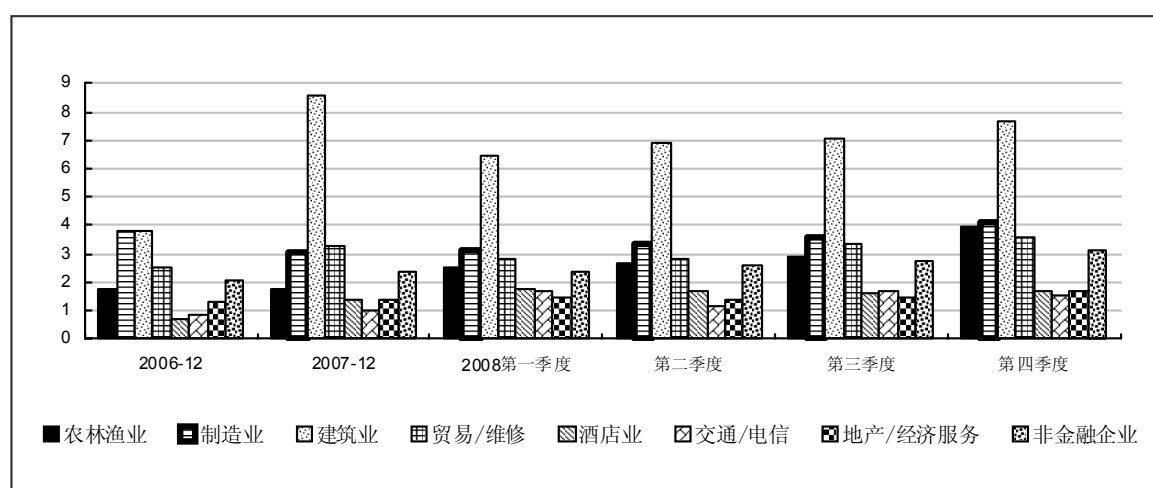
再次，债务结构与金融结构构成问题。由于传统原因，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呆坏

账比例普遍较高（见表 5）。理论上，我们认为，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一国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而债务结构则构成了金融体系的风险链。而如果我们拿这个标准去分析中东欧转型国家的金融结构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中东欧各国在债务结构上，存在不同方面的失当，但房地产贷款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高则是其共有特性（见图 23），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加入欧盟后，中东欧各国开始大量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并放大了地产债务规模。而由于房地产价格本身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当金融危机爆发时，房地产不仅出现价格下降，同时其贷款收益也急剧下降，致使银行呆账、坏账不断增加，不良资产增加直接损害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使银行资本充足率趋于下降，加重了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以匈牙利的债务资产结构分析为例，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解释这一在中东欧转型国家所普遍存在的债务结构问题（图 24、25 及 26）。

表 5 加入欧盟前转轨国家银行呆账比例及银行对私有部门的信贷（占 GDP 比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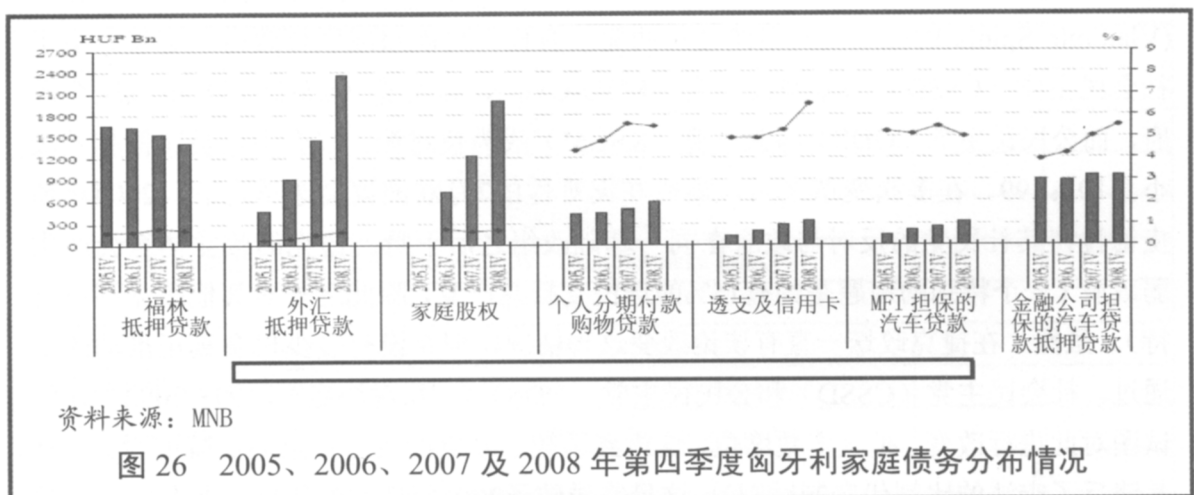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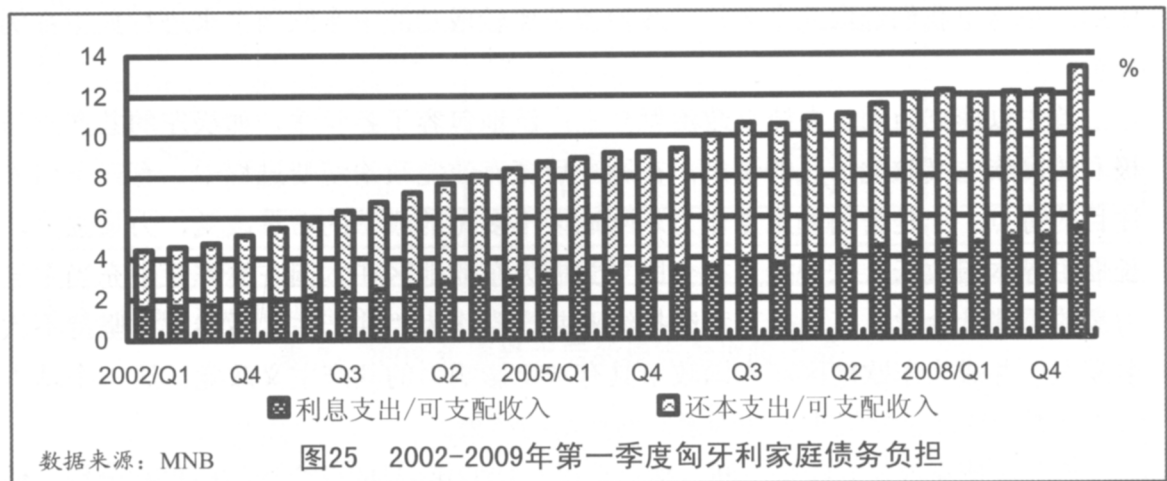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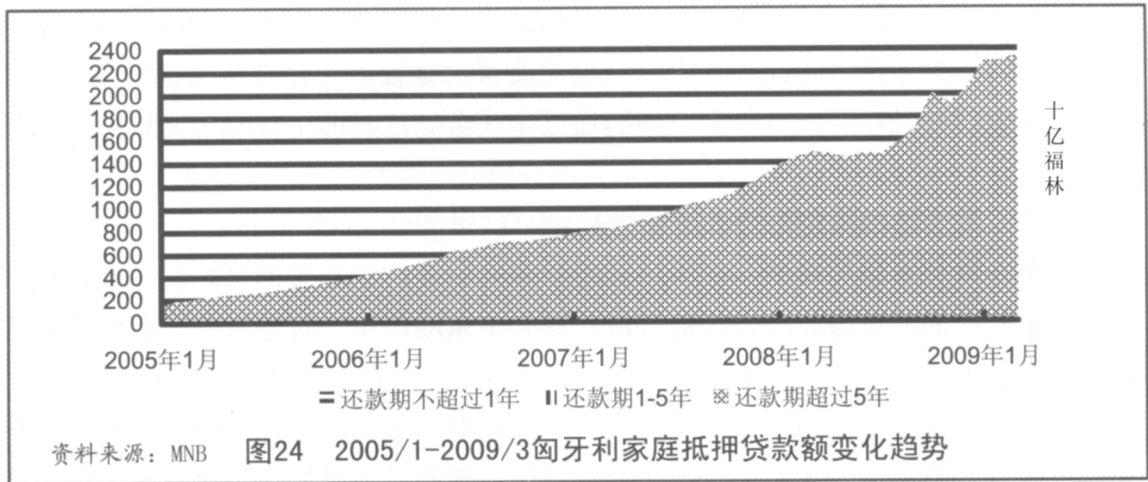
国家	指标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波兰	呆账	16.5	26.8	36.4	34.7	23.9	14.7	11.5	11.5
	私有部门信贷		10.9	11.4	12.2	12	12.7	15.9	18.1
匈牙利	呆账	9.4	20.7	25.6	30.2	10.3	7.2	3.6	5.9
	私有部门信贷	46.3	38.8	33.2	28.2	26.2	22.3	21.7	23.4
斯洛文尼亚	呆账	—	—	—	22	13.2	14.3	12.5	11.5
	私有部门信贷				50.8	57.8	58.1	55.9	66.3
斯洛伐克	呆账	—	—	—	30.3	41.3	31.8	33.4	44.3
	私有部门信贷		34.9	23.3	22.1	22.5	27.5	28.8	28.6
保加利亚	呆账	—	—	12.2	6.8	12.6	14.6	12.9	—
	私有部门信贷				32.1	24.3	27.8	32	44.2
罗马尼亚	呆账	—	—	6.6	18.5	37.9	48	57	34.2
	私有部门信贷		7.2	5.8	3.7	3.8	21.1	35.6	12.6
俄罗斯	呆账	—	—	—	—	5.9	5.1	3.5	4.6
	私有部门信贷						11.4	8.5	

资料来源：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资料来源：MNB

图 23 截至 2006/12、2007/12 及 2008 年匈牙利行业贷款变化比较 (%)



上述分析表明，在转型的中东欧国家，金融业高度开放，大量对外负债的产生一度被认为是对外开放的“典范”，但金融危机爆发时，快速的资本抽逃，使得“开

放市场裸露”的危险迅速发生在中东欧，而这样的例子曾经发生在1984和1990年的拉美和1997年的亚洲。由此，对于转型模式而言，金融市场开放与控制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并且在实践操作上，我们通过本次金融危机的中东欧国家已经看到足够的证明。

## （二）政治结构稳定与经济持续增长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在国际转型学研究中被广泛推崇的是，民主政治模式可以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与持续地开放。而且中东欧国家一直是以此为范例的。那么我们观察所谓“民主化”以后的中东欧，我们又可以看到何种情况呢？

事实上，从政党结构的角度来看，中东欧转型国家也普遍存在政局不稳定的情况，按西方转型理论结论而定论，这无疑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也是有着明显的阻碍作用。在这里我们选取几个公认的政治改革比较成功的中东欧国家来进行典型案例分析。

首先以捷克为例。在捷克政治舞台上广泛地包容了各党派，如极左的共产党与极右的民族主义政党。总的说来，在剧变后捷克政党政治演变过程中，有三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是公民民主党作为东欧地区不多见的成熟的右翼政党，力量强大，长期主导本国政坛；二是捷克社会民主党成为东欧地区在本国左翼阵营中充当主导力量的重建社会党；三是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作为“共产主义后继党”坚持不改名易帜，并成为东欧地区在本国政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共产主义政党。这三个基本特点，是捷克政治发展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近几年捷克政坛的纷争不断，捷克选民在2002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再次分裂，使得社会民主党（ČSSD）与共产党获得多数，但由于社民党弗拉基米尔·斯皮德拉（Vladimír Špidla）的强烈反共情绪使得两党没有任何可能组成联合政府。这就产生了社会民主党（ČSSD）与基督民主党（KDU-ČSL）、自由党（US-DEU）组成联合政府，而公民民主党（ODS）与共产党（KSČM）成为反对派。议会中议员比例相差极小为101：99。在多次变革之后，最终在灾难性的7月欧洲议会选举之后，2004年斯皮德拉在其社民党的反对与政府在同一基础改组之后下野。捷克的政党体系会产生弱政府（一个特别的问题是约有15%的选民支持共产党，除此之外对其他政党都不支持）。虽然，在捷克政坛一直有谈论改变这种情况，但是没有多少机会真正推动改革通过。社会民主党（ČSSD）和公民民主党（ODS）在“反对协定”（1998-2002）期间试图对此进行改变，扩大大多数席位，这遭到了较小政党的反对和最高法院的否决（称其违反了宪法的比例代表制原则）。这最终导致了2006年选举的僵局，即左翼和右翼各获得100个席位。2006年，议会推翻了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的否决令。在2007年1月19日，公民民主党（ODS）的领袖米雷克·托波拉内克（Mirek Topolánek）

领导公民民主党（ODS）、基督民主党（KDU-ČSL）以及绿党组成联合政府，赢得选举。2009年3月23日托波拉内克政府失去信任，众议院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正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捷克政府内阁被反对党和联合政府中执政党的背离者一道推翻，这是捷克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议会通过不信任案让政府下台。

表6 2006年7月捷克众议院选举结果

政党或政党联合	票数	%	席位
公民民主党（Občanská demokratická strana）	1892475	35.28	81
捷克社民党（Česká strana sociálně demokratická）	1728827	35.32	74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Komunistická strana Čech a Moravy）	685328	12.81	26
基督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Křesťansko-demokratická unie – Československá strana lidová）	386706	7.23	13
绿党（Strana zelených）	336487	6.29	6
SNK 欧洲民主（SNK Evropští	111724	2.09	0
其他	207429	3.88	0
<b>总计</b>	<b>5348976</b>	<b>100</b>	<b>200</b>

数据来源：Czech Statistical Office

表7 2008年选举之后的捷克参议院组成

政党	席位
公民民主党（Občanská demokratická strana）	35
捷克社民党（Česká strana sociálně demokratická）	29
基督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Křesťansko-demokratická unie – Československá strana lidová）	7
<b>SNK 联盟：</b>	
SNK 欧洲民主(SNK Evropští demokraté)	1
独立运动(Hnutí NEZÁVISLÍ)	1
独立区市长(Nezávislí starostové pro kraj)	1
<b>开放民主联盟：</b>	
自由联盟--民主联盟(Unie svobody - Demokratická unie)	1
绿党(Strana zelených)	1
社会开放政党(Strana pro otevřenou společnost)	1
联合民主—独立联盟（Spojení demokraté - Sdružení nezávislých）	1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Komunistická strana Čech a Moravy）	3
<b>总计</b>	<b>81</b>

数据来源：Czech Statistical Office

如果说，捷克的政治不稳定还是建立在均衡不稳定的基础上的，那么下面我们



再来看看波兰和匈牙利的政党情况。

表8 2007年10月波兰国家议会选举结果

政 党	众议院				参议院	
	票数	%	席位	+/-	席位	+/-
公民纲领 (Platforma Obywatelska, PO)	6701010	41.51	209	+76	60	+26
法律与正义 (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PiS)	5183477	32.11	166	+11	39	-10
左翼与民主党 (Lewica i Demokraci, LiD)	2122981	13.15	53	-2	—	—
波兰人民党 (Polskie Stronnictwo Ludowe, PSL)	1437638	8.91	31	+6	—	-2
波兰自我保卫 (Samoobrona RP, SRP)	247335	1.53	—	-56	—	-3
波兰家族联盟 (Liga Polskich Rodzin, LPR)	209171	1.30	—	-34	—	-7
波兰劳动党 (Polska Partia Pracy, PPP)	160476	0.99	—	—	—	—
妇女党 (Partia Kobiet, PK)	45121	0.28	—	—	—	—
德意少数民族 (Mniejszość Niemiecka, MN)	32462	0.20	1	-1	—	—
爱国自卫队	2531	0.02	—	—	—	—
独立党 (Niezależni)	N/A	N/A	N/A	N/A	1	-4
<b>总计</b>	<b>16142202</b>		<b>460</b>		<b>100</b>	
已登记的选民: 30615471 票数: 16477734 (53.88%) 无效票: 335532 有效票: 16142202						

数据来源: Polish parliamentary election, 2007

表9 2005年10月波兰总统选举结果

候选人与政党	第一轮得票	%	第二轮得票	%
<b>Lech Kaczyński-法律与正义</b>	<b>4947927</b>	<b>33.1</b>	<b>8257468</b>	<b>54.04</b>
<b>Donald Tusk-公民纲领</b>	<b>5429666</b>	<b>36.3</b>	<b>7022319</b>	<b>45.96</b>
Andrzej Lepper-波兰自我保卫	2259094	15.1		
Marek Borowski-波兰社会民主党	1544642	10.3		
Jarosław Kalinowski-波兰人民党	269316	1.8		
Janusz Korwin-Mikke-现实政治联盟	214116	1.4		
Henryka Bochniarz—民主党	188598	1.3		
Liwiusz Ilasz	31691	0.2		
Stanisław Tymiński-全波兰公民联盟	23545	0.2		
Leszek Bubel-波兰国家党	18828	0.1		
Jan Pyszko-波兰国家组织-波兰联盟	10371	0.1		
Adam Słomka-波兰联合会-自由与工作	8895	0.1		
<b>总计</b>	<b>15046350</b>	<b>100</b>		

资料来源: Polish politicians

表 10 2006 年匈牙利国民议会选举

政 党	得票数	%	第一轮	%	第二轮	%	席位
匈牙利社会党 (MSZP)	2336705	43.2	2175316	40.3	1510360	46.6	186
自由民主联盟 (SZDSZ)	351612	6.5	340750	6.3	64501	2.0	18
MSZP-SZDSZ 联合候选			154616	2.9	72802	2.3	6
民盟 (FIDERSZ) — 基督 民主人民党 (KDNP)	2272979	42.0	2269244	42.0	1511426	46.7	164
匈牙利民主论坛 (MDF)	272831	5.0	238570	4.4	15973	0.5	11
FIDERSZ/KDNP-MDF 联合候选人			34109	0.6	33029	1.0	0
MDF 与其他政党联合 候选人			14838	0.3	3640	0.1	0
MIÉP-Jobbik 第三条道 路联盟政党	119007	2.2	92802	1.7	231	0.01	0
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	21955	0.4	16379	0.3			0
中间党	17431	0.3	14126	0.3			0
Somogy 协会			9457	0.2	13329	0.43	1
<b>总 计</b>	<b>5408050</b>	<b>100</b>	<b>5403691</b>	<b>100</b>	<b>3239752</b>	<b>100</b>	<b>386</b>

资料来源: <http://www.valasztas.hu/>

从上述两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其政治结构不稳定, 特别体现在议会中政党主导多元化, 分散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从上述几个国家的政党情况来看, 最明显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在中东欧转型国家中, 普遍存在着两个力量相当的政党或政党联盟。与此同时, 却没有哪个政党或者政党联盟能够占据议会的绝对多数, 他们往往需要与其他政党结成执政联盟才能组阁。然而这种政党联盟往往是脆弱的, 特别是在经济动荡时。例如, 匈牙利现任总理久尔恰尼现年 47 岁, 2004 年 9 月出任总理, 2006 年经选举获得连任。由于原执政盟友自由民主联盟因不满久尔恰尼改革而退出联合政府, 社会党政府去年 5 月至今一直处于少数派执政, 其间遭遇历时数以月计的街头抗议。多数在野党一直要求政府辞职并提前举行国会选举。少数派执政和在野党抗议均未能动摇久尔恰尼的根基。然而, 自匈牙利遭遇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全面袭击以来, 久尔恰尼支持率一路走低, 最近数月更连续下挫。“子午线”研究公司最近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久尔恰尼政府支持率落至 18%, 为 1990 年以来匈牙利历任总理最低; 91% 的民众认为国家正走向错误方向。

虽然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政治已经发展了十几年, 但是在这些国家的选民还没有发展出一种党派性忠诚和稳定的立场, 来帮助在已建立的政党体系中加强政治的稳定性。因此, 这些国家的选民可能要比他们的西欧国家更加变化无常。

所以, 在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时, 这种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必然也会制约各国

政府快速制定有力的反危机政策，带领各自国家走出经济困局的能力，而由于政治结构的不稳定和政党在摆脱危机手段采用上的分歧，事实上，许多中东欧国家多年经济转型与改革的成果就难免在经济动荡之中遭受更多的损失，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复苏。

#### 四、中东欧转型模式问题总结

在转型学研究中，至少按西方的转型理论，两个核心问题是“政治民主化”与“经济体制市场化”，而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则是严格按照这两个标准进行着转轨操作。对应着“转型模式”的研究，我们必须对这两个命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再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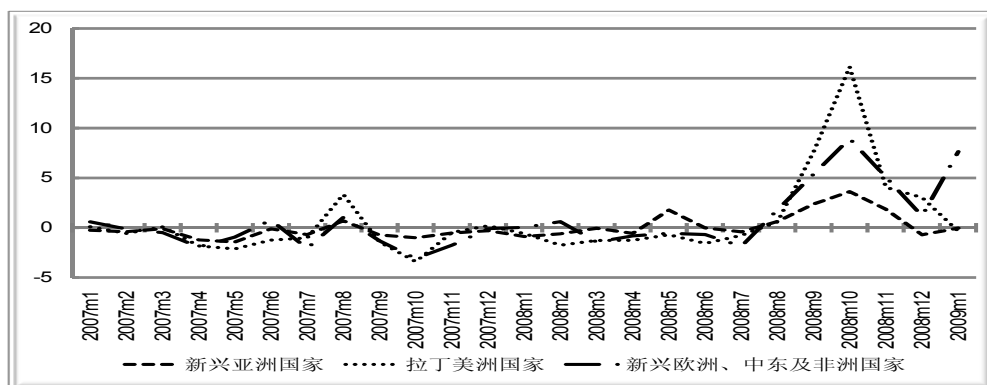
首先，我们通过上述研究回顾马上可以发现，中东欧经济体制市场化对应着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后的市场风险，而在“全球性全面危机”情况下，事实上是无人可以救助中东欧国家。在此次危机发生之时，关于谁应该来阻挡此次危机再扩大的讨论不绝于耳。但是从现实意义来说，目前最具有能力的欧洲货币联盟（EMU）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却因为各自缺陷，能力有限。

理论上说，欧洲货币联盟和欧洲央行在这轮欧洲金融危机前不能坐而无视，要尽力阻挡危机蔓延。但是由于欧盟政治上自身的缺陷，导致目标很难达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 103 条第 1 款）的不救助条款，禁止欧洲央行和各国央行提供直接贷款给予其他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政府。该条约只允许在发生超越会员国控制的特殊情况下，欧盟委员会首先提出对特定国家的财政援助建议，经多数票表决通过后，才能采取行动。尽管拉脱维亚和匈牙利通过“中期财政援助”计划以获得 100 亿欧元的资金援助，但其总资金远低于能够阻止财政问题发生所需。这归根结底是因为欧盟政治整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措手不及，只能是成员国各人自扫门前雪，难管他家瓦上霜。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被视为“转型的导师”和“市场经济道德拥有者”，理论上对此次危机当然是义不容辞，但是受困于自身的资金短缺。自 2008 年 10 月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动用了 480 亿美元，以支持包括匈牙利、乌克兰、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冰岛、塞尔维亚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这使其可动用资金显著减少至 2009 年 3 月的仅 1520 亿美元。在 2009 年 4 月的 G20 峰会前后，日本已承诺提供 1000 亿美元，而德国、英国、法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在伦敦 G20 峰会期间均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援助资金增加至 5000 亿美元，以帮助受全球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在未来几个月内许多东欧和中欧国家可能需要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

持。波罗的海国家可能面临两位数的经济收缩，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或会很快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其他国家包括波兰、土耳其和罗马尼亚也正希望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但问题是，无论是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实上对中东欧国家的实际性金融援助是非常有限的，这不仅再次验证了转型国家（拉美、东南亚）一再发生的惨痛经验，同时也表明，在全球化金融危机中，没有“嫡亲”和“旁亲”。在经济体制全面转型以后，中东欧国家自认为是西方转型的典范，而且许多国家加入欧盟以后，得到了金融开放的好处，但事实上，当全面危机爆发时，当西欧“成熟民主国家”全面金融危机发生时，第一个被抛弃的就是中东欧“转型国家”。与此对应的是，巴西、阿根廷、东南亚等已经经历过高度金融市场开放的国家，目前接受了以往的教训，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其汇率还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而倒下的却是“嫡系”转型优等生——中东欧国家。从图 27 中，我们可以发现，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至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是三大新兴市场中最为稳定的，而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新兴欧洲、中东及非洲国家的汇率变化幅度是比较大的。事实上如果去除土耳其、以色列、摩洛哥及南非的话，中东欧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波动更大（见图 28），而相比之下，遭遇过危机之苦的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南美的阿根廷、秘鲁、巴西等汇率波动情况等比较平稳，而中东欧国家，例如波兰就非常典型，涨跌幅度非常大。



注：新兴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以及泰国；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秘鲁；新兴欧洲、中东及非洲国家包括：捷克、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土耳其、以色列、摩洛哥及南非。

数据来源：IMF

图 27 2007 年 1 月-2009 年 1 月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变化情况 (month to mon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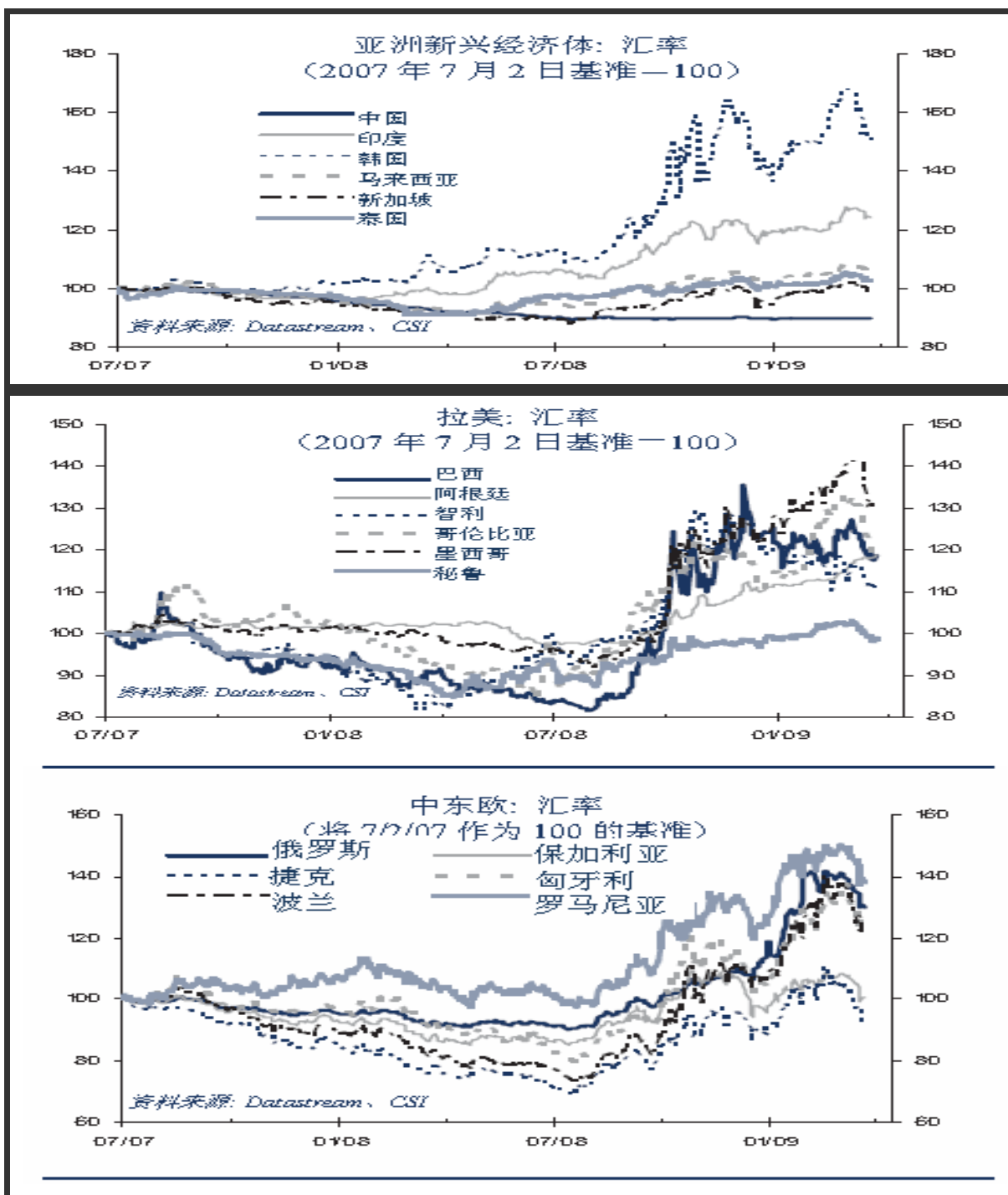


图 28 2007/7/2-2009/3 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变化趋势比较

其次，所谓“政治体制民主化”问题。的确，在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2004年欧盟东扩完成后，中东欧国家得益于市场开放，包括金融市场开放的经济高增长，得到了“转型民主化”理论的高度支撑。从当时的情况看，在中东欧国家迫切回归“民主体制”的愿望下，西欧各国剩余资本，无论是基于道德情感，还

是盈利目的，大量涌入中东欧国家，而得益于资本的支持，经济增长的数据的确支持着“民主带来经济与社会繁荣”的命题，但关键的问题，当金融发生后，民主与资本的关系命题就再次发生，它的逻辑命题是，民主在先，还是资本在先？以中东欧转型的模式看，它事实的结论是，如果有资本流入，那么民主就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如果没有资本流入，或是资本外逃，那么即使是民主的政治和政体，也会妨碍了经济增长与复苏。

在这里我们并无意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而对“威权主义政治”表示高度的赞扬。但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美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大小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哪怕在“大萧条”时代 25%的失业率也没有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和革命？但在欧洲，哪怕是所谓转型以后的中东欧，政治不稳定以及政府更迭的频繁，使我们不得不从社会模式与转型必要条件中寻求答案。

我们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转型，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环境下的转型至少有如下几个要素必须重新思考：

1. 政治的稳定可以建立在各种政治模式之下，没有所谓的绝对的“议会政体稳定制”原则。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在转型后的实践中观察到，事实上，当真正的大型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时，议会的博弈性与政党的权威性是对应危机两个典型的要素。美国如此快地应对危机，即可以被认为的议会制度的博弈产物，但我们绝对不能忽略民主党目前在议会中的统治地位，而这一点恰恰是中东欧国家最为缺乏的。

2. 市场开放的边界问题。传统上，按西方转型理论，开放市场，融入全球化可以带来“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已经似乎是一个不被怀疑的命题。我们不否认，美国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开放中所获得的好处，我们也无法否认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在市场开放中得到的益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市场开放的边界何在？特别是金融市场。在开放以后的中东欧国家，由于事实上已经没有本国金融服务，或者是本国金融服务总量非常小，在开放初期得益于经济增长，这些中东欧国家公民以“欧洲人”自居，但真正金融风险来临时，本国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开放的脆弱性，反而加强了政治的不信任与不稳定。因此，市场体制开放，特别是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对于转型国家的风险是一个必须考量的严肃问题。

3. 转型理论的通适性问题。在以往的转型学研究中，我们历经过发展中国家的“拉美模式”，“东南亚模式”，“中东欧模式”；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欧洲，我们看到过“凯尔特猛虎”和“丹麦模式”的以往成功案例（目前金融危机中损失最为严重的两个国家）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模式，在某一个阶段的辉煌似乎在范例上验证了后来国家的学习模式。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包括以往的区域性金融危机可以证明，所谓的“转型模式”无论从理论到实践，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缺乏一个“普世典范”，一个转

型国家，哪怕是地区，在某一个历史特殊阶段的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并不能说明“转型”具有普适性。因此，如何结合一个国家的社会模式，从而推动经济，包括政治体制转型是未来转型理论研究的核心点。

总结中东欧国家政治与经济转型的实践，特别是经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检验，我们可以认为，既有的转型理论无法提供科学哲学意义上的“证伪”研究。当我们过去列举中东欧“转型优生”种种转型特点时，我们无法发现其在金融危机环境下经历的“实践证伪检验”。因此，当我们抛弃以意识形态来评价“转型模式”时（按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理论，意识形态不是科学，因为它不能证伪），我们就应该非常明确地回答，转型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通适理论，转型国家各个阶段的成功无非是为转型提供各种模式参考，而转型的真正研究重点必须结合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

---

**【Abstract】**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s of emerging countries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transition studies. As an example, the transition model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ntinuously attracts lots of attention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occurr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ur research is designed to detect the overall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market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n to re-evaluate the transition model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as “excellence of transi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ransition model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Финансовый кризис,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переходная модель

---

（责任编辑 姜睿）

##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经济走势分析\*

徐坡岭 张鲁平\*\*

**【内容提要】**2000-2007年，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总体上呈平稳快速发展的趋势，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东欧转轨国家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与这些国家转型后形成的制度基础和经济发展模式有关。本文就国际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冲击，从多个侧面分析相关原因，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中东欧国家 经济

**【中图分类号】**F13/17.51.4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3-0055-(13)

中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在摆脱转型初期的经济震荡之后，经济增长逐渐平稳。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这些国家大都实现了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2008年以来，波罗的海三国、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转型国家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金融形势急剧恶化，甚至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诱因。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为什么中东欧经济转轨国家<sup>①</sup>的经济出现了比其他经济体更严重的波动？如何看待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中东欧国家经济走势将如何演化？本文拟从这些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原因和机制等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比较研究”(07JJDGJW250)的中期成果。

\*\* 徐坡岭，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张鲁平，辽宁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 本文研究的中东欧国家包括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 一、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中东欧国家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 (一)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以 2008 年为转折点呈现恶化趋势

2000 年以来的中东欧国家经济走势，以 2007 年为分界线，出现重大转折。金融危机前后经济走势出现大幅波动，危机前的持续增长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迅速下降形成鲜明对比。从表 1 的统计数据中可看出几个明显特征：

表 1 中东欧国家 GDP 实际增长率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保加利亚	2.3	5.4	4.1	4.5	5.0	6.6	6.2	6.3	6.2	6.0	4.5	4.7
匈牙利	4.2	5.2	4.1	4.1	4.2	4.8	4.0	4.1	1.1	0.5	0.7	1.8
捷克	1.3	3.6	2.5	1.9	3.6	4.5	6.3	6.8	6.0	3.2	3.6	3.9
波兰	4.5	4.3	1.2	1.4	3.9	5.3	3.6	6.2	6.6	4.8	3.8	4.2
罗马尼亚	-1.2	2.1	5.7	5.1	5.2	8.5	4.2	7.9	6.2	7.1	4.7	5.0
斯洛文尼亚	5.4	4.4	2.8	4.0	2.8	4.3	4.3	5.9	6.8	3.5	2.9	3.7
斯洛伐克	0.0	1.4	3.4	4.8	4.7	5.2	6.5	8.5	10.4	6.4	4.9	5.5
爱沙尼亚	-0.1	9.6	7.7	7.8	7.1	7.5	9.2	10.4	6.3	-3.6	-1.2	2.0
拉脱维亚	-1.5	4.2	6.7	6.9	10.2	7.4	7.8	7.8	8.9	3.0	0.0	-1.1
立陶宛	3.3	6.9	8.0	6.5	7.2	8.7	10.6	12.2	10.0	-4.6	-2.7	1.0
EU27	3.0	3.9	2.0	1.2	1.3	2.5	.02	3.1	2.9	0.9	0.2	1.1

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eurostat/home/>，其中 2009 和 2010 数据为预测值。

第一，2000 年以来中东欧国家经济整体持续快速增长。表 1 给出了中东欧国家实际 GDP 增长率的走势变化。从表中可以看出，2002-2006 年，中东欧各国经济都保持了高速增长，2007 年一些国家的增速开始放缓。如果查阅月度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形势的变化多数出现在 2007 年下半年。<sup>①</sup>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走势开始出现恶化的迹象。从总的趋势看，2007 年大部分中东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开始走低。其中，爱沙尼亚、匈牙利和立陶宛的经济增长均有较大幅度的下滑。但与此同时，拉脱维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还仍保持较强势的经济增长，增幅为 14.1%、22.4%和 15.2%，波兰经济也有小幅增长，增幅为 6.5%；

第三，2008 年开始，几乎所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大幅下滑。其中，下滑最严

<sup>①</sup> 本文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欧洲统计局。<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eurostat/home/>。

重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其中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直接步入经济衰退，经济增长率分别降为-4.6%和-3.6%，下降幅度为146%和157%；拉脱维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8.9%降为3%，降幅为66.3%。匈牙利经济在上年度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再度下滑，经济增长几近于零，为0.5%。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及保加利亚的经济增长也大幅下滑，降幅分别为27.3%、46.7%、38.5%、48.5%和3.2%。只有罗马尼亚是个例外，升幅为14.51%；

第四，根据预测，2009年，包括罗马尼亚在内，大部分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处于深度下滑当中。拉脱维亚步入衰退，经济增长率将为零，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为-2.7%和-1.2%。

## （二）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也发生较大变化

在经济增长出现迅速下降的同时，中东欧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指标也出现了相应的恶化。

HICP是欧盟的消费价格指数。根据欧盟统计局提供的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中东欧各国的HICP指数（图1），<sup>①</sup>可以发现：

第一，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中东欧各国通胀水平的总体走向，虽然在不同的时段变动方向和浮动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进入2009年后整体呈上升走势。

第二，就走势的变动而言，立陶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直呈上升的走势；而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呈“升—降—升”的走势；而爱沙尼亚为先升后降的走势。

第三，就走势的变动幅度而言，立陶宛、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匈牙利通胀水平的变动幅度较大；而捷克、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的变动幅度相对较小，并且与欧盟平均水平在2008年各时期的变动幅度基本相同。进入2009年，波兰、捷克的通胀率明显上升，而欧盟平均水平和斯洛文尼亚走向完全相同，在2009年2月才开始上升，1月仍维持下降态势。

第四，同经济增长的变动联系起来，可以发现，通胀率高的国家，经济增长下滑的幅度也较大，经济增长下滑幅度大的国家，通胀随危机的变动幅度也较大。

另外，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从2008年第三季度起，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匈牙利的失业率先上升且升幅较大，进入第四季度，所有中东欧国家的失业率均表现为上升。其中，拉脱维亚升幅最大，立陶宛、爱沙尼亚、匈牙利和波兰次之。将其与经济增长的波动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失业率的波动较经济增长表现滞后，并且经济增长受冲击大的国家如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匈牙利等，失

<sup>①</sup>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tab=table&language=en&pcode=teicp000&tableSelection=1&plugin=1>.

业率上升的幅度也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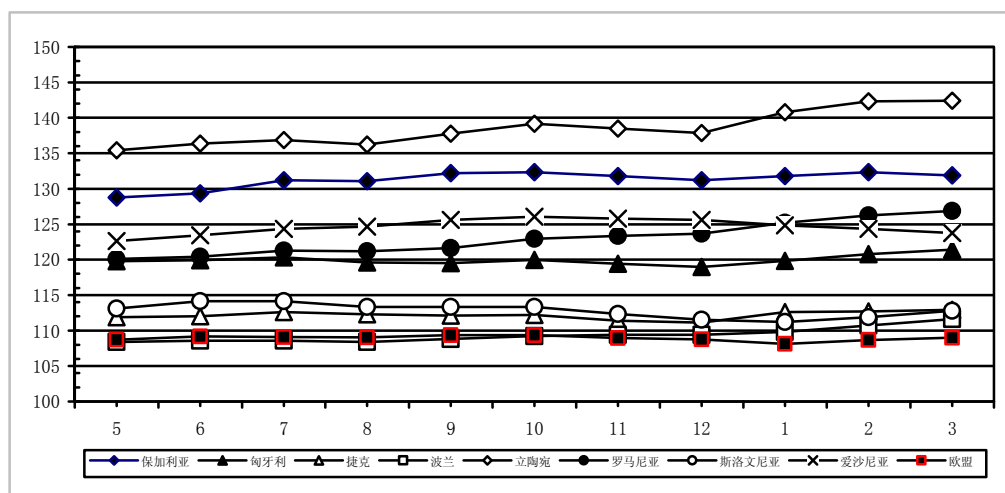


图 1 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3 月中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率变化<sup>①</sup>

## 二、中东欧国家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的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剧烈波动是由一系列综合原因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偶发冲击是这些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而中东欧国家之所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与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直接相关；经济发展模式则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 （一）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偶发性外部冲击是中东欧国家经济波动的直接诱因

从表 1 可以看出，中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在各年度不尽相同，但总体走势是趋同的，在 2008 年各国经济增长率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罗马尼亚是个例外）。在各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不尽相同的情况下，中东欧国家经济同时发生波动，显然冲击主要不是来自经济体内部，而更大的可能是来自外部。而外部冲击的最大可能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因为，经济波动的时间与次贷危机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2006—2007 年美国的房贷市场及所连带的金融市场开始发生波动，2007 年初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是在 2007 年第三季度。2007 年 8 月英国的重要商业银行——北岩银行发生挤兑风潮，标志着国际金融危机正式浮出

<sup>①</sup> 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08 年 5 月到 09 年 4 月 HICP）（2005=100）<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tab=table&language=en&pcode=teicp000&tableSelection=1&plugin=1>。

水面。显然，中东欧国家整体经济增长趋势在 2008 年发生波动，与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脉络是一致的。因此，从归因的角度，初步可以断定，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了中东欧各国经济，并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影响。后面的分析将支持这一判断。

另一方面，从对比的角度看，与欧盟的平均水平相比，2008 至 2009 年度，中东欧各转型经济体下降的幅度更大，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更深。同时，就中东欧各个国家之间相比较而言，在同样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之下，波罗的海国家所受的影响最为深重。中东欧转型国家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在面对危机时的经济表现有较大差异，这与前者转型后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特点有关。其中原因需要仔细解析。

## **（二）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东欧国家经济提供了基本条件**

1990 年代，中东欧国家逐渐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形成了市场和金融体系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中东欧国家以加入欧盟为目标，在实现与欧盟市场制度趋同的同时，对欧盟高度开放了自己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与欧盟的高度一体化意味着，中东欧国家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风险也是高度开放的。因此可以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特别是与欧盟的高度一体化，是中东欧国家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剧烈冲击的深层次原因或制度基础。

20 世纪 90 年代，中东欧国家在初步完成经济的市场化转型的同时，迅速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循环之中。特别是随着中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盟，这些国家与欧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迅速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中东欧国家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和发展机会也日益显现。这样，中东欧国家主动面对外部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国家开放市场，与外部资本急于在中东欧寻找投资机会结合在一起，大大提高了中东欧对外部市场和资本的依赖程度，从而形成了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展模式。外资的进入是这种外部经济依赖的一个缩影。统计数据显示，十多年来，外资在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特别是近年来，中东欧地区、尤其是靠近西欧的匈波捷斯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地，一直是国际资本看好的投资地区，它们也成了吸引国际资金的主要地区。2007 年，全球对新兴市场的投资约 7800 亿美元，其中有 3650 亿美元流入中东欧地区，超过了对亚洲的投资。<sup>①</sup>同时，东欧国家对外部市场特别是欧盟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迅速提高。这种模式在为中东欧国家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弱化了对外来经济风险的防御和抵抗能力。

## **（三）高投资和高外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中东欧国家经济易受外部冲击的根本原因**

中东欧转型国家从 90 年代初正式步入市场经济，尔后迅速融入全球经济循环。

<sup>①</sup> “东欧或成新一轮金融风暴策源地”，《经济参考报》，2009 年 2 月 2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2/25/content\\_10891426.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2/25/content_10891426.htm)。

外来资本和市场等外部因素在推动中东欧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得中东欧国家逐渐形成了“高投资、高外债”的经济发展模式。<sup>①</sup>同时，这种高投资、高外债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具有外资控制银行体系和银行资产在金融系统总资产中占比过高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国民经济账户的内外平衡成为一个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外资、外债的复杂问题。这也就决定了中东欧经济发展模式对外部危机的反应高度敏感。

首先，在中东欧转型国家中，银行系统绝大部分由外资所控制（见图 2）。中东欧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国有银行改造的顺序是，首先对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清理，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然后将国有银行私有化，把国有银行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1995~1996 年，在波罗的海国家、捷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由外资参与的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程加速。从统计数据看，进入 21 世纪，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银行部门已为外资所控制。这些外国银行 90%来自欧盟其它成员国。<sup>②</sup>外资在中东欧国家银行部门的占比由其贷款份额测算，除了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均介于 55-97%之间。可以说，这些国家的银行系统已经主要由外国银行所主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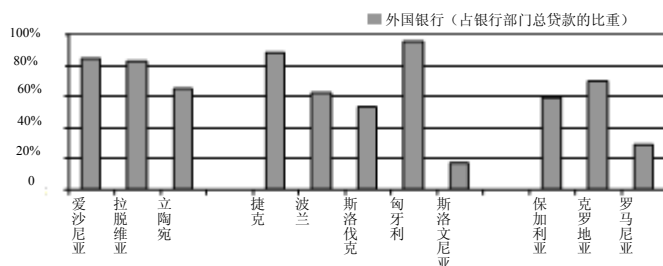


图 2 中东欧国家银行体系中外国银行所有权（在总资产中占比）<sup>③</sup>

其次，在中东欧转型国家中，金融市场发展还很不完善，资本市场和其它非金融机构的发展很有限，这样就形成了以银行业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在中东欧地区，银行资产占全部金融部门总资产的大约 85%。（见图 3）

这种金融资产结构为外国银行控制中东欧国家的金融体系创造了条件。外国银行所有权在中东欧国家金融体系中占比过高，一方面加大了外资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中东欧国家经济面临更高的传导性金融风险。

① 瑞典、英国、西班牙等国给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借贷约占其 GDP 的 1/4，在瑞士、奥地利，这一比例更高，达 50%和 85%，其中有相当部分投到了中东欧地区，这些外资促进了中东欧国家的快速发展。

② 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

③ Sophie S. and Ilias S., “Credit Growth in Emerging Europe: A Cause for Stability Concerns?”, World Bank, July 2007: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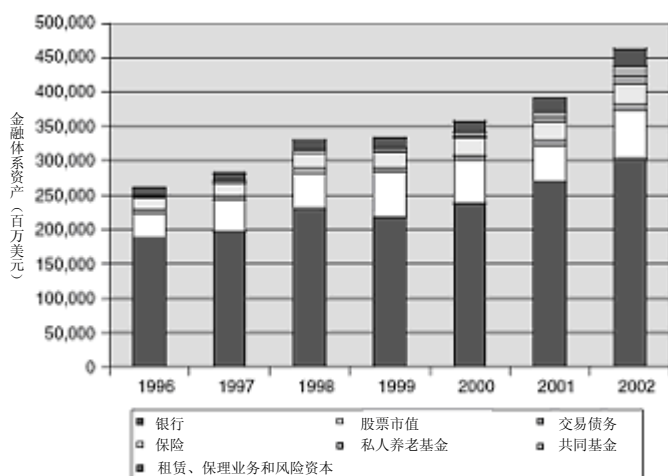


图3 中东欧8国金融部门资产构成（1996-2002）<sup>①</sup>

自2000年以来，由于中东欧国家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以及政府推行有助于信贷增长的政策，特别是由于外资所主导的银行业的存在，中东欧国家的银行信贷规模大幅上升，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保加利亚。2005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信贷增长率几近60%，保加利亚几近45%，并且仍在增长。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的信贷增幅也较高，但相对于波罗的海三国和保加利亚则较为缓和。（见图4）信贷规模的迅速膨胀，会破坏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内外平衡机制，从而进一步弱化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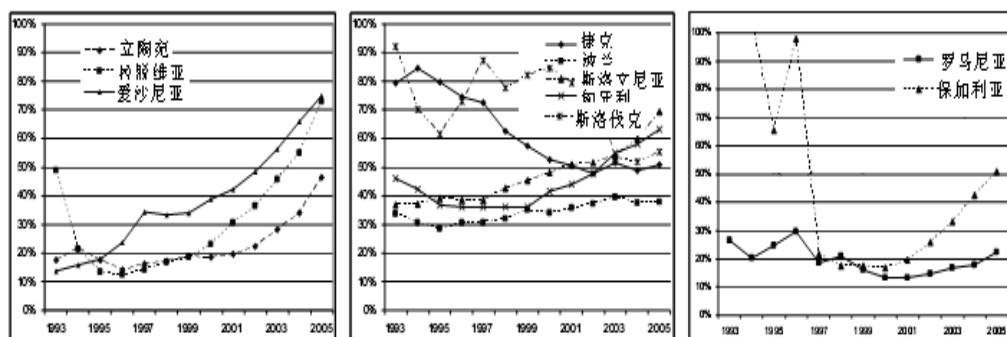


图4 信贷占GDP的比重（1993-2005）<sup>②</sup>

第三，中东欧国家的信贷结构及信贷币种为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在中东欧国家中，除了斯洛文尼亚，外资所主导的银行业借助其庞大外资来源的有利

① Sophie S. and Ilias S., “Credit Growth in Emerging Europe: A Cause for Stability Concerns?”, World Bank, July 2007: 6.

② Ibid: 8.

条件，在迅速推高信贷发放的同时，将信贷主要发放给了个人（见图 5）。中东欧国家的个人贷款中，房贷的占比及增幅在危机发生之前都明显走高（见图 6）。2005 年末，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房贷占到了总贷款额度的大约 50%。信贷的高涨，以及房贷发放比例过高，形成了房产市场的泡沫。同时外资所主导的银行业为赚取本外币的利率差，放贷中主要采用外币。中东欧国家除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房贷中外币贷款占比较低，介于 10-25%之间，其余国家均超过 50%，立陶宛最高，接近 90%，其次是爱沙尼亚，接近 80%，再次为匈牙利，达 62%左右。<sup>①</sup>高的外币贷款加重了中东欧国家的负债水平，使其经济陷于更高的传导性经济风险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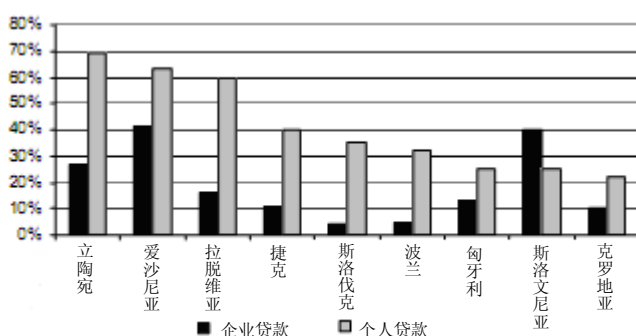


图 5 中东欧国家个人和企业贷款的增长 (2003-2005 平均值)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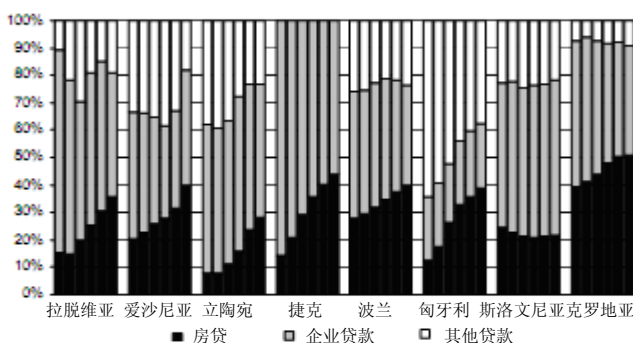


图 6 中东欧国家贷款组合演进 (2000-2005) ③

第四，信贷的高涨在宏观面上拉高了国内需求，导致经常账户赤字，需要外资来平衡，从而加大了本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弱化了本国经济对风险的防御能力。近几年，中东欧国家经常账户赤字明显升高，其中波罗的海三国、保加利亚和罗马

① 数据来源：Fitch Ratings, “Emerging Europe’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Mind the Gap!”, January 2008.

② 资料来源：同图 4。

③ 资料来源：同图 4。

尼亚赤字占GDP的百分比更是高达两位数。2007年，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的赤字水平高达20%以上，爱沙尼亚接近20%，罗马尼亚和立陶宛接近15%。<sup>①</sup>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平衡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方法是外国直接投资和向国外借款。中东欧国家自2003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几乎全部用于弥补经常账户赤字。随着赤字水平的不断升高，中东欧国家需要通过外国借款来获得平衡。就2006年的数据来看，<sup>②</sup>除捷克、波兰以及保加利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可弥补经常账户赤字以外，其余国家均需通过外国借款来平衡。其中，波罗的海三国由于经常账户赤字水平远高于其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立陶宛相差最小还相距3倍多，爱沙尼亚相差最多高达8倍多，其用于弥补赤字的外资借款占GDP的百分比在所有中东欧国家中是最高的。中东欧国家由于信贷的高涨，所导致的对经常账户赤字的平衡需求，进一步推高了本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以及本国的负债水平。根据穆迪统计手册，2007年中东欧国家中，外债总额占GDP的百分比除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介于40%到50%之间，其余国家均超过50%，其中，保加利亚接近100%，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匈牙利均超过100%，拉脱维亚甚至达到135%。高负债使经济体易遭受外汇、利率以及汇兑的风险，特别是在固定汇率机制下，而中东欧国家中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保加利亚实施的正是固定汇率机制。另外，中东欧国家持续运行赤字政策，虽然幅度较小，但是不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形成财富积累，这就又弱化了国家经济体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五，外资的撤离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前已述及，外资是中东欧国家1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支撑。但是，在外国银行所主宰的金融体系的支持下，这种依赖外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为中东欧国家形成了巨额负债。有数据显示，中东欧地区的债务总额高达1.6万亿美元<sup>③</sup>，这些国家负债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70%以上。一些国家，如匈牙利、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还超过了100%，远远高于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当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流动趋紧，同时风险投资者担心在危机的影响下中东欧国家经济恶化，纷纷撤资。匈牙利的国家债券就因国际资本在危机发生后大量抛售债券收回资金而一度暂停交易，中东欧国家的股市也因危机冲击而急速下跌。外资抽逃还使中东欧国家货币急速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危机发生后，波匈捷及罗马尼亚的货币贬值大约40%，这进一步推高了这些国家的外债水平。而实施固定汇率制的波罗的海国家及保加利亚为阻止货币贬值，则大举动用外汇储备，进一步推高了其国家经济的风险面。2009

---

① 数据源于 Moody's Statistical Handbook, November 2008。

② 数据源于世界银行。

③ “欧洲新铁幕：金融海啸第二”，《中国经营报》，2009年3月8日，<http://news.cnfol.com/090308/101,1594,5555426,00.shtml>。



年 2 月下旬，穆迪、标准普尔等国际评级机构又陆续调高中东欧地区的风险评级，并发出金融风险警告，标普将拉脱维亚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这使中东欧银行业承受巨大的评级压力，外部融资变得更加困难，更加速了外资的撤离。同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虽然进口下降，但出口疲软。除捷克外，多数中东欧国家仍无法摆脱经常账户的赤字状态，特别是实施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这使得绝大多数的中东欧国家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 **（四）商品进出口市场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传导到中东欧国家的重要渠道**

本文采用中东欧各国 2007 年 1 月至 2009 年 2 月进出口的月度数据，以月为单位进行同期比较，以便剔除各月数据受季节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计算出中东欧各国的进口、出口以及净出口的变化率。（见表 2）

通过中东欧各国进口、出口以及进出口变动率的变化可以看出：

（1）在 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2 月期间，中东欧各国的出口贸易相对于上年同期变动的整体走势趋同，呈下滑趋势。自 2008 年 5 月起，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出口相对于上年同期增幅明显下滑；到 2008 年 11 月，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的出口相对于上年同期均呈负向变动，并且这种负向变动截至 2009 年 2 月的考察期间还一直在增大。这说明中东欧各国的出口均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在此冲击下，各国的出口贸易明显持续下挫。这是因为中东欧国家的主要出口对象西欧国家，深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减速、国内需求下降、进口减少，从而导致中东欧国家的出口下滑。其中，出口贸易对冲击最为敏感的中东欧国家是匈牙利和拉脱维亚，其出口下挫的幅度在考察期间为最大；其次是斯洛文尼亚和捷克。保加利亚的出口变动在同其它国家整体走势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又有其特殊性。在 2008 年 6 月和 7 月，在整体出口贸易的变动呈向下走势的情况下，保加利亚的出口贸易较上年同期却有很大幅度的增长；再有，2009 年的 1 月和 2 月，保加利亚的出口较去年同期的变动与其它中东欧国家大幅下滑的走势明显不同，表现为轻微的上升，其中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

（2）在 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2 月期间，中东欧各国的进口贸易与上年同期的整体走势基本相同，也呈下滑趋势。自 2008 年 5 月起，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进口相对于上年同期的增幅明显下滑。到 2008 年 11 月，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的进口相对于上年同期都呈负向变动，并且这种负向变动截至 2009 年 2 月的考察期间一直在增大。这说明中东欧各国的进口也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在此冲击下，明显持续下滑。中东欧国家中，进口贸易对金融危机冲击较为敏感的是拉脱维亚，其自 2008 年 3 月，几乎所有月份的进口贸易增幅都呈负向，并且在考察期间增幅的下滑为最大，其次是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保加利亚的进口在整体走势与其它国家趋同

的情况下，也有特殊性，它在 2008 年 6 月和 7 月的进口较去年同期的增幅在中东欧整体走势下滑的情况下却有很大幅度的上升，其中的缘由也需进一步分析。

表 2 中东欧国家进出口增长率（与上年同期对比） 单位：%

年 度		2008 年												2009 年	
月 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保加利亚	进 口	25.23	38.18	21.94	45.59	32.59	79.59	333.72	17.98	22.31	18.32	-7.04	-12.63	-27.70	-123.77
	出 口	28.24	33.07	17.68	31.92	18.70	39.87	268.75	14.21	17.00	-1.39	-15.11	-14.37	0.05	0.05
	净出口	-20.71	-48.07	-31.22	-73.92	-59.32	-167.35	-467.69	-25.30	-32.84	-54.57	-5.74	10.24	32.97	109.95
拉脱维亚	进 口	11.03	12.21	-5.68	9.47	-7.86	-4.92	-10.25	-7.57	10.14	-5.76	-20.82	-15.59	-36.11	-39.64
	出 口	17.89	28.60	10.14	23.51	9.82	3.96	13.19	7.50	24.67	6.54	-15.14	-11.13	-25.32	-29.30
	净出口	-4.06	4.43	22.67	5.49	26.62	14.63	30.50	24.28	6.01	19.87	28.15	20.83	48.54	53.78
匈牙利	进 口	16.35	16.14	6.27	22.04	8.59	11.36	14.28	-3.02	12.32	-1.02	-9.65	-16.80	-28.92	-32.00
	出 口	19.62	20.52	7.71	26.58	7.71	9.38	9.80	-1.15	9.94	-2.95	-9.10	-15.90	-30.99	-29.39
	净出口	64.25	602.21	70.95	141.35	-142.51	-67.34	-229.38	57.12	-46.35	-201.24	36.28	46.32	-141.70	56.08
捷克	进 口	12.29	13.61	-0.03	13.31	-0.50	0.58	0.32	-11.81	6.25	-5.51	-13.13	-8.11	-21.33	-21.49
	出 口	12.40	12.43	-2.28	13.89	1.95	2.68	4.02	-10.58	4.39	-10.60	-17.99	-12.30	-24.04	-22.20
	净出口	14.44	-3.25	-34.53	36.51	108.26	46.22	864.54	1404.68	-22.64	-157.78	-105.23	-257.40	-70.54	-33.25
波兰	进 口	33.84	33.84	33.84	39.82	39.82	39.82	38.89	38.89	38.89	25.52	25.52	25.52		
	出 口	30.69	30.69	30.69	36.92	36.92	36.92	35.28	35.28	35.28	22.16	22.16	22.16		
	净出口	-53.97	-53.97	-53.97	-56.78	-56.78	-56.78	-59.79	-59.79	-59.79	43.92	43.92	43.92		
立陶宛	进 口	30.97	30.97	30.97	22.52	22.52	22.52	22.17	22.17	22.17	-1.70	-1.70	-1.70		
	出 口	30.31	30.31	30.31	36.06	36.06	36.06	34.35	34.35	34.35	13.06	13.06	13.06		
	净出口	-32.53	-32.53	-32.53	7.56	7.56	7.56	9.80	9.80	9.80	34.81	34.81	34.81		
斯洛文尼亚	进 口	17.07	16.69	3.24	19.28	8.17	12.47	15.02	3.91	10.57	4.71	-12.43	-11.57	-31.40	-29.09
	出 口	10.23	13.47	-1.91	18.36	0.37	4.07	4.82	-8.48	11.63	-0.13	-13.70	-14.51	-25.57	-25.13
	净出口	-105.56	-60.32	-83.18	-28.04	-77.63	-134.26	-153.70	-120.54	-2.98	-43.93	2.91	-1.05	71.87	66.94

数据来源于：保加利亚统计局 <http://www.nsi.bg/ImpExpE/ImpExpE.htm>；拉脱维亚统计局 <http://www.csb.gov.lv/csp/content/?cat=3194>；匈牙利统计局； [http://portal.ksh.hu/portal/page?\\_pageid=37,115776&\\_dad=portal&\\_schema=PORTAL](http://portal.ksh.hu/portal/page?_pageid=37,115776&_dad=portal&_schema=PORTAL)；捷克统计局 <http://www.czso.cz/eng/csu.nsf/aktualniinformace>；波兰统计局 [http://www.stat.gov.pl/gus/index\\_ENG\\_HTML.htm](http://www.stat.gov.pl/gus/index_ENG_HTML.htm)；罗马尼亚 <http://www.insee.ro/cms/rw/pages/index.en.do>；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 <http://www.stat.si/eng/index.asp>；立陶宛统计局 <http://www.stat.gov.lt/en/pages/view/?id=1459>。波兰和立陶宛为 2008 年度数据，其余国家为 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2 月度数据整理。

(3) 净出口取决于出口和进口，因此净出口变动的走势相对于其出口和进口的变动走势要复杂。自危机发生后的 2008 年以来，匈牙利净出口整体波动最大，并且在 2008 年 5 月之后净出口较去年明显下滑，但下滑的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减小，2009 年 2 月净出口开始相对去年有增加，并表现为盈余，这无疑会有益于匈牙利经

济。捷克在 2008 年 9 月之前净出口的变动主要为正，并且在 7、8 月较去年有较大增幅，9 月之后其净出口较去年同期明显下滑，并截至年底，下滑幅度在不断增大，进入 2009 年降幅才开始减小。捷克是中东欧国家中少有的净出口表现为盈余的国家，净出口受危机冲击下滑势必会降低其经济增长。保加利亚在 2008 年 8 月前净出口较去年持续下滑，8 月后下滑幅度开始缩小，在 11 月之后净出口较去年同期开始增加，但仍表现为赤字。保加利亚净出口的走势是由于不断高涨的国内需求在危机冲击下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大于出口所形成的赤字减少。斯洛文尼亚及波兰的情况基本与保加利亚相同。拉脱维亚、立陶宛净出口受危机的影响也跟保加利亚差不多，只是其时间点相对较早，发生在 2008 年初。

### 三、走势预测：中东欧国家将被迫调整经济结构应对危机

综上所述，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处于开放经济形态下的中东欧转型国家深受影响。分析发现，中东欧国家普遍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受危机影响最重，步入了经济衰退。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中东欧转型国家全面融入全球化、高度依赖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对外资特别是外国借款的依赖度越高，所受的冲击就越重。通过进出口贸易在危机前后的变动分析发现，金融危机通过进出口贸易对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冲击较大。受到冲击时，捷克由于出口大幅下挫而使净出口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而斯洛文尼亚净出口由于赤字减少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匈牙利在危机前后波动较大，但有净出口由赤字走向盈余的趋势。通货膨胀指标表明，中东欧国家间通货膨胀程度不同，但均处于欧盟平均水平之上，并且通胀率高的国家，经济增长下滑的幅度也大，经济增长下滑幅度大的国家，通胀水平随危机变动的幅度也越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经济普遍陷入衰退或危机之中，并造成失业率不断攀升和居民收入的波动。中东欧各国在加入欧盟、享受一体化溢出效应的同时，将被迫对这次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作出反应，对经济结构作出相应调整。高度依赖外资、外债和高投资率的增长方式、以及金融体系面对外部冲击的风险敞口，都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中东欧国家经济结构性原因决定了其经济从困境中走出来的过程可能更加曲折。

---

**【Abstract】** From 2000 till 2007, the econom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as stable on the whole and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7,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deteriorated abruptly. The impact and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s related with the system basi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fter these countries' transi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ed reasons from various aspects for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on these nations' economy,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as well.

**【 Key Words 】**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conomy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инансовый кризис,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экономика

---

(责任编辑 姜睿)

欧亚·斯拉夫

## 从俄格冲突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危机政治经济学” ——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冯绍雷\*

**【内容提要】**2008年发生的俄格军事冲突对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同一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也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受到巨大考验。这两场看似没有联系的重大危机都表现出俄罗斯在危机形势下不甘示弱的态度，也折射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复杂状况。所谓“危机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无论是摆脱军事冲突，还是金融海啸式的危机，大国间的合作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关键词】**俄格冲突 国际金融危机 大国关系 危机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83/87.512.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3-0068-(19)

2008年8月8日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冲突的发生，乃是冷战后欧亚地区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场冲突不光对2008年下半年以后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乃至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且折射出宏观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端倪。随后不久骤然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的降临，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格局变化中的这一前所未见的深刻趋势。

虽然，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冲突的余波尚未平息，有关这场冲突的不少背景资料和信息有待披露；同时，百年未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各国经济未来走向充满了变数，而从国际层面上和地区与国别层面上来看，各个层次上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心态走向之间的复杂互动更为扑朔迷离，这使得对于未来走势的判断难以把握。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但是，通过对于这一阶段大国之间关系格局的观察与分析，有可能对于大国力量与影响的相互消长的当前态势提供一种参数，尤其是当冷战后欧亚地区首次出现的军事对抗性局面和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相互交织之时，政治战略冲突进程和经济危局进程这两个过程的碰撞所产生的信息，非常有可能为当下正在进行的冷战结束以来的“划时代”事件、乃至百年未遇的重大变故的多样性的发展前景，提供一个较为接近事实的理解。

提出这种看法的依据是：无论是俄格冲突还是金融危机的进程，均囊括了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等大国的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因此，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具有全局性的意义，这是一种空间视角的观察；同时，也无论是俄格冲突还是国际金融危机，都体现着一种时间视野之下的关键性的历史转折。于是，一方面是几乎所有全球角色的参与或影响，另一方面是几十年甚或百年未见的格局转换的开始，这两个过程的交织所留下的悬念足以供一代学人无论是从抽象理论意义、还是从具体实证过程中展开上下求索。

## 一、关于俄格冲突的大体过程

俄格冲突的形势可以分成以下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8月7日午夜（欧洲时间），格鲁吉亚首先向其境内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的俄罗斯维和部队和平民发动进攻。当时格鲁吉亚国内关于是否发起这场战争的问题还有着不同意见，因此，战争是在并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段战事的结果是格军攻入茨欣瓦利，并同时造成了当地俄军和大量平民伤亡。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格鲁吉亚的进攻导致了一千多名当地居民和12名俄罗斯维和部队的死亡，另外造成了大量城市建筑的破坏。<sup>①</sup>

第二阶段：在格鲁吉亚发动进攻12个小时后，俄罗斯军队开始大规模反击。不光有俄罗斯58军精锐部队的主力进攻，而且还有空中力量全面配合，加上网络战的策应，将格鲁吉亚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然俄军在对抗中也有失手，但整个俄军迅速推进，一度相当接近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

第三阶段：从8月12日始，当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充当欧盟的调停者，经过艰苦的、但同时也是时间紧凑的谈判，终于使得参与这场冲突的格俄两家达成关于停火的六点协议。其内容主要是：放弃使用武力；彻底停止使用军事行动；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格鲁吉亚军队回到出兵前的常驻地点；俄罗斯军队返

---

<sup>①</sup> 吴宏伟主编：《俄美新较量——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年，第2页。

回开始军事行动之前的位置，在国际维和机制形成之前，俄罗斯维和部队可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就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未来地位及安全保障途径问题展开国际讨论。<sup>①</sup> 最后一条因格鲁吉亚方面的反对改成：举行国际对话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从六点协议内容来看，既不如美国总统布什那样谴责俄罗斯是“入侵者”，也不如中国 and 上合组织那样着重于表示“关切”，以及希望俄罗斯在稳定当地局势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六点协议的主要内容，乃是将停火作为最为重要的问题来解决，但不谴责俄罗斯是“入侵者”；同时也在实际上同意俄罗斯军队在冲突之后依然有权留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境内。对于这六点协议的结果虽有争议，但总体上被国际舆论和各相关国家当局所接受。

第四阶段：六点协议签署之后，格鲁吉亚地区的形势并未稳定下来，俄罗斯和美国相互之间仍继续就军事冲突进行争执，并相互以撤销和中止原有的相互合作作为威胁。8月2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正式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国作为主权国家独立。<sup>②</sup> 此举引起了西方舆论的进一步大规模的猛烈抨击。<sup>③</sup> 欧洲主要国家和欧盟代表也相继表态对俄加以谴责，俄则坚决地予以辩护。美国“麦克福尔”和“达拉斯号”两艘巡洋舰以“向格鲁吉亚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为由停靠在格鲁吉亚的黑海港口。俄则相应派出包括“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在内的黑海舰队多艘舰船与美军隔海对峙，双方一时间显得剑拔弩张。欧盟在此同时也宣布暂时推迟欧盟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框架协定的谈判，以此作为俄格冲突以来欧盟对俄罗斯的唯一制裁措施。

第五阶段：自9月8日开始，法国总统萨科奇、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负责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先后前往莫斯科和第比利斯，最后在莫斯科达成了一个六点条款的补充协议，内容包括：由欧盟担保格鲁吉亚不会再次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发动军事进攻；俄格两国军队撤回冲突之前驻扎的地区；欧盟军事观察员进驻阿、南两地维和。<sup>④</sup> 按照这一协议的规定，俄罗斯军队必须从现在占领地段撤回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地。此后的一周之内，欧盟200名观察员进入格鲁吉亚冲突地带进行实地观察。

在欧盟的担保之下，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冲突形势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从这次冲突中所揭示的问题来看，争执双方以及相关各方的认知差异和实际利益的相

---

① Принуждение к победе// Коммерсантъ. № 142 (3959), 13.08.2008.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26.08.2008, N. 1261, “О Признан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Южная Осетия”;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26.08.2008, N. 1260, “О Признан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Абхазия”.

③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7, 2008.

④ Медведев-Саркози: новый план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РИА Новостей. 09.09.2008.

互矛盾，却远远没有解决。

## 二、关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冲突的若干争论意见

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冲突发生以来，国际社会关于这场冲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不仅出现在国际媒体上，还表现在国际学术交往中，而且也发生在当时举行的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上，比如，在 2008 年 9 月初举行的瓦尔代会议上。<sup>①</sup>争论的问题不仅涉及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而且涵盖了这场冲突与冷战后国际格局变迁的深层次全局问题。

### （一）关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的原因

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认为：冷战结束以后，欧美国家一直推行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政策；新世纪以来，又发生了在西方影响之下，以所谓“颜色革命”为名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中亚等前苏联地区的政权更迭；近年来美国又加紧准备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一连串的战略推进无疑对俄罗斯形成了极大的外部压力。而因格鲁吉亚出兵南奥塞梯地区引发的这场大规模冲突，不过是上述一系列客观地缘政治变化的一个结果和反应而已。

另一种意见认为：从俄方看，苏联解体十多年以后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摆脱了当年的困难局面，特别是借助于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抬升，俄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复苏和增长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在普京强人政权的推动之下，俄国内局势趋于稳定，民意支持率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国际影响力大幅回升。在此形势下，俄对获得国际尊重的愿望、包括拓展国际影响力的诉求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容不得类似于格鲁吉亚那样充当西方马前卒的角色向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发起挑战。

此外，作为一个客观因素，高加索地区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从今后的油气管线所体现的能源格局看，与外高加索地区密切相关的巴库—杰伊汉石油管线的开通和同处里海、穿越欧亚的纳布科天然气管线的筹建，将使欧

---

<sup>①</sup> 瓦尔代会议，即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是目前国际学术界一个已连续运转了 5 年的特殊的国际对话论坛，俄罗斯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高官政要与主要是来自西方、包括少数亚洲国家从事国际问题和俄国问题研究的国际学者及媒体代表在论坛上直接对话。从每年的 9 月初开始，该论坛以“辩论俱乐部”的方式持续一周左右，并选择一个或几个城市供与会者考察，以了解俄国情。2008 年的瓦尔代会议期间，专家们考察了俄罗斯 2014 年冬奥会举办地索契、南方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等近黑海地区以及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与车臣总统、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领导人等开展对话。通过这样的相当直观的考察和交流，作者作为会议成员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危机发生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直接场景和大体态势。



洲依赖俄罗斯能源的状况得到一个较大幅度的改变。这种局面的出现，势必对于未来的俄罗斯和欧洲，以及对于俄罗斯与外高加索地区的相互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另外，从北约东扩的下一个目标来看，无论是乌克兰、还是格鲁吉亚，都将对今后一个时期内黑海地区的战略力量的重新配置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法国总统萨科奇大力推动下的近期欧盟“地中海战略”的出台进一步表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从战略与经济的角度看仅是一个开端，围绕着欧亚纵深地带的地缘政治竞争不过是刚刚拉开序幕而已。因此，俄格冲突所包含的战略含义远远超出了俄格双边关系本身。

## （二）关于萨卡什维利发兵南奥塞梯和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的问题

除了以上所说的宏观背景，国际学术界目前关于所谓“五日战争”的起因问题也有着激烈的争论。

一个相当复杂的背景是，格鲁吉亚内部长期存在着分离主义的趋势，同时俄罗斯又与格鲁吉亚内部局势的历史发展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在当年苏联成立的时候，格鲁吉亚境内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等地要早于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在苏联解体的时候，要早于苏联解体宣布退出格鲁吉亚。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他们从未承认自己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因而也从不承认格鲁吉亚的统一，从来只承认自己是独立的国家。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经多次受邀参与斡旋解决格鲁吉亚内部的分离与独立等问题，并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按照 1994 年 5 月 14 日独联体的有关协议在格鲁吉亚境内留有军事基地。

2004 年，在所谓的“颜色革命”背景之下，萨卡什维利执政后大幅改变了其前任谢瓦尔德纳泽执政期间与俄罗斯就格鲁吉亚的地区问题保持协调和磋商的传统做法，这使得本就异常复杂的分离问题立即尖锐起来。格鲁吉亚指责俄罗斯是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等内部分离问题的外部政治背景，而俄罗斯则批评格鲁吉亚是车臣等地的恐怖分子以及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事件中恐怖活动的主要来源地。

2008 年 8 月 7 日夜，格鲁吉亚政府军以南奥塞梯军队违反停火规定袭击格鲁吉亚村落为由，起兵攻击南奥塞梯，并占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而俄罗斯方面在静观了 12 个小时之后迅速出手反击。冲突双方关于这场冲突起初阶段的军事行动合法性问题迄今争执不下，但是有关的一些争论内容还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令人玩味的是，8 月 12 日，在欧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为成功调停俄格冲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到，所签署的“六点协议”中为何只字不提及格鲁吉亚是一个主权统一国家时，萨科奇巧妙地回答道：从未否认格鲁吉亚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但此行专程为了解决冲突问题，其他问题容后讨论。而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于类似问题的回答则更加令人注目。他说，俄承认格鲁吉亚是一个主权统一国家，但是，作为主权国家，不排除其领土完整情况从来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状况。

①从两位政治家的答问中，人们可以看到，萨科奇是把解决冲突和国家主权问题相分割，而梅德韦杰夫则是把主权国家问题本身和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状况问题加以区分，从而揭示了格鲁吉亚问题本身所存在的复杂状况。换言之，格鲁吉亚出兵的理由是实现国家的主权统一，而俄罗斯出兵回击的理由，则是在地处格鲁吉亚境内的、不承认格鲁吉亚为主权国家、并且已经宣布独立的一个地区里来捍卫持有俄罗斯护照的居民和合法的俄罗斯维和部队士兵的安全。其所依据的理由也是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可见，在国际法本身尚无法对于上述情况作出完全适用的解释之前，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本身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从当时各方政治需要出发所提出一般批评。

包括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是否合乎国内法的问题，也有着激烈的争论，且持批评观点的并不只是西方人士，俄罗斯人中也有批评战争为“非法”的。比如，俄罗斯右翼联盟的自由派新领导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就公开批评俄出兵格鲁吉亚违宪，认为此番出兵仅仅是国家武装部队最高领导人的决定，而没有征得议会同意；而按照普京总理和梅德韦杰夫总统的表白，这次俄罗斯出兵“绝对是作为国家最高统帅的梅德韦杰夫的独自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俄罗斯方面出兵的决策背景。另一方面，在俄格冲突中对于俄罗斯寄予同情的专家，也不仅仅是俄罗斯人。比如，德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拉尔（Alexander Rahr）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时，美国总统也没有征得国会的同意，而不过是事后追认通过，因此也不必过于指责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就是违宪。可见这场争论所涉及的广泛程度。

### （三）关于所谓的“适度反应”问题

与西方媒体上几乎以压倒性舆论压力来批评俄罗斯的情况相反，那就是在国际学术界的讨论中，对于格鲁吉亚率先出兵攻打南奥塞梯首府，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都批评格方挑起战争带来祸患。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科尔顿（Timothy J. Colton）在瓦尔代会议上公开表示，格鲁吉亚率先出兵，这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实际上，连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也早在冲突发生之后，就在公开的场合明确地表示，格鲁吉亚错误地发动了这一场战争，美国一直在劝说格鲁吉亚放弃这次冒险，直至开战之前的最后一刻。<sup>②</sup>但是，对于俄罗斯的批评意见，则是俄罗斯对于格鲁吉亚局势所作的“反应过度”。然而，对于这一批评，普京总理一点不留情面地给予了尖锐的回击。瓦尔代会议上普京情绪颇为激动地说：

---

① 参见 *Johson's Russia List* 2008年8月13日关于法国和俄罗斯两国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有关报道。

② Джон Байерли. Мы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убеждали Грузию не делать этого//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49 (3966), 22.08.2008.

“什么叫作‘均衡反应’？难道俄罗斯公民遭受大规模的屠杀，我们可以按兵不动？我们今天不还手，那就意味着今后要挨更多的打击和惩罚。”<sup>①</sup>

#### （四）关于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的法理问题

8月26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宣布正式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之后，国际舆论激起了更大的反响，连起先一直主张与俄罗斯磋商协调的欧盟国家也开始用激烈的语言谴责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方面却反唇相讥，提出俄罗斯只不过是在按照“欧洲的逻辑”行事，亦即，为什么欧盟和美国能够支持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为何俄罗斯就不能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所取得的独立。

事实上，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科索沃的独立并不具有很充分的法理支撑。联合国秘书长特使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当时在起草“秘书长特使关于科索沃未来地位的报告”时，所强调的只是“科索沃不可能重新加入塞尔维亚”，“继续实行国际管理无法维持”等非法律方面的理由，而始终回避使用“人民自决权”这一原则。实际上，当今条件之下，历来使用“人民自决权”来论证少数民族独立合法性的传统做法已经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西方学者在论证科索沃独立的合法性时，大都强调的也只是科索沃的特殊性，强调其“不可比拟性”，旨在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sup>②</sup>笔者与欧盟高官的接触中所获得的印象是，欧盟专家在解释支持科索沃独立的立场时，也主要是强调所谓客观形势的紧迫性和这一案例的不可重复性。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学者中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俄在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问题上的立场。比如，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就公开表示：“匆忙地正式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未必会增强俄罗斯的声望。既然，这个局面无法改变，那就需要说明，拒绝承认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是个特殊情况，它是由格鲁吉亚不加掩饰的民族主义和反俄政策造成的”。<sup>③</sup>

可见，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对于援引“人民自决权”原则持谨慎态度。同时，如果都援引科索沃独立这样的个案来推理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的合法性，那也是一种相对比较消极的做法。“以牙还牙”有时只能加深危机的危险发展态势。

### 三、俄罗斯政治家对于俄格冲突及当前国际局势的认知

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不光是普京总理，还是梅德韦杰夫总统，都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危机时期较为充分地表达了他们既作为个人，同时也作为政治家对于国际政

---

① 参见俄罗斯总统网站（www.kremlin.ru）所发表的关于2008年瓦尔代会议的发言记录。

② 同上注。

③ 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ин.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от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к российской. Уроки конфликта с Грузией//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8 №6.

治问题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其中还包含着不少俄根据事态变化所提出的新概念。这些新提法的出现，显然对于理解俄罗斯对当前国际走势的看法具有重要意义。

### （一）俄罗斯领导人对于俄格冲突的直接反应

无论是普京总理还是梅德韦杰夫总统在这次俄格冲突期间都发表了大量讲话，与国外一流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包括政府首脑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在这些交往中较为充分地表达了俄罗斯方面的政治意愿，使得人们有机会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危机期间俄罗斯方面的决策背景。这样的决策背景不光包含着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决策的国内支持程度，也包括着俄罗斯与西方政治精英交往时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对于复杂事态的理解和判断程度。

第一，对于格鲁吉亚方面的率先动武，俄罗斯政治领袖表示了毫不留情的坚决谴责，从这一点看，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实际上与西方，包括与美国方面的事后表态没有原则性的分歧（连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都批评萨卡什维利的冒失动武）。

第二，梅普两位对于以下状况的发生表示异常愤慨：即在最初俄罗斯方面在南奥塞梯挨打时，国际媒体几乎很少反映，而对于尔后俄罗斯采取反击手段时，西方媒体却大肆攻击俄。梅普两位认为西方媒体如此不公平的表现令俄无法接受。在格鲁吉亚危机时期西方媒体的这一状况，的确是相当集中地体现了西方媒体在类似国际事件报道中较为普遍的倾向。

第三，梅普两人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的不满，认为惟有更替格鲁吉亚领导人，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第四，梅普两位领导人还透露出在北京奥运期间曾经与美国领导人密切磋商而毫无结果的信息。看来在过去 8 年中，普京和布什这两位国家元首所建立起来的个人政治信任，在这场俄格冲突中几乎已经被消耗殆尽。

第五，梅普两人的政治决策逻辑也十分清晰，特别是在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的问题上，他们公开质问：为什么科索沃可以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而几乎同样情况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却不能够得到应有的支持？

最后，这两位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在危机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鲜明个性，便是毫不犹豫地承担政治责任。普京甚至说，梅德韦杰夫总统是一个非常有教养、非常与人为善的领导人，是一个好小伙子，但是，西方要逼他在就任之初就不得不下决心坚决地在南奥塞梯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态度。当然，他说，出兵格鲁吉亚的命令是总统一个人的决定，他并没有提过任何建议。梅德韦杰夫也一改平时被认为是“谦谦君子”的姿态，在诸多公众场合坚定地表示，如果没有他作为三军最高统帅的命令，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一架飞机能够飞出国境去。从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表白中，可以看出，他们不光是要通过南奥塞梯冲突明显地突出梅德韦杰夫的独立决策地位，

而且也是表达了俄罗斯在这场危机中的强硬态度：一旦政治领袖的个人声誉已经和事件捆在了一起，那么，可以想象出这样的政治事件在政治领导人心中已经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

## （二）关于俄格冲突事件的意义

总的来说，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 8 月 8 日这一天所发生的冲突给予了非常突出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按照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几乎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如同“9·11”事件一样，“8·8”事件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俄罗斯。对于这一提法的内涵，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从多个角度进行了阐述：

其一，俄方认为，事实证明单极世界根本对付不了当前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危机，包括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因此单极世界已无出路。

其二，甚至在这样一个国际和欧洲的安全结构中也没有俄罗斯的位置。而鉴于俄罗斯的大国地位，特别是由于俄罗斯已不再是 90 年代的俄罗斯，当前的国力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sup>①</sup>，因此，俄想要公开地宣布实现自己的大国利益。

其三，俄宣示实现大国利益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梅德韦杰夫总统在 9 月 12 日瓦尔代会上公开宣布俄有着自己的“专属利益区”。梅德韦杰夫在回答哪些区域是俄的“专属利益区”这一问题时明确表示：“凡是俄罗斯存在着传统友好关系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传统双边和多边利益的地区，都是俄罗斯特别关注的地区”。<sup>②</sup>

## （三）关于“新冷战”问题

关于南奥塞梯冲突是否意味着新冷战形势已经到来的问题，曾在国际学术论坛和媒体上引起激烈争论。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 Karaganov)和莫洛托夫的外孙、俄罗斯政治基金会主席维·尼科诺夫(V. Nikonov)等人以南奥塞梯冲突已经根本改变了世界、西方正在形成对于俄罗斯的新的遏制，而作为反应，俄罗斯对外政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硬等为理由，力陈“新冷战的形势已经到来”的观点。西方学者中也不乏有人出自各种不同的理由，强调“新冷战”的到来。这里既有象波波·罗(Bobo Lo)这样的学者从揭示全球化进程掩盖着新的国际对抗的现象这一角度出发，认为现在是有人口是心非地利用全球化的机遇，企图以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图一己之私利，并指出，正因为此，已经形成了当今国际格局中，国与国之间普遍恶性竞争的局面<sup>③</sup>；在这一方面，也有像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这样的新保守主义学者，以 8 月 8 日那一天中国成功举办奥运和

---

① 俄领导人是指金融危机之前的俄国力的复苏和增长。

② 参见俄罗斯总统网站(www.kremlin.ru)所发表的关于 2008 年瓦尔代会议的发言记录。

③ Bobo Lo, *Axis of Convenience: Moscow, Beijing,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Chatham House, London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 C., 2008, p.159.

俄罗斯反击格鲁吉亚挑衅这两件大事为由，预言新的“专制政体”正在以联合姿态挑战西方，因而出现了“新冷战”的局面。<sup>①</sup>

所幸的是，在此激烈论战的局面下，多数舆论都不同意目前已经面临冷战形势的观点。包括在瓦尔代会议上，许多俄罗斯的著名自由派学者，如《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这一份当红杂志的主编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就公开反对，强调通常意义上的冷战不可能卷土重来，认为目前冲突形势中的军事政策只是总体形势中的一部分。相当多的学者则指出：虽然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但这不等于集团军事对抗，而集团对抗才是冷战最主要的标志；虽然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受到了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挑战，但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潮流看来依然是主要的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尽管都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中坚决地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两人一致认为，作为冷战标志的集团对抗性现象并没有出现；同时，也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对抗性状态，尤其是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所以，冷战并不可能重新出现。同时，梅德韦杰夫强调，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首先是服务于国内政治目标。<sup>②</sup>从这个角度出发，两位俄罗斯领导人均重申俄罗斯国内还有太多事情要做，比如，发展经济、彻底反腐、提高出生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金融和基金市场等，根本没有理由再对“新冷战”感兴趣。

从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对于这场冲突的直接态度，以及在此前后所表达的关于当前若干重大问题的理论观点来看，显然，俄方虽然具有在更大规模上参与全球事务的抱负，虽然绝对无法容忍格鲁吉亚的先发制人，虽然也不满意西方依然将已经表现出合作意愿的俄罗斯拒之门外的态度，虽然也坚决地回击了来自格鲁吉亚方面的挑战，但总体而言，俄最高领导人并不打算将这场俄格危机立即转化成为俄西方之间的全面对抗，其对国际社会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是俄不准备再作退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的立场不可妥协，此次俄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至多意味着俄对外战略中以攻为守的一种新的立场和态度。

#### 四、欧盟与美国对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的态度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欧盟与美国在俄格冲突中的态度。就美国而言，从冲突还没

---

<sup>①</sup> 参见 Robert Kagan, “Power Play”,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0, 2008; Robert Kagan, “History’s Back: Ambitious Autocracies, Hesitant Democracies”, *Weekly Standard*, August 25, 2008.

<sup>②</sup> 在这一点上与普京非常近似，在 2008 年的瓦尔代会议上，普京开宗明义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首先就是为了本国利益服务。

发生的那一刻起就表现出骑墙态度。多年来，美国一方面坚决地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支持格鲁吉亚在一系列问题上向俄罗斯叫板，但同时，根据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透露，直到战争发生的最后一刻，美国一直在劝阻格鲁吉亚不要轻举妄动，但是格鲁吉亚不肯听从美国的劝告。<sup>①</sup> 到危机发展到后来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而美国副总统切尼（Richard Bruce “Dick” Cheney）和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均前往格鲁吉亚以示支持的地步，美仍然一直避免采取强硬制裁手段对付俄罗斯。即使是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表态，大体上也没有超出这一立场。

欧盟国家的态度更是意味深长。从法国来看，萨科奇总统积极出面调停首先是因为法国是欧盟轮值国主席，必得有所举动；其次，鉴于萨科奇本人给人的印象是亲美派，远比希拉克容易在对美关系上与美国拉开距离；在此同时，萨科奇是一个在对俄政策方面立场强硬的政治人物，他对俄格冲突进行调解，反倒可能获得意外的效果。加上近来法国总统国内国际形象有待提升，他本人急于要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俄格冲突就成了他最好的舞台；此外，俄罗斯及时接盘、聪明应对，以及传统的法俄关系，包括萨科奇在处理这次突发事件中所采取的务实态度，都在这次调停成功中起了作用。

德国在这次俄格冲突中的表现也颇不寻常。德国国内外形势变化很快。首先是目前的多数民意支持与俄罗斯维持良好关系，并认为格鲁吉亚有错在先，是萨卡什维利首先越过了红线。据德国学者的判断，甚至相当部分德国民众认为俄对格鲁吉亚的反击是有道理的，所以默克尔不得不考虑民意向背。其次，虽然默克尔本人接受了来自美国方面非常大的压力，要求德国强硬谴责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危机上的态度，但是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国民意识中一个非常强烈的倾向是希望成为一个“道义国家”，因此，要求就国际问题自主发表意见。在此背景下，默克尔仅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场合说了一些强硬的话，基本上不按美国人的调子发言。当然，德国在施罗德时期的遗产，包括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德国不得不采取与俄罗斯合作的态度。

法德的态度加上意大利、西班牙等传统上与俄罗斯比较接近的国家，所以，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俄罗斯在欧洲的说客还真是大有人在。

至于英国的态度，据前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莱恩（Roderick Lyne）的说法，戈登·布朗只想在外交上改变布莱尔时期的政策，但是自己又拿不出多少象样的主张，外交部长又甚为年轻，并没有与俄罗斯打交道的经验，所以使得英国与俄罗斯双边关系

---

<sup>①</sup> Джон Байерли. Мы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убеждали Грузию не делать этого//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49 (3966), 22.08.2008.

的形势越来越激化。同时，布朗执政以来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甚至达到了 50 年来最糟糕的程度，而布朗本人还想采用新工党的激进治国方法，使得布朗的民意支持率极低，这些因素造成了英国虽有心但无力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状况。<sup>①</sup>

波罗的海和中东欧等与俄罗斯关系敏感的国家，虽然牵制着与俄罗斯妥协和改善关系，但中东欧国家内部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比如，一般认为中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有着较强的反俄情绪，但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前波兰副总理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认为，在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依然会在欧洲地区的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因此，美国以为只要削弱俄罗斯，西方就会强大的思维是短视的。相反，应该帮助俄罗斯在新的世界划分中获得应有的地位，这也符合欧洲的利益。他希望波兰能够与俄罗斯保持睦邻关系，这符合波兰的国家利益。<sup>②</sup> 可见，欧盟内部的复杂态势使其对俄战略决策的力度不能不大打折扣。

总之，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之下，欧盟与美国之间在处理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危机问题上的明显不同态度，为俄罗斯今后外交上的施展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 五、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到金融危机的发生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无疑对于俄罗斯的内部和外部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而这场冲突又使得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态势。因此，从一个中短期趋势来看，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互关系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作用于欧亚地区、乃至整个国际格局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的一种判断在马上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机中得到了体现。

### （一）关于俄罗斯的国内走向。

从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的一个阶段看，特别是在俄格冲突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梅普合作相当默契。这一方面是长期密切的个人关系积累所致，再加上双方具有相同的治国理念，以及普对梅的大力支持。虽然，如前文所指出的，关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问题，所有各方的立场并非没有一点争论，但是必须承认，这场冲突中无论是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的态度，都受到了俄罗斯国内民意的多数支持。俄罗斯近期的媒体评论认为，有“两个头”要比“一个头”好。<sup>③</sup> 这样的舆论反映了国内民

---

① 莱恩爵士在 2008 年 9 月瓦尔代会议期间与作者的交谈。

② Гжегож Колодко. России надо помочь обрести достойное место// 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 21.10.2008.

③ Максим Гликин, Мария Цветкова,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ьский. Две главы лучше// Ведомости. №248(2270), 12.30.2008.



众对于“双头政治”的肯定。根据 2008 年 9 月 19 日公布的列瓦达分析中心的报告,83% 的民众肯定了梅德韦杰夫总统的施政表现。这一数据远远高于民众对他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之前施政表现的肯定度。<sup>①</sup>

从一个较长期的阶段来看,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不光在国家政务的分工方面能够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总理主内、总统主外”的宪政格局使得两人能够既保持统一声音,同时又能够有所侧重地专注于国家的内外事务。而且,到需要的时候,甚至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还能够分别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所侧重,以“一左一右”的方式推行“俄国式的民主政治”。这样一种国内政治格局是可以在得到多数认同的情况下延续相当长的时间的。应该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是加强了普京路线的政治稳定度。当然,从一个长时期看,梅普合作能否成功地克服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后任对前任政治路线大幅度修正甚至背离这样的惯性,还需要两位政治家在今后的政治实践中作出更多的努力来加以证明。但是,在可见的将来,俄罗斯的政治发展甚至在修正版的“主权民主”理论指导下出现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也未必不可能。

## (二) 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对于俄罗斯的影响。

与政治情况相比,金融危机的发生猛烈地冲击了俄罗斯既定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在一段时间内,油价持续下跌,资金迅速外流,卢布贬值,大量债务累积,在此情况之下俄罗斯公司面临尖锐的挑战。用副总理库德林(Alexei Kudrin)的话来说,2009 年俄罗斯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sup>②</sup>

在这场危机之前,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经济发展有着很清晰的思路。其一,正如笔者一再亲自听到普京前总统所表白的那样,俄罗斯不愿意做超级能源大国。想必,对于普京来说,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并不利于市场发展的定则是了然于胸的;其二,笔者所接触过的俄罗斯国家精英,几乎一致的立场,是下决心要发展高新技术,发展金融服务,同时也发展俄罗斯领先的若干传统部门,包括军事工业、航天技术等,以此来引领整个经济的发展;其三,俄罗斯非常愿意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来实现俄罗斯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但是,俄罗斯也恪守利益原则,不会在有关国家核心产业发展的问题上过分让步;同时,俄罗斯的外向型经济战略面向东方和西方这两个向度,力求通过东西方之间的博弈和平衡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从 2008 年春天以后,也即俄罗斯的油气产业部门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大好形势之时,越来越多地听到来自俄罗斯政要的这样的声音:凭借俄罗斯当时经济发展的

---

<sup>①</sup> <http://www.levada.ru/press/2008091901.html>.

<sup>②</sup> Ria Novosti, Moscow, December 27, 2008. <http://en.rian.ru/business/20081227/119197315.html>

强劲势头，以及自从 1998 年以来卢布的坚挺态势，要扩大卢布的运行范围，“俄罗斯要成为国际金融的一个中心”。

金融危机的突如其来使得俄罗斯面临着一个措手不及的局面。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筹划。俄罗斯政府在梅德韦杰夫总统主持之下推出了《俄罗斯联邦面向 2020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一重要文件中，俄罗斯依然坚定地重申在未来中期时段内使国家成为世界五大经济体之一，并且将经济与社会安全标准放到了首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公开承认了，俄在未来的长时期中难以改变以能源为主的经济结构，同时也第一次公开表示将利用能源来增加政治影响力。此外重要的一点是，梅德韦杰夫总统在 2009 年 5 月 6 日接见世界编程大赛冠军时坦率地承认：“老实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俄罗斯建立现代信息社会和发展创新经济的所有尝试都不怎么成功”，其中也包括对于俄罗斯要建成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许诺。

上述的表达，可以看作是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自身实力与状态、以及未来计划实现目标的一个非常认真的反思。这样的认真反思实际上已经通过俄罗斯一系列的内外部署逐渐得到了体现。其中包括俄罗斯一连串的紧急救市计划，也包括俄罗斯对外经济中的一连串安排。

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使得俄罗斯必须集中精力首先解决国内经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而且，俄罗斯国内已经出现了调整对外战略的呼声。在对外事务的首选方向方面，就像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所提出来的：金融危机波及了俄罗斯，表明了俄罗斯的经济能力和地缘政治能力的有限性。这场危机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将精力和资源集中于欧亚政策和与欧洲的关系。<sup>①</sup> 因此，有效地控制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的升级，适当地调整与格鲁吉亚的关系，成为俄罗斯外交当时的首选；与此同时，在欧洲事务的层面上，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了就欧洲安全结构和西方进行对话的倡议。这一层面的对话构想中既包括着俄罗斯与北约、俄罗斯与欧洲安全合作组织重启谈判的完整构想，同时也包含着与一系列地区重要国家，包括欧盟国家、伊朗等方面进行合作与对话的安排，目的在于从欧洲取得搞活外交的突破口；最后，利用金融危机的机会，俄罗斯也不放弃寻求机会表达其大国理念，展示其大国影响。例如，普京总理 2009 年 2 月在达沃斯论坛上就对金融大国提出了批评，而梅德韦杰夫总统则在 2009 年 4 月 G20 伦敦峰会上与中国主席胡锦涛几乎是共同提出了关于建立超主权货币的未来构想。

限于篇幅，本文集中介绍俄格冲突的善后，以及在这场地区冲突与国际金融危机相互交织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大国关系走势的基本状况。

---

<sup>①</sup> Fyodor Lukyanov,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30.11.2008.

## 六、俄格冲突与金融危机交织下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冲突之后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互关系走向，取决于对于这场冲突本身的认识。

关于俄格冲突是否具有如同“9·11”对于美国、乃至对世界格局的那种影响，还是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地区性冲突，从目前看，这还是各方意见不一的一个争议性问题。

这里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五日战争”是否导致了一场全局性的国际地缘政治变化。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场冲突还算不上是一场全局性的变动，因为从冲突所发生的地域及其影响来看，主要还是发生在俄罗斯以西的欧洲地区或欧亚地区，还没有引起全局性的波动。但另一种意见认为，这场冲突实际上已经波及了主要超级大国美国、最大的经济体欧盟、以及最大的转型国家俄罗斯等世界级的大国，而且冲突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大国关系今后的走向问题，因此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不过这种全局性的影响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而被忽略了而已。

从逻辑上说，的确俄罗斯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后已经调整了对外战略部署，其中包括发出与欧洲以及与美国进行对话和和解的呼声。俄罗斯不仅就欧洲安全框架问题已经恢复了与欧洲的对话，而且与北约的接触也已经正式恢复。此外，事实上，通过俄罗斯向阿富汗地区运送物资的通道始终一直在保持运行。但是，从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在拉美地区加紧外交活动，以及梅德韦杰夫在奥巴马当选的当天宣布要在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的行动来看，俄罗斯目前的基调是：借机向西方显示强硬姿态，延续俄格冲突阶段的高调，以显示保护俄罗斯周边地区核心利益的决心；与此同时，调整现有外交部署以因应金融危机的挑战，以免过度反应引起总体紧张局势。总体上看，目前俄罗斯的战略特点还是“以攻为守”，同时加上“适度调整”。

俄罗斯的这种调整，是与目前出现在格鲁吉亚、欧洲、以及美国的动向大体吻合的。

冲突之后的格鲁吉亚不仅已经大幅度地撤换了在冲突期间几乎所有的重要干部，包括原来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以及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等，而且新任命的外交部长瓦沙泽（Grigol Vashadze）一方面是前任的副手，另一方面又是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80年代曾在苏联外交部供职的格俄双重国籍拥有者。俄罗斯方面虽然不会认为瓦沙泽是“朋友”，但是显然认为能够和此人一起工作。相应地，一向主张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并曾多次批评现政权与俄罗斯的冲突的前格鲁吉亚驻俄罗斯大使阿巴什泽（Zurab Abshidze），现在也已经正式被任命为格鲁吉亚文化部长。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标志着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有可能得到改善。甚至连俄罗斯

国家杜马外交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Konstantin Kosachev)都发表看法认为：2009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有可能得到改善。<sup>①</sup>

然而，之所以说目前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还只是存在着改善的“可能”，是因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的外交战略的长远定势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作为这样一种判断的重要标志是，2009年1月9日，美国与格鲁吉亚正式签署了“美国与格鲁吉亚伙伴关系宪章”。即将卸任的国务卿赖斯毫不退让地在“宪章”的签署仪式上宣布：格鲁吉亚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伙伴、价值观念的伙伴；美国将支持格鲁吉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格鲁吉亚在欧洲—大西洋地区施展抱负，支持格鲁吉亚与欧洲—大西洋机构的一体化；同时，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速度将取决于格鲁吉亚自己的意愿和格鲁吉亚达到北约标准的能力。<sup>②</sup> 还有11天就要离任的一个政府却要签署这样的一个重要而敏感的外交条约，显然是要显示美国不甘心在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中处于下风，而且也势将对于奥巴马接手这一地区事务的立场产生重要的制约。

处于金融危机之中的欧美国家并不会急于就这一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事务作出仓促的战略安排。但是，打下一个像“美国与格鲁吉亚伙伴关系的宪章”这样的楔子，显然是旨在为未来的进一步复杂多变的竞争作好铺垫。从这个角度看，美国调整与俄罗斯的关系未必有太多的空间。

就外高加索地区可能的前景而言，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其一，外高加索地区的中立化。这种前景所需要具备的因素包括：俄罗斯经济政治的基本稳定，西方对于格鲁吉亚采取冷淡或排斥态度，格鲁吉亚等国本身接受中立化的状态。从目前乃至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已经不具备这种前景的可能性。

其二，外高加索地区的进一步西方化。其必要前提是美国大选后的新领导人表现出强有力的支持格鲁吉亚的决心，西方（特别是欧盟）一致同意进一步推动格鲁吉亚等国加入北约，而俄罗斯强硬对抗的决心被动摇。目前看来，这样的态势也已不太可能，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对于西方各国产生巨大压力的背景之下。

其三，较长时间之内，外高加索的形势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出现时发性的动荡，俄罗斯与西方势力在该地区处于拉锯状态。这是最可能出现的一种态势。其根据是，在瓦尔代会议上有不少专家私下认为，目前据以作出判断的信息远不够充分，各方还在相互摸底的过程当中；包括当时的南奥塞梯冲突，实际上不过是今后更大的乌克兰危机的预演而已，2017年俄罗斯黑海舰队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租期届满，围

---

① ИТАР-ТАСС, Москва, 26.12. 2008.

② “Remarks by Rice, Georgian Foreign Minister Vashadze at Signing Ceremon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January 9, 2009.

绕着这一问题的冲突与协调日后势必浮上水面；西方虽然内部分化速度加快，又身陷经济危机，但事关战略大局不可能不作最大的竞争努力；而俄罗斯虽然实力依然有诸多限制，但是恢复大国地位的决心，以及多年来所累积起来的实力增长将会推动其在欧亚地区的战略竞争中不甘示弱。特别是，危机以来的国际能源形势一波三折，包括最近以来世界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这又为俄罗斯的经济反弹注入生机。所以，今后一个时期内，俄罗斯和西方各国将会相互以进攻性的姿态进行试探，同时以较为有弹性的立场回旋应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将持续地处于低度紧张，同时不排除间歇性的危机迸发状态。这样的一种国际政治态势将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整个过程的一道佐餐，与国际金融形势相伴始终。

就这样的状态而言，要求一切与当地进程相关的大国作出更大的努力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但是，这样的一种要求又与各大国自身的诉求，以及整个宏观态势的演进密切相关。

## 七、“危机政治经济学”及其对于中国的启示

第一，无论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武装冲突，还是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都是同时作用于国际进程的关键因素，两者存在着内在联系，不能只强调某一个方面。一方面，俄格冲突激发着俄罗斯的大国抱负，即便是实力有限，却依然表现出超理性、超民族的情怀，不仅是要维护前苏联地区的传统影响能力，而且准备冲决国际体系中的不合理部分。从另一方面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严重地限制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行动能力，使得其在欧亚地区与俄罗斯对峙的局面不得苟且于现状，甚至准备作出让步。这两种因素的同时并存，使得军事冲突和金融危机相互借重，相互激荡。

从学理的角度看，谁掌握了一种稳定的国际货币，谁就掌握了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谁掌握了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谁就掌握了整个世界。这样的三段式在今天依然具有实际效用。但是，进一步的观察表明：任何一种经济秩序的稳定和重构都有赖于大国间的政治与战略合作，以及谁能够在这种合作中有最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在危机的形势之下。这就是“危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信条。

第二，当今国际事务伴随着多重意义上的深刻转型，既包括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乃至国际安全体制的转型。这两种不同的转型进程互相发生着有机的联系，即：由不同的内部体制转型所激发和外溢的能量，要有相应的国际体制来加以重新安置和协调其利益与功能。

于是，就至少出现了以下三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类似于三年前约翰·艾肯伯理（G. John Ikenberry）和安玛丽·斯特劳（Anne-Marie Slaughter）主导的《普林斯顿方案》所提出的意见，认为当前的国际体制基本上能够容纳，或者，经过一定的调整，能够吸收转型国家进入这样的国际体制，然后，在这样一个基本上由西方主导的体制之内，推动国际和各国内部的发展和进步。<sup>①</sup>

第二种主张类似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主张，也即主要是通过外力，通过类似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基本上不顾及各地的历史和传统，不断地推广民主和市场体制。

第三种主张，这是我觉得比较合理和可行的路径，也就是通过互动的方式、在现代语言学里被称为“对话”的方式，来实现内部体制变迁和外部体制重构之间的合作。这是俄格冲突之所以发生的一个深层机理，也是今天国际金融体制重构中一个现实问题，当然，也是中国的转型所面临的基本态势。

第三，就国际层面来说，无论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还是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都揭示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重要趋势，那就是“西方的分裂”<sup>②</sup>。下列图表所示，是这一过程的大体概括：

**冷战结束以来美、欧、俄相互关系的变化路径**

	“9·11”	伊拉克战争	颜色革命	反导部署	天然气危机	俄格冲突	金融危机
美	合作	发动战争	合作	发起者	旁观者	偏袒	始作俑者
欧	合作	反对	有保留合作	不合作	受难者	协调	受害-改革
俄	合作	反对	坚决反对	坚决反对	施动者	借机伸展	受害-改革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仅仅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美国、与欧洲的相互关系来看的。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个上述俄、美、欧三家之间的合作不断地遭到冲击，同时，相对而言，是俄罗斯与欧洲较为接近，而欧洲与俄罗斯同时地与美国较为疏远的过程。特别是从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冲突、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俄、美、欧三家的相互关系来看，西方内部的裂痕深重乃是十分明显的趋势。

第四，与上述过程相应的变化，是中国在上述三家之间的关系相对地处于一个较为超脱的地位：中国支持一切有利于国际社会与区域稳定的趋势，反对霸权主义、也反对国际事务中的种种不合理、不公平，但是，中国人主张采取中国人的方式：协商、和解、建设性地解决问题。这可能是“危机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但也是非常

①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 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 Report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September 27, 2006.

② 5年前美国 J.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欧洲系的著名学者戴维·卡莱欧教授提出过这一概念。参见戴维·卡莱欧：“地缘政治与破裂的西方”，载俞立中主编《全球化时代》（大厦讲坛丛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50页。

重要的含义。

中国人所主张的协商、和解、建设性地处理大国关系，并不意味着是无原则的妥协和迁就，因为当前的俄格冲突和金融危机这两件大事所提示的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转机的出现——多少年以来，由工业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劲的金融实力进行消费，而由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承担和输出生产功能的这样一个格局正在发生转变，亦即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运用自身的金融实力与影响，相当部分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有可能在传统西方金融大国之外发生，从而逐步地引起整个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

所以，在当今条件下，作为中国人如何地运用自然形成的态势，因势利导，为构建新的国际体制，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这就是本文想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意思。

---

**【Abstract】** The Russia-Georgia conflict happened in 2008 bring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great powers. Simultaneously, the ongoing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lso greatly challenges the Russia-West relations. These two major crises, although seem to be irrelevant, both reflect the unbroken attitude of Russia in crisis situations,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ed statu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Wh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isis’ emphasizes is the decisive role of cooperation among great powers, either for getting rid of the military conflicts or overcoming the financial tsunami.

**【Key Words】** Russia-Georgia Conflic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Relations among Great Power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isis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руз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мировой финансовый кризис,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кризиса

---

（责任编辑 常喆 肖辉忠）

## 科索沃政治发展：从托管到“独立”

高歌\*

**【内容提要】**科索沃的政治发展在两个层面上运行，一是在政治权力归属上，由联合国向欧盟和科索沃当局过渡；二是在政治体制建设上，构建并实行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并关注社群权利保护的体制模式。在这两个层面的发展中，科索沃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内部环境既提供了动力，也构成了障碍。

**【关键词】**科索沃 政治发展 托管 独立

**【中图分类号】**D73/77.543.09**【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3-0087-(10)

1999年6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第1244号决议，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丧失对科索沃的控制权，科索沃成为联合国的托管地。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科索沃独立宣言》，宣布科索沃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从被联合国托管到单方面宣布独立，科索沃政治在政治权力的托管与移交、政治体制的构建与运作中发展，走上了一条颇为独特的政治发展之路。“独立”后，科索沃仍继续沿这条道路艰难前行。

### 一、政治权力的托管与移交

处于托管地位的科索沃，其政治权力掌握在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UNMIK）手中。该使团的任务是：行使基本民政管理职能，促进科索沃建立实质性的自治和自我管理，推动决定科索沃最终地位的政治进程，协调所有国际机构的人道主义和灾难援助，支持基础设施的重建，维护法律和秩序，促进人权，保证科索沃所有移民和难民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返回家园。使团通过联合国领导下的四大“支柱”完成其任务：“支柱I”为人道主义援助，由联合国难民事务

\* 高歌，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法学博士，研究员。



高级专员公署（UNHCR）领导，该工作已于 2000 年 6 月底停止；“支柱Ⅱ”为民政管理，由联合国领导；“支柱Ⅲ”为民主化和制度建设，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领导；“支柱Ⅳ”为重建和经济发展，由欧洲联盟管理。使团首脑，即联合国秘书长驻科索沃特别代表（SRSG），作为科索沃最高国际民事官员，主持四大支柱的工作。<sup>①</sup>

为履行促进科索沃建立实质性自治和自我管理的任务，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几乎自其“管理”科索沃之时起，便开始了建立并逐步将职权移交给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的努力，成立了科索沃过渡时期理事会和临时行政委员会。1999 年 12 月，上述两个机构合并为临时联合行政机构（JIAS），在 20 个行政部门实行双部长制，由科索沃人和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的工作人员共同管理。2000 年 10 月，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和欧安组织驻科索沃使团，组织了科索沃地方选举，选出了 30 个乡镇议会，任命了乡镇的执行机构。

2001 年 5 月 15 日，联合国秘书长驻科索沃特别代表汉斯·海克鲁普，签署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第 2001/9 号规章，宣布“为在科索沃最终地位解决前发展意义深远的自治，通过科索沃人民参与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建立临时自治机构，颁布《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决定在联合国安理会 1244 号决议规定的范围内，将职责移交给临时自治机构”<sup>②</sup>，从而为科索沃自治机构的建立和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的移权奠定了法律基础。11 月，根据《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科索沃选出了首届议会，随后，议会选举产生了总统，政府也得以组建。

《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颁布和临时自治机构建立后，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逐步将越来越多的职权，移交给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2006 年以来，随着科索沃最终地位谈判的展开和《科索沃地位解决方案全面提案》的提出，欧盟力图取代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成为科索沃新的监管者。2006 年 11 月，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发言人表示，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科索沃最终地位的决议之后，使团将逐步撤离科索沃，在 3~6 个月的时间内将权力移交给欧盟。2007 年 2 月，联合国特使阿赫蒂萨里提出《科索沃地位解决方案全面提案》，建议在《提案》生效后的 120 天过渡期内，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与由欧盟理事会（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任命的国际民事代表（ICR），即欧盟特别代表（EUSR）组成工作小组，向科索沃当局移交权力，并由欧盟建立欧洲安全与防御政策使团（ESDP），

---

① 参见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网站，<http://www.unmikonline.org/>。

②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Provisional Self-Government in Kosovo, [http://www.assembly-kosova.org/common/docs/FrameworkPocket\\_ENG\\_Dec2002.pdf](http://www.assembly-kosova.org/common/docs/FrameworkPocket_ENG_Dec2002.pdf)，以下有关《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的内容均参见于此。

向科索沃提供法治支持。过渡期结束前，科索沃议会应通过新宪法；过渡期结束时，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终止存在，由国际民事代表（欧盟特别代表）在科索沃民事领域行使最高权力。<sup>①</sup>此后，欧盟加大了对科索沃事务的参与力度。12月，欧盟首脑会议决定向科索沃派遣由警察、法官等文职人员组成的法律使团(EULEX)，帮助科索沃建设警察和司法部门，促进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向欧盟法律使团和科索沃当局移交权力。该决定于2008年2月4日得到欧盟26国代表同意（塞浦路斯弃权）。2月15日，就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前两天，欧盟完成了向科索沃派遣法律使团的最后程序。

《科索沃独立宣言》声称，科索沃完全遵循联合国特使阿赫蒂萨里的建议和《科索沃地位解决方案全面提案》，并邀请和欢迎国际民事代表和欧盟使团实行监督<sup>②</sup>，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向欧盟法律使团和科索沃当局移交权力的进程据此得以延续。在科索沃“独立”后的120天过渡期内，一方面，欧盟派出相关人员为部署驻科索沃法律使团做前期准备，科索沃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也在进行之中。2008年4月2日，欧盟特别代表彼得·费特批准科索沃宪法草案。7日，科索沃领导人签署了宪法草案，并将其提交给议会。9日，科索沃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另一方面，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的重组也提上了日程。6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安理会提交特别报告，建议缩小使团的职能范围，将其职能局限在监督与报告、协助科索沃参与国际协议，以及促进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对话等方面，以便让欧盟逐渐在科索沃警务、司法以及海关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并决定任命新的联合国秘书长驻科索沃特别代表，配合使团的重组进程。6月15日新宪法生效后，欧盟法律使团没能如期进驻，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也未结束使命，只是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指示开始进行重组。6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驻科索沃特别代表贝托·赞尼尔到任。6月26日，赞尼尔宣称将用120天的时间，即在10月底前，完成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的重组，重组期间，使团的机构将减少，其发挥的作用将与现实相符。7月17日，潘基文向安理会提交报告，声称鉴于安理会内部分歧严重，无法提供明确的指导，为适应变化的环境，让欧盟在科索沃法治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说他已下令重组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

科索沃政治权力的移交并非一帆风顺。首先，科索沃被托管期间，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向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移交权力，既未得到科索沃塞族的认可，

---

<sup>①</sup> 参见 Comprehensive Proposal for the Kosovo Status Settlement, 2 February 2007, <http://www.assembly-kosova.org/common/docs/Comprehensive%20Proposal%20.pdf>.

<sup>②</sup> 参见 Kosov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http://www.assembly-kosova.org/common/docs/declaration\\_independence.pdf](http://www.assembly-kosova.org/common/docs/declaration_independence.pdf).

又满足不了阿族的需要。塞族政治力量“将加强科索沃自治机构的任何措施都视为朝着独立方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极力反对”；阿族政治力量则“将政府职权和行政职权的转交视为最终地位问题的预先判决”<sup>①</sup>，迫切要求迅速接管权力，经常抱怨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的移权速度太过缓慢。其次，科索沃“独立”后，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向欧盟移交权力，在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坚决反对下举步维艰。欧盟法律使团的进驻和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的重组，都未能按期完成。直到2008年11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才同意欧盟在科索沃部署法律使团。12月9日，欧盟法律使团正式开始部署，从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手中接管警务、司法和海关等领域的职权。

## 二、政治体制的构建与运作

2001年5月，由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颁布的《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基本依照西方模式，为科索沃构建了以议会制和三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宪法框架》开宗明义地指出：“科索沃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进行民主管理”，“其临时自治机构包括议会、总统、政府、法院和宪法框架规定的其他机构”，“完全尊重和发扬法治、人权与自由、民主原则及和解精神”，“尊重和发扬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分立的原则”。随后，《宪法框架》明确规定了议会、总统、政府、司法机关的产生、运作方式和职责。

此外，为缓解尖锐的民族对立，《宪法框架》专门用一章的篇幅阐释社群<sup>②</sup>及其成员的权利，宣称临时自治机构的政策和实践，应在社群间促进共存和支持和解，创造保存、保护和发展社群认同的适当条件，并一视同仁地促进科索沃所有社群的文化遗产的保存，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保留必要时以保护社群及其成员权利为目的的干预自治的权力。这种保护社群权利的理念，被贯彻进政治体制的设计中，使科索沃政治体制在仿照西方式议会制和三权分立之时，带上了某些自己的特征。

“独立”后的科索沃，基本延续了《宪法框架》确定的政治体制。2008年6月15日生效的《科索沃共和国宪法》，重申了构建政治体制的三权分立原则：“科索沃是基于分权与制衡原则的民主共和国”，“议会行使立法权”，“总统是民族统一的象征，在国内外是国家的合法代表，是科索沃共和国机构民主运作的保证”，“政府负责执行法律和国家政策，受议会控制”，“司法权具有唯一和独立性，由法院行使”，

① [奥地利]赫尔穆特·克拉默、维德兰·日希奇：《科索沃问题》，苑建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② 根据《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的解释，社群（community）是指属于相同种族、或相同宗教、或相同语言的居民组成的团体。

“宪法法院是保护宪政并对宪法作出最终解释的独立机构”，并保证“宪法生效前建立的各机构授权不变，直至其任期届满或下次选举”。<sup>①</sup> 与《宪法框架》一样，《宪法》也以一章的篇幅阐释了社群及其成员的权利，并在政治体制中反映了保护社群权利的原则。当然，为适应由联合国托管地到“独立”国家的变化，一些具体制度设计有所改变或细化。

自 2001 年 5 月《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颁布以来，在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和欧安组织驻科索沃使团的领导、组织和监督下，科索沃已经举行了三次议会选举，成立了议会，选举了总统，组建了政府，建立了三级法院体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已在实践中运作起来。

2001 年 11 月的议会选举，是《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颁布后的第一次选举，对确立科索沃政治体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次选举中，阿族的科索沃民主联盟、科索沃民主党和科索沃未来联盟，分居第一、二、四位，塞族的回返联盟位居第三（参见附录）。12 月，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民主联盟的奈斯赫特·达奇当选议会主席，并代行总统职责。2002 年 3 月，议会选举民主联盟创始人鲁戈瓦为总统，批准了以民主党副主席巴伊拉姆·雷杰皮为总理，由民主联盟、民主党和未来联盟组成的政府。这样，联合国托管下的科索沃有了自己的议会、总统和政府。

2004 年 10 月的议会选举，是“对政治制度稳定性和成熟性”的“一次更为重要的考验”<sup>②</sup>。在这次选举中，阿族的三大政党——民主联盟、民主党和未来联盟，分列前三位（参见附录）。12 月，议会再次选举鲁戈瓦为总统，批准了以未来联盟主席拉穆什·哈拉迪纳伊为总理，由民主联盟、未来联盟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政府，另一阿族政党——民主党沦为反对党。这一没有包括所有阿族政党参加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科索沃向西方式议会制的发展，正如其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索伦·耶森—彼得森所说：“我们将第一次拥有一个存在强大反对派势力的民主政府。我认为，对于民主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健康有益的因素，因为我们可以依靠反对派，它们始终不渝地希望向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挑战。它们只会推动政府和国际社会不断做出更好的业绩。它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有利于科索沃的发展。”<sup>③</sup>

2007 年 11 月的议会选举，在科索沃最终地位谈判步入最后关头时举行，集中反映了科索沃阿族的独立愿望。在这次选举中，科索沃政党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

①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sovo, <http://www.assembly-kosova.org/common/docs/Constitution1%20of%20the%20Republic%20of%20Kosovo.pdf>, 以下有关《科索沃共和国宪法》的内容均参见于此。

② [奥地利]赫尔穆特·克拉默、维德兰·日希奇：《科索沃问题》，第 187 页。

③ 转引自上书，第 192 页。

在独立问题上较为激进的民主党，首次战胜比较温和的民主联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见附录）。2008年1月，议会再次选举民主联盟领导人法特米尔·塞伊迪乌为总统<sup>①</sup>，批准了以民主党创始人萨奇为总理，由民主党和民主联盟组成的政府。欧安组织驻科索沃使团对这次选举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是成功的，达到了国际标准”。<sup>②</sup>

与此同时，科索沃建立了包括最高法院、地区法院和乡镇法院的三级法院体系。在某些地区，如米特罗维察，任用了国际法官和检察官，在审判权和司法管理方面，也已经建成了一个制度，这为改善科索沃的法治状况奠定了基础。<sup>③</sup>

然而，与《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和《科索沃共和国宪法》中的设计相比，科索沃现行政治体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首先，尽管《宪法框架》和《宪法》都非常关注社群权利保护，但实际上，塞族始终没有完全参与科索沃的政治发展进程。他们在米特罗维察等塞族聚居的科索沃北部地区，维持了所谓的“平行结构”，有自己的学校、诊所、警察和法院，使用塞尔维亚的货币第纳尔。自2003年夏天塞阿两族频发摩擦、终至2004年3月酿成流血冲突以来，“平行结构”进一步加强，塞族开始对科索沃议会选举采取抵制立场。科索沃“独立”后，其南部地区的许多塞族警察和行政人员离职，北部地区的“平行结构”则更为巩固。2008年5月，在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宣布塞尔维亚在科索沃举行地方选举非法的情况下，科索沃塞族仍坚持参加选举，并根据选举结果，建立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省乡镇议会和政府。塞族的实际分离状态，显然使得《宪法框架》和《宪法》所设定的“民主机构”的完善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大打折扣。

其次，尽管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已经确立，但在实际运作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政党光谱很不完全，没有类似西方的中左或中右政党，也没有实现政党间的权力转换，主要阿族政党——民主党、民主联盟等，“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只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元素，其最高目标是实现科索沃的独立”<sup>④</sup>；选举中发生选民名单和选区划分混乱等技术性问题，中央选举委员会也存在人员短缺、能力不足的缺陷；议会没能有效监督法律的执行和政府的工作，议员与选民联系薄弱；行政事务出现政治化倾向；司法公正难以保障，积压案件不断增加，司法机关缺乏基础设施和工作人员，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不力等。

总之，通过《宪法框架》和《宪法》的颁布，科索沃构建了仿照西方式议会制

---

① 2006年1月鲁戈瓦病逝后，塞伊迪乌于2月当选总统。

② OSCE Mission in Kosovo, “Background Report: Human Rights, Ethnic Relations and Democracy in Kosovo (Summer 2007 – Summer 2008)”, [http://www.osce.org/documents/mik/2008/09/32879\\_en.pdf](http://www.osce.org/documents/mik/2008/09/32879_en.pdf).

③ 参见[奥地利]赫尔穆特·克拉默、维德兰·日希奇：《科索沃问题》，第32页。

④ 转引自上书，第56页。

和三权分立，并兼顾社群权利保护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已经在实践中开始运作，但远未完善。

### 三、政治发展的动力与障碍

在科索沃的政治发展中，科索沃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内部环境既提供了动力，也构成了障碍。

联合国托管时，科索沃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权力、包括对司法部门的管理权，都归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由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行使。即便在“独立”后，也由国际民事代表（欧盟特别代表）行使民事领域的最高权力，科索沃当局需与国际民事代表和《科索沃地位解决方案全面提案》授权的其他国际组织合作，执行后者的决定。处于国际组织监管之下的科索沃，其政治发展的动力和障碍首先来自于外部。

国际组织对科索沃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非常显著。第一，在政治权力移交方面，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帮助建立并逐步移权给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联合国特使阿赫蒂萨里，制定了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向欧盟和科索沃当局移交权力的方案，为科索沃“独立”后的权力交接提供了依据。第二，在政治体制构建方面，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汉斯·海克鲁普颁布的《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为科索沃构筑了政治体制框架；欧盟特别代表彼得·费特批准了科索沃宪法草案，为新宪法的通过开辟了道路，从而在延续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对一些具体制度设计作了适应“独立”地位的改变或细化。第三，在政治体制运作方面，联合国授权的欧安组织驻科索沃使团深入“基层”，发挥了重要的咨询、协调和监督作用，有时还直接参与其中，有效保证和促进了政治体制的平稳运行。该使团组织 and 监督了科索沃三次议会和地方选举<sup>①</sup>，负责选民和政党登记<sup>②</sup>、提供与选举有关的培训和教育、发布公开信息等，并帮助组建了科索沃中央和地方选举委员会<sup>③</sup>；监督科索沃议会的工作，特别关注议会的立法进程，仅从2008年4月1日到6月14日，使团就对70次议会委员会会议中的51次实行了监督<sup>④</sup>；促进科索沃政府机构建设，参与地方管

---

① 第一、二次地方选举分别于2000年10月和2002年10月举行，第三次地方选举于2007年11月与议会选举同时举行。

② 2002年4月，政党登记职责由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转给欧安组织驻科索沃使团。

③ 2008年6月《科索沃共和国宪法》生效后，欧安组织驻科索沃使团不再参与选举的管理，而把工作重点放在科索沃中央和地方选举委员会的能力建设上。

④ 参见 OSCE Mission in Kosovo, “Pillar III (OSCE) Report 03/2008: On the Monitoring of the Assembly of Kosovo”, 1 April 2008 – 14 June 2008, [http://www.osce.org/documents/mik/2008/08/32485\\_en.pdf](http://www.osce.org/documents/mik/2008/08/32485_en.pdf).

理改革，对地方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分析、报告，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补救建议；帮助科索沃建立司法体系，监督其运作，支持科索沃法学院对法官和检察官的培训，建立警察学校；帮助科索沃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增加其对选民的代表性；监控科索沃的人权状况，保护和促进人权，尤其重视保护少数民族、以及妇女、残疾人等传统弱势群体的权利。

处于监管地位的国际组织，在推动科索沃政治发展的同时，也因自身条件的限制，阻碍着这一进程。托管时期的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面对的是在一个民族尖锐对立的社会建立议会民主制、实现民族和解的艰巨任务，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投入，而这恰恰是它所欠缺的。首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上任后不久就不得不四处寻求资助，以解决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的财政困难。该使团也缺少了解科索沃实际、具有处理科索沃问题经验的人员，“能期待连街上的广告牌都看不懂的国际管理机构成员做什么呢？”<sup>①</sup> 欧安组织驻科索沃使团，虽然因为较长时间以来在波斯尼亚和马其顿执行任务，培养了一批具有巴尔干事务经验的人员，此外还聘用了大批有经验的退休外交官，但其人员在面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支柱III框架内的全新任务时，仍感到力不从心。<sup>②</sup> 科索沃“独立”后，准备进驻科索沃接替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的欧盟法律使团，虽然得到了除塞浦路斯外的26个成员国的认可，但在欧盟内部对科索沃“独立”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其帮助科索沃建设警察和司法部门的工作，仍面临很大压力。实际上，对科索沃实行监管的国际组织至高无上的地位本身，就“大大限制了科索沃政治负责人有效行动的空间”<sup>③</sup>，国际组织与科索沃当地机构并存的双重权力结构，以及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的移权行为，也易于导致权力重叠和职责不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联合国与欧盟的权力交接困难重重，科索沃的权力结构更为混乱。所有这一切，都不利于科索沃的政治发展。

其次，科索沃的政治发展，是在塞阿两族针锋相对的内部环境中进行的。一方面，阿族对独立的强烈渴望，使其为实现独立目标而接受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的制度安排。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为科索沃的发展制定了尊重法律、加强民主机构建设、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等标准，作为开启科索沃最终地位谈判的条件。阿族为早日赢得科索沃独立，就必须按照这些标准行事。2005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同意启动科索沃最终地位谈判，正是基于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凯·埃德在

---

① Brad K.Blitz (ed.) , *War and Change in the Balkans, Nationalism,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75.

② 参见[奥地利]赫尔穆特·克拉默、维德兰·日希奇：《科索沃问题》，第242页。

③ 同上书，第92页。

对科索沃执行标准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的建议，尽管他认为标准的执行情况参差不齐。但另一方面，阿族对独立的强烈渴望，也使其将标准的执行仅仅当作实现独立的手段。独立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主题，阿族主要政党都是围绕这一主题组建并活动的。甚至政党对独立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它的选举成绩。民主联盟逐步失去议会多数，让位于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科索沃独立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立场。在这种情势下，很难形成与西方相似的中左或中右政党和政党间的权力转换，更难以形成有利于保护社群利益的和解与宽容的气氛。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严重的民族矛盾阻碍着政治发展。阿族与塞族的尖锐对立，以及与此相伴的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得权力移交困难重重；塞族对科索沃独立的抵制和塞族“平行结构”的存在，使得达成民族和解、确立真正保护社群权利的政治体制，显得遥遥无期；塞阿两族的长期对立，还强化了极端民族主义观念和用暴力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不利于形成认同议会制和三权分立、保护社群权利的政治文化。除此之外，以家庭和父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对现有政治体制的运作缺乏认知和经验，脆弱的经济基础和糟糕的经济状况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科索沃的政治发展。

综上所述，科索沃的政治发展是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以极其特殊的方式推进的。国际机构的强力控制与内部民族的深刻矛盾同时存在，联合国的托管、移权与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运作同时进行，其发展取决于、并且仍将取决于世界主要大国对科索沃地位问题的态度，取决于联合国、欧安组织和欧盟等国际机构的作用，以及科索沃自身巩固议会制和三权分立、促进民族和解的意愿和能力。显然，科索沃要想最终建成其《宪法》中所宣称的“独立、主权、民主、唯一和不可分割的国家”，“基于分权与制衡原则的民主共和国”，恐怕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 附 录

### 2001 年以来科索沃历任总统和总理

总 统	任 职 时 间	总 理	任 职 时 间
奈斯赫特·达奇 (议会主席代理)	2001 年 12 月—2002 年 3 月	巴伊拉姆·雷杰皮	2002 年 3 月—2004 年 12 月
易卜拉欣·鲁戈瓦	2002 年 3 月—2004 年 12 月	拉穆什·哈拉迪纳伊	2004 年 12 月—2005 年 3 月
易卜拉欣·鲁戈瓦	2004 年 12 月—2006 年 1 月	巴伊拉姆·科苏米	2005 年 3 月—2006 年 3 月
法特米尔·塞伊迪乌	2006 年 2 月—2008 年 1 月	阿克姆·切库	2006 年 3 月—2008 年 1 月
法特米尔·塞伊迪乌	2008 年 1 月—	哈希姆·萨奇	2008 年 1 月—

### 2001 年以来科索沃议会选举结果

2001 年		2004 年		2007 年	
政 党	议席	政 党	议席	政 党	议席
科索沃民主联 (LDK)	47	科索沃民主联盟 (LDK)	41	科索沃民主党 (PDK)	35



科索沃民主党 (PDK)	26	科索沃民主党 (PDK)	30	科索沃民主联盟 (LDK)	25
回返联盟 (KP)	22	科索沃未来联盟 (AAK)	9	新科索沃同盟 (AKR)	13
科索沃未来联盟 (AAK)	7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名单 (SLKM)	8	达达尼亚民主联盟 (LDD)	11
波斯尼亚穆斯林党 (VTN)	4	改革者党 (ORA)	7	科索沃未来联盟 (AAK)	10
科索沃土耳其民主党 (KDTP)	3	达达尼亚民主联盟 (LDD)	6	独立自由党 (SLS)	5
科索沃阿希卡利阿尔巴尼亚民主党 (PDASHK)	2	科索沃土耳其民主党 (KDTP)	3	科索沃阿希卡利民主党 (PDAK)	3
科索沃新民主倡议党 (IRDK)	2	科索沃波什尼亚克民主倡议党 (VAKAT)	3	科索沃土耳其民主党 (KDTP)	3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基督教—民主党 (PShDK)	1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基督教—民主党 (PShDK)	2	科索沃波什尼亚克民主倡议党 (VAKAT)	3
科索沃自由民族运动 (LKCK)	1	塞尔维亚公民倡议党 (GIS)	2	民主行动党 (SDA)	2
科索沃民主波什尼亚克行动党 (BSDAK)	1	科索沃新民主倡议党 (IRDK)	2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民主塞尔维亚党 (SDSKIM)	2
公正党 (PD)	1	科索沃阿希卡利民主党 (PDAK)	1	科索沃民主选择 (ADK)	1
科索沃人民运动 (LPK)	1	民主行动党 (SDA)	1	斯拉夫族穆斯林公民倡议党 (GIG)	1
阿尔巴尼亚民族统一党 (UNIKOMB)	1	斯拉夫族穆斯林公民倡议党 (GIG)	1	新民主党 (ND)	1
科索沃统一罗姆人党 (PREBK)	1	科索沃自由党 (PLK)	1	科索沃新民主倡议党 (IRDK)	1
		公正党 (PD)	1	科索沃人民运动 (LPK)	1
		科索沃人民运动 (LPK)	1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尔维亚党 (SKMS)	1
		科索沃统一罗姆人党 (PREBK)	1	塞尔维亚人口党 (SNS)	1
				科索沃统一罗姆人党 (PREBK)	1

资料来源：科索沃议会网站，<http://www.kuvendikosoves.org/>

**【Abstract】** Kosovo'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running at two levels, first is in the ownership of political powers through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uthorities in Kosovo; second is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build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parliamentary system and the system model of powers separation and focusing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munity rights. During the two-tier development, Kosovo's unique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 not only provides driving forces but also constitutes obstacles.

**【Key Words】** Kosovo, Political Development, Mandate, Independence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осо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попечитель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历史·文化

## 俄罗斯问题的西方表述 ——关于欧美俄苏研究导论

林精华\*

**【内容提要】**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政治领域，俄罗斯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之所以如此，远不只是俄国本身的文明结构之复杂性所致，更有西方的独特表述之原因。影响西方对俄罗斯问题表述的，是因为西方自身的欧洲中心论、欧美所建构的“西方”概念及其在国际和俄国所产生的反应、对俄罗斯问题进行斯拉夫-俄国-苏联学研究等，这些原因从不同方面促成了西方对俄罗斯问题的认知和判断远不同于俄国，既时有谬误，又始终有着主体意识、独特发现。

**【关键词】** 俄苏研究 苏联学 “西方”概念

**【中图分类号】** D73/77.512.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2-0097-(27)

### 导 言

在已经逝去的20世纪历史中，中国、东欧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深受俄国和苏俄社会思潮的影响，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经由各国知识界甚至政界的积极认可、热情倡导、制度性推行等，外加苏俄利用国际反资本主义浪潮、自身国力优势及其所建构的反西方话语权，苏俄对这些国家产生了神奇的作用力，以至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从建构社会理念、确立政治体制框架，到教育和学术制度的建立、卫生事业各项具体措施的拟订、社会管理部门的设置等等，大多是参照苏俄而来的。“苏

\* 林精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和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

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时几乎成了许多国家及其人民的普遍认知。正是这种深刻影响，给这些国家 1990 年代以来的改革预设了许多障碍，诸如中国艰难破除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习惯、问题多多且复杂的“民主”和“人民”之类关键性概念等，无不是与来自苏俄的深刻影响息息相关。但这种直接来自苏俄的影响，只是事情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所兴起的俄国文学热，包括 1917—1922 年间商务印书馆、泰东书局和北新书局陆续推出的《近代俄国小说集》5 集、《俄国戏剧集》10 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等，多是借助西文译本而再度翻译，且这些选篇和译文确立了中国后来接受 19 世纪俄国文学的基本框架。

在日趋左倾的 1920 年代中后期—1940 年代，越来越趋向于接受“进步的”苏俄文学、否定俄国贵族作家及其文学之际，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n Rolland）所著的《托尔斯泰传》这部盛赞这位俄国大贵族作家思想和艺术的伟大之作，却深得中国普通读者人心——1933 年 6 月上海华通书局推出了徐懋庸的译本，这是译自法文本并参照日文本的译本，其序文曰，“读了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我们首先感到的是，此乃对于伟大的艺术家的托尔斯泰，伟大的真理的探求家的托尔斯泰的赞歌。然而，这决不是盲目的赞歌，更不是偶像崇拜。这是基于透彻的洞察，深刻的理解，燃烧的同情而成的赞歌。而且，在这赞歌中，生命之力和热，强大地跃动着。罗曼·罗兰其人的全生命，与托尔斯泰的全心全体化合着。仅说这是热情之表白，是不够的。解作思想之表白，也是不完全的。可以说，这是热和想的神秘不可思议的融合和一致。一言以蔽之，是热想的表现……”。

两年后（1935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傅雷依据法文的重译本，以华丽晓畅的译文，在中国知识界扩展了这位作家的声望（称《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是伟大的“心灵之作”，盛赞托翁如何正确处理了文学艺术同科学和宗教之关系问题，认为《忏悔录》显示出作家是人类的良心等），特别是开篇前言生动地诉说了托尔斯泰在西方的影响力及作者对其的深刻领悟：“俄罗斯伟大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火焰，对于我的这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的最精纯的光彩。在 19 世纪终了时的阴霾重重的黄昏，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的心魂。在法国，多少人认为托尔斯泰不只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在整个欧洲艺术中唯一的真正的友人。既然我亦是其中的一员，我愿意对这神圣的回忆，表示我的感激与敬爱。我懂得认识托尔斯泰的日子，在我的精神上将永不会磨灭”，强调“我们绝不像今日的批评家般所说‘有两个托尔斯泰，一是转变以前的，一是转变以后的；一是好的，一是不好的’。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的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场，一

切都有关联”<sup>①</sup>。

这种经由西方中介而认识俄国，在俄语人才欠缺的 1930 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几乎是最重要的通道，而且的确帮助了中国深入认识俄国文学和俄罗斯问题。在后来俄语成为重要外语的年代，反而没有出现过这种经由西文而来的深刻感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借助西文材料研究俄国文学的重要篇什，如田汉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1919）、现代作家和文学翻译家汪倜然的《俄国文学 ABC》（1928）等，至今仍堪称中国人在理解俄国文学方面不可多得的力作；巴金和周扬等人 1930 年代经由西文挑选出并亲自翻译出的屠格涅夫（Иван Тургенев）的《父与子》（1943）和《处女地》（1943）等、托尔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的《安娜·卡列尼娜》（1944）等，迄今仍是汉译经典。

又何止是那个时候对俄国文化的发现少不了西方的中介，同样，译介巴赫金（Михаил Бахтин）及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并非肇始于治俄文学者对苏俄文献的发现，而是钱钟书最先从欧美学者的学术成果中敏锐捕捉到的，然后提议钱中文介绍过来，后者又推荐北京外国语大学白春仁和顾亚铃两位俄语专家去翻译，时间是在 1980 年代初。不仅如此，中国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发现和接受，始于 1988—1992 年间出版的汉译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文学理论导论》（1983）、佛克马（Douwe Fokkema）和易布斯（Elrud Ibsch）《二十世纪文学理论》（1977）、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述评》（1972）等所提供的有关内容，以及法国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选编的《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1965）所提供的文本。还有，19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多地是借助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原典，而不再是苏俄编纂和理解的马列主义。也就是说，1930 年代之后，中国虽有了大批俄国语言和文学的专业人才，却少了在判断俄国文本时的中国主体意识，而服膺于苏俄的主流声音，未能发现更有恒久价值的俄语文献。这种情况，始终未能完全改观，甚至在俄语人才济济的当代，许多俄国文化精品仍未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用来理解和应付现代性问题的思想资源、19-20 世纪之交俄国白银时代文学艺术及其意义的重新发现等，首先也不是直接受惠于苏俄，更不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俄国文学热中查找出来的，而是得益于西方斯拉夫学研究的成果。

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些今天看来更能体现俄国思想史价值的那部分俄国文化，中国更多的是经由西方的中介才发现的？是否西方比中国更大规模地接受俄国文

---

<sup>①</sup> [法]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上册），傅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24 年，第 1-2 页。该译本还附录有《托尔斯泰遗著论》和《亚洲对托尔斯泰回响》等四篇。

化，从而必然地补救了我们所错失的那部分更有价值的俄国文化呢？或者说，俄国文化很有辐射力，既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巨大影响，也对现代西方文化的生成和变革产生重大作用？若真是如此，西方何以能不被俄国文化同化？若不是这样，西方又何以能发掘更重要的俄国文化现象？

—

实际上，冷静清点西方文化资产，深入洞察西方思想史，就会惊奇地发现：俄国对西方文化的生成和变革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哪怕西方某些思潮或理论接受过俄国的影响，通过知识考古学工作能有所还原，但经过全球知识界自觉地借用西方对俄国文化的界定或诠释，已很难改变这种思潮或理论的西方身份。如巴赫金就成了讨论普遍问题的理论家，其俄国思想家的身份日趋模糊。甚至因为西方理论的强势而掩盖了俄国早已有之的深刻论述，如英国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没落》（1918）和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等先后提出世界文明类型及其彼此关系的问题，成为全球学界和政治家们认识国际秩序的理论根据。殊不知，俄国思想家丹尼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Данилевский）的历史哲学著作《俄国与欧洲》（1869）已根据语言和民族精神的成熟度，提出了人类文明分为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朗文明、犹太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新闪米特文明或阿拉伯文明、罗马—德国文明或欧洲文明、包括亚述—巴比伦—腓尼基等在内的古闪米特文明等不同类型，并主张每种类型的历史文明或多或少会受到此前的或同时代其他文明的影响，历史文明类型发展过程总有自己的初始、兴盛和衰亡之周期，其中的东方问题不是欧洲与亚洲之争，而诺曼—日耳曼和希腊—斯拉夫作为罗马文明后裔和希腊文明后裔，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sup>①</sup>。造成这种情形远不是因西方文化历史远比俄国悠久所能解释的！在俄国看来，现代西方文明直接受益于以拉丁语言为表达手段的古罗马文化，而俄国文明是以古希腊文化为源流的（古罗斯是经拜占庭接受基督教和古希腊文明，而不是从西欧接受天主教和在古罗马文化基础上延续下来的西方文化，如俄语的西里尔字母源于脱胎自希腊字母的格拉哥里字母，是由东正教传教士圣西里尔在9世纪为方便在斯拉夫民族传播东正教所创立的），因而俄国主流声音倾向于俄罗斯文明比现代西方文明更为正宗。用俄国文化受基督教滋润时间较晚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公元988年从拜占庭接受东方基督教以来，在相当程度上挽救了东正教日趋衰

<sup>①</sup> Н.Даниле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СПб., 1995, С.77-78.

落的命运，而且远比美洲人和日本人接受基督教要早得多。至于说到制度原因阻止了俄国文化和西方融合，那更是管窥蠡测，如俄国和国际上许多人天真地以为，苏俄放弃社会主义以后，就能与西方和谐相处，融入西方所建构的“文明世界”，而后苏联虽如此并极力推行市场经济，却未缓和同西方的矛盾。诸如此类的情形汇集在一起就让人更疑惑了：既然俄国文化自有其优越性，而作为社会制度性的障碍消除了，那么西方与俄国何以还矛盾重重？是因俄国自身的因素，还是由于西方原因，导致西方对俄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拒绝呢？如此疑问是捕风捉影，还是意识形态所致，抑或其他因素让人产生的误解？

可以说，俄国之于西方的这些复杂情形并非虚构出来的。姑且不论西方不仅仅是从制度上排斥俄国的经验和理论，以在俄国和西方都很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为例，我们就能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西方无论是民间学术行为还是国家制度性行动，无不试图抵抗性地对待苏俄马克思主义，很少借鉴苏联共产主义思想去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在法国著名学者让-皮埃尔·韦尔南的（Jean-Pierre Vernant）《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者》（1984）中有生动的表述：“我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深，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跳入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差不多快有半个多世纪了。我说的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被修正了和被篡改了的、有时候甚至被肢解了的那种教理，因为有人确实把它弄得面目全非，先是用来证实某种政治实践的合理，随后为一种官僚国家和集权政府的制度作依据。在我看来，前者如同一种批评的方法论，要想正确地提出历史的问题，它是必不可少的；而后者像是一种宗教替代物，为它的忠实信徒带来确信和现成的回答，使他们用不着再向自己提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在这两者之间，差别大得兴许就像神话与理性”<sup>①</sup>。

很有意味的是，这不是由冷战制造出来的差别，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就已经出现了。如纪德（Charles Gide）这位法国著名左翼作家，在西方普遍反对苏联时曾发文支持苏联，盛赞苏俄对国际反资本主义浪潮的积极贡献，但访苏归国后所发表的不是歌颂苏联的文字，而是揭示国际社会鲜为人知的苏联阴暗面的《从苏联归来》（1937）。他坦言，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当多数人的信念和自己的信念成了问题时，尤其需要诚实。倘若当初是我错了，那么最好的事情便是赶快承认我的错误；因为在这里，我对于那些受这错误所牵引的人，是负有责任的。在这事情里头，顾不到所谓自我尊严，而且我本也很少所谓‘自我尊严’。在我的眼睛看来，

---

①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9页。

这里头有些事情比我自身还更重要：这就是人类，它的命运，它的文化”<sup>①</sup>。因而，冷战趋于结束时，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安东尼·布鲁厄（Anthony Brewer）继续坚持这样的主张也就自然而然了：“我不愿意讨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它们机械地照搬照抄列宁，就所涉及的帝国主义问题而言，它们往往吸收了列宁著作中更不充分的方面，强调资本主义‘过度成熟’和消费不足论，并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它”<sup>②</sup>。

与之相反的是，经由法兰克福学派和英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阐释，一方面让世界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真理及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活力，另一方面更使读者理解到苏俄把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后所带来的僵化。这些连同苏联解体的后果，让我们大惑不解：是西方人更有智慧而能抵抗俄国价值观的入侵，还是西方根本不关心俄国文化而意外地避免了俄国的负面影响，抑或西方对俄国文化有某种天然的警觉？

这类问题还不仅仅是现实性的疑惑，更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学术性难题：忽视甚至否定俄国的现象，广泛存在于西方文化的很多领域，尤其是人文学科各领域皆有强烈反映，这种否定性对待俄国文化的现象，反而吻合了西方的现代性诉求。仔细辨析黑格尔（Georg Hegel）《哲学演讲录》、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汤因比（Arnold Toynbee）《历史研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经典文献，我们可发现，随着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的扩展，“文明”和“进步”观念亦确立起来，由此催生了欧洲文明中心论，继而出现了不同文明存在着“进步”与否和质量的优劣、高下和先进与落后之别的所谓现代性理念，从而改变了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只有形态和内涵上的区分这样的事实。于是，立足于西方建构的现代性概念基础上的种种价值判断，时常把符合该概念的欧美历史视为正常，而认为古罗斯—帝国俄罗斯等民族（国家）则是需要现代化的，哪怕包括俄国在内的其他非西方民族各有其自己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历程。而且，涉及到罗斯—俄罗斯帝国的现代性问题，远比这种单纯的否定还要复杂得多：自18世纪后期俄国逐渐崛起以后，尤其是1812年战胜拿破仑而跻身为欧亚军事强国行列以来，西方实际上是不断关注俄国的。从此也改变了15世纪以来西方在寻找异域世界时却忽视自己这位神秘邻居的局面。随着19世纪帝俄持续向外扩张，1861年以后和1905年以后两次试图以国家形式推进俄国西化的改革，1917年后建立一个与西方对抗的苏维埃国家等，西方对俄国的关注日甚一日，尤其是冷战时期，欧美更加紧了对俄国的进行全

---

① [法]安德列·纪德：《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郑超麟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② 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136.

方位研究，包括俄语和俄国文学艺术之在内的斯拉夫研究特别兴盛，许多大学对苏联东欧研究的兴趣高涨，政府对这方面研究的财政投入剧增。在后苏联，虽不再有当年斯拉夫研究的壮观，但对俄国问题研究的重视仍在延续，一系列学术规划甚至能和其他强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媲美，许多研究者的成果常令俄国本土研究者钦佩，并促使后苏联大量引进西方斯拉夫学著作。

奇特的是，这样的“热情”关注并没有模糊研究者的视野，更没有淡化西方研究的主体意识。如此反差，是否是因为西方更多的是出于外交利益、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一种文化需求而关心俄国呢？假如真是如此，又为何会出现上面提到的中国社会对俄国的认识需要借助西方俄罗斯学来补救的情形？查考西方文化结构及其变迁，我们发现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中的确少有来自俄国文化的正面影响，西方所建构的几乎所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从 1848—1890 年间流行的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政治经济学原理》到 1890—1930 年代末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经济学原理》、战后开始行销而至今仍然具有影响力的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经济学》，甚至包括马克思《资本论》之类的经典经济学文献、以及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几乎看不到来自俄国这几个世纪来以政府权威力量强劲推进经济发展的正面经验。而在这样的视野下研究俄国的经济问题，无论是艾尔曼（M. Ellman）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问题》（《牛津经济论文集》总第 30 集/1978 年），还是桑顿（J. Thornton）的《苏联体系的经济学分析》（《比较经济学》1978 年第 1 期），抑或霍尔泽曼（F. Holzman）的《共产主义之下的国际贸易：政治与经济》（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76 年）等等，不管它们讨论苏俄经济问题的政治立场如何，无不是把苏俄经济描述为一种地方经济现象，并否定其意义，尽管 1970 年代西方经济已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困境。同样，自问世以后一直为人所称道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存在与时间》和萨特（Jean Sartre）《存在与虚无》等经典文献，是深入探讨人之存在的可能性及意义的杰作，而这正是俄国思想家和文学家所孜孜以求并探讨得很有成效的论题。他们在许多地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列夫·托尔斯泰、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ёв）等思想一脉相承或有相通之处，可是这类著作却少有俄国的踪影。何止是西方的经济学和哲学如此，法学和语言学、政治学和史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即便是捷克裔美籍学人韦勒克（Rene Wellek）《文学理论》和《近代文学批评史》等经典文献多有涉及俄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案例，但在整个体系中俄国经验是微弱的，且是一种地方性经验，评价也不很高，以至于各国学者在运用结构主义理论时，也遗忘了它源于俄国形式主义。

于是，新问题又来了：基于实际层面问题，西方便会积极关心俄国，而基于对



知识的兴趣和审美的需要，西方也愿意领略俄国文学艺术并关心俄国学术进展，但对普遍的精神建构和理论探讨，却显示不出西方积极接受俄国文化的意愿。这究竟是因为俄罗斯文明结构出了什么问题，不存有一个实在、可描述、可真切感受到的俄罗斯，因其令人不可捉摸而被西方无可奈何地拒绝？还是西方作为认识主体本身出了什么故障，有意或无意地拒绝了俄国？或者说，是因为俄国文化中存有何种特质让西方人无从接受，还是因为西方现代性患了什么病症，对来自俄国文化的辐射有过敏反应，以至于在内在肌理上对俄国有抗拒性的条件反射？

## 二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来自俄国自身的原因是不可忽视的，但西方因素同样很重要。

按哈佛大学著名法学教授伯尔曼（Harold Berman）在《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1983）中所说，“西方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和一种文明，不仅区别于东方，而且区别于在‘文艺复兴’时期曾经‘恢复’过的前西方文化……由此，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莱典籍并会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讶的方式对它们进行改造的西欧诸民族。当然，西方信奉伊斯兰教的部分不属于西方——尽管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曾受到过阿拉伯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与上述典籍研究有关的时期……”，而“有关的时期”指的是 11-12 世纪，当时英格兰、法兰克、日耳曼、西西里等地区的居民，在与罗马天主教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王室的、城市的世俗法律体系。由此开始，信奉东正教的古俄罗斯和希腊这类国家，和作为穆斯林领地的西班牙地区一样，被排除在“西方”概念之外。“西方”与“现代”这两个概念也因此有了密切关系，即“在西方，现代（modern era）概念源于 1050-1150 年这个时期，而不是此前的某个时期，这不仅包括现代的国家、教会、哲学、大学制度、文学等，还涉及其他现代事物”<sup>①</sup>。这种不是纯粹根据地理而是特别看重文明属性的“西方”概念，并非伯尔曼教授个人之言，而是欧美知识界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从启蒙运动的孟德斯鸠和狄德罗等人以来，经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到汤因比、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亨廷顿等都是如此。无论西方内部如何分化（诸如一战和二战期间盟国与德国意大利的分裂、2003 年美英对伊拉克的战争所引发的“老欧洲”与“新欧洲”的分裂、经济

---

<sup>①</sup>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第 3、4 页。

全球化时代导致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的分庭抗礼），但面对非西方地区，立即就有是否有拉丁文化和基督教信念（尤其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条件反射。

早在 20 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就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具体而生动地表达了西方社会面对非西方世界的优越感。韦伯津津乐道西方文明中显露出的一些杰出的文化现象——诞生超出个人经验的现代科学、产生具有系统严密思想和理性依据的历史学与法学、生成具有普遍审美价值的各种现代艺术、孕育出合乎理性的建筑（能解决宏伟建筑的压力和结构问题）、锻造出现代国家及其社会管理制度，尤其是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中产阶级、改造了宗教伦理使之符合人类整体进步趋势等，并把这些成就之取得，归因于生物遗传<sup>①</sup>。稍晚（1910 年 6 月 13 日），英国保守党领袖贝尔福（A. Balfour）在英国众议院发表演讲《我们在埃及所面临的急迫问题》时声称，埃及文明虽然比西方文明的历史悠久，但是西方人更为了解埃及，“我们之所以在埃及，不仅是为埃及人着想，尽管我们一直是在为埃及人考虑，我们在埃及也是为整个欧洲人着想”，“西方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具有自我治理的能力……我们看看那些经常被人们宽泛地称作‘东方’的民族整个历史，却根本找不到自我治理的痕迹……在所有那些与其命运生死攸关的革命中，我们从来未发现哪个民族曾确立过我们西方人所说的那种自治”；与此同时，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克罗默（Evelyn Cromer）在其煌煌两卷本《现代埃及》（modern Egypt, 1908）中，则用感性和写真的方式表达了类似观念——作为一个集合体的西方人感受到作为东方一个部分的中东/北非是多么需要现代文明，以及现代文明在这个地区遭遇到了多么大的东方传统（缺乏文明）的抵抗<sup>②</sup>。

这种面对非西方世界就自动产生整体的西方反应的理念，没有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而终止，仅仅是有所缓解而已，如刚刚结束共同抵抗法西斯的战争时，美国著名哲学家诺斯罗普（Filmer Northrop）在《东方和西方相遇：对理解世界的探究》（1946）一书中就描述欧美人如何重视从文化上把世界划分为东方与西方，而俄国不属于西方。这种描述从字里行间透出，比 18 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按经济富裕程度划分世界为现代而发达的国家和传统而不发达或发展中的国家更能迷人<sup>③</sup>。

冷战结束后不久，按亨廷顿的说法，“在 400 多年里，西方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方民族也扩张、

①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第 4-19 页。

②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37-48 页。

③ S. Northrop,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An Inquiry Concerning World Understand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46.

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之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上的国际组织，如欧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更成功”，1945年来划分欧洲的界线向东移了几百英里，“现在它是一条一方面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离于穆斯林，另一方面把它分离于东正教的界线”，“西方在某种层面上是一个实体。非西方国家除了它们都是非西方的之外，还有什么共同性吗？”，“那些具有西方基督教遗产的国家正在取得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东正教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前景尚不明朗；而各穆斯林共和国的前景则很黯淡”，“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 and 文化的相互作用……国际权力正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转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之路”，从文明角度看，“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而言之，世界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有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sup>①</sup>。这种看法，在全球化的今天同样深入人心，如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格林菲尔德（Lian Greenfeld）就在《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2001）中声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1500年之前的一段时间，“诺夫哥罗德和基辅以西的欧洲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在运作的，并成为由中国人、穆斯林和意大利人所织就的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的一部分，把欧洲大陆与亚非连接起来”，“经济全球化在西欧开始与宗教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基督教公国的解体不谋而合，而此前尽管居民使用的语言千差万别，但基督教通过把西欧结成为同一个思想空间，使欧洲大致成为一种文明”<sup>②</sup>。更有甚者，要把这种统一的欧洲概念付诸实施，如哈贝马斯提出要建立统一的欧洲宪法，就得到了欧洲社会的积极响应，而且不断得到欧盟一些国家支持。可是，无论哪种“西方文明”概念，很少考虑把俄国纳入其中，甚至要把俄国排除之外。

也正因为这样的“西方”概念及其催生出的现代性潮流，延伸出非西方=“落后”的认知，以至于西方人远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就以这样的“文明”姿态对待（俄）罗斯。在一系列（俄）罗斯旅行记中流露出如此端倪——俄被描述为一个特殊的、另类的世界，即使罗斯追求现代文明而成为俄罗斯帝国，西方仍然很少改变这样的描述。在

---

①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5-9、18页。

② [美]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80、90页。

法国，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的《风俗论》（1765）堪称是欧洲人第一部打破西方地域限制的文化史巨著，它生动地描述了16世纪中叶—17世纪中叶俄国所发生的五次真/伪皇太子季米特里的荒唐事件——皇宫时常发生皇位易手、皇太后或皇后却承认真/伪皇太子是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他认为这类事件是不会发生在文明国家的，而在彼得大帝之前不为欧洲所知的俄国，不仅出现这样的事，还把文明国家所诟病的各种弊病视为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现象，尽管欧洲各国的皇宫里也发生着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事件。进而伏尔泰就盛赞追逐西方文明的彼得大帝出游西方的举措。<sup>①</sup>后来被俄国人尊敬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波兰受到来自邻居俄国的威胁时，却著文《论波兰政府》（*Consideration sur Gouvernement de Pologne*, 1772）提出如何动员民族主义资源抵抗俄国的建议：“你们不知道怎样阻止俄人的吞并。至少整理你们的民族，使他们不能同化你们。你们国民的美德、爱国热诚、民族制度所能给你们的特殊精神，这些是永远能护卫你们的特有壁垒，这些是没有军队能攻得下的壁垒”。和俄国关系并不很复杂的西班牙人也把俄国视为野蛮之地，如《约翰·高特里·弗克罗特和奥托·普里亚笔下的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莱比锡1872年德文版）称就这样评价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教习、当时的政府要员戈里岑（Б.Голицн）公爵：“他若生长在不野蛮的国度，肯定就会是一位真正的伟人”。而俄国人所崇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的否定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如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就曾经这样说：“既然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整个发展没有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那么德国人能参与现代问题的程度顶多也只能像俄国人那样”（《马克思选集》第1卷第6页）——“俄国”，在马克思那儿成了落后的代名词。恩格斯的《〈论俄国社会问题〉的一书导言》（1875）从社会史角度强烈否定俄国：“四千万大俄罗斯族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族，而且经过了很独特的发展道路，以至于不能从外面把一种运动强加给他们……俄国人民的主体——农民，千百年来在脱离历史发展的泥潭中世世代代愚昧地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他甚至进一步认为，“西欧的任何革命，只要在近旁还存在着这个俄罗斯国家，就不能获得彻底胜利。而德国却是俄国最近的邻国，因此俄国反动派军队的第一个冲击便会落到德国身上”<sup>②</sup>，尽管事实上后来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远不是俄国干预的结果。此后，恩格斯在《法国和德国农民问题》（1894）中论及资本主义侵袭农村所带来的问题时又说道，“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与世隔绝的生活状况所带来的冷漠态度。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

① [法]伏尔泰：《风俗论》（下），谢茂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67-4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25卷，第35-36页。

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支柱”<sup>①</sup>，尽管俄国社会学家和史学家恩·弗列罗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Берви-Флеровский）《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已描述，改革后俄国许多农民热心于资本主义经济；而后来的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意义》也更深刻地论述过俄国农民拒绝革命不只是因为专制政治本身，而是由于东正教信仰、斯拉夫村社、俄罗斯农业经济等传统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传统文化。

实际上，因为“西方”观念及俄国不属于其中的判断，使得西方用理性主义眼光重新审视俄国时，不单认为其政治上另类，而且其文化构成也与现代西方不相容，俄国乃不可理喻的非西方国度。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上卷 1835 年）虽然承认俄国和美国将是世界上两个大国，却这样对比道：“正当美国人在同大自然的束缚进行搏斗时，俄国人却在同世界上别的人种厮杀……美国用铁镐征服世界，而俄国则用剑戟征服世界。为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美国总是根据本身的利益得失而开辟发挥个人聪明才智的自由途径；俄国人则把社会的一切力量集中于某一个人。美国人把自由作为行动的基本手段，俄国人则以征服作为行动的根本准则。两者出发点不同，道路各异，尽管看起来都在上帝意志的驱使下，为今后能够掌握半个世界的命运而奔波”。如此负面塑造的俄国形象，在后来一系列专门文献中得到了强化，包括奎斯汀（Astolif de Qstin）《1839 年的俄罗斯》（1856）、莱瑞—鲍利耶（Lerua—Bolie）两卷本《沙皇与俄国人》（1881-89）、格雷姆（Stiven Grehem）《不为人所知的俄罗斯》（1912）和《正在变革的俄国》（1913）及《俄国与世界》（1915）、白令（Moris Bering）《俄罗斯的主要起源》（1914）、雷特（R.Rait）《俄国人》（1914）、佩西（Bernad Perc）《俄罗斯》（1915）等，皆立足于“西方”观念而否定性地描写俄国。例如，《1839 年的俄罗斯》从启蒙主义立场看俄国，描绘了俄国专制主义的恐怖情状，并在描述中显示出俄国人与上帝之间订有某种奇特的协议，即民众愿意被国家奴役是为了国家能够去奴役世界上其他民族。虽然启蒙和理性不断受到质疑，“西方”观念也受到挑战，西方人描述俄国却未因此就尝试去西方化：1902 年英国新闻记者诺曼（Henry Norman）所写的《全部的俄国：在当代欧洲地区的俄罗斯、芬兰和西伯利亚、高加索、中亚的旅行与研究》，津津乐道于俄国文化在空间上如何分裂、互不认同的种种情景。与俄国人打交道甚多的英国人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感叹说，俄罗斯乃“裹着神秘面纱的谜中之谜”（Russia is a riddle wrapped in a mystery inside an enigma），是一个无法认识的民族（国家）。英国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普通读者·俄国人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4 卷，第 295 页。

观点》(1932)仍延续西方的传统而声称,“既然我们经常怀疑,和我们有如此之多共同性的法国人或美国人,是否能理解英国文学,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更加怀疑英国人是否能理解俄国文学,尽管我们对它满怀热情”,在结尾又写道,“我们(英国人)的思想,在它诞生之处,就具有了它的偏见,毫无疑问,当它涉及俄国文学这样一种异己的文学,必定离开事实真相甚远”<sup>①</sup>。而出生在波兰的英国著名小说家康纳德(Joseph Conrad),其《在西方视野下》(Under Western Eyes, 1911)涉及俄国、欧洲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但其所塑造的俄国大学生拉祖莫夫的形象,却强烈地显示出“西方”理念是如何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对俄国的理解<sup>②</sup>。

这种情形在红色三十年并未改观:1930年代以后大批西方进步人士满怀兴致去苏联访问,虽然西方刚刚经历了1929年经济危机,但“西方”观念却强化了欧美意识形态。从苏联归来后他们普遍发表措词严厉的旅行记,诸如费特拉昂格尔(L. Feihrangel)的《1937年的莫斯科》、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莫斯科纪实/日记》、A.纪德的《从苏联归来》(1937)等,它们的问世吻合了西方社会对苏俄的非西方想象。要从文化上重新“启蒙”苏俄的设想在二战之前达到了高峰。也就是说,在西方所塑造的不同俄国形象中,始终贯穿着批判和否定苏俄的诉求。

有意思的是,欧洲所建构的西方观念,在俄国本土引起了强烈的回应。有些是赞成的呼应,典型者如著名思想家恰达耶夫(Пётр Чаадаев)的《哲学书简》(1836)就声称,“欧洲各民族有共同的面孔,有着某种家族相似”,俄国只有在宗教、精神、文化上追求与欧洲统一,才能摆脱狭隘、孤立、落后的状况,“我们越是努力与欧洲社会融为一体,这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越好”。他还在《疯子一辩》(1837)中继续强调西方概念之于俄国的重要性。尽管此论给恰达耶夫本人带来了厄运,但却切切实实地促使后来俄国知识界的自觉分化。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Белинский)、屠格涅夫和格拉诺夫斯基(Тимофей Грановский)之类西欧派知识分子无不主张积极面对现代西方,唯如此方可强盛俄罗斯、强化居民对俄国的认同。如别林斯基《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1841)就如是描述道,“我们现在是欧洲主义的学生,我们不想成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而想成为具有欧洲精神的俄国人。这一意识贯穿于我们活动的任何领域,并鲜明表现在普希金出现后的文学创作中”<sup>③</sup>。诸如此类希望融入欧洲的声音,在俄国发展史上不绝于耳。

另一方面,迟疑甚至对抗“西方”概念的声音更为强烈:被视为斯拉夫派先驱之一

---

① 《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240、251页。

② Joseph Conrad, *Under Western eyes*. Garden City: Doubleday, Page & Co, 1911.

③ В. Белинский: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5, Москва: АН СССР, 1954, С.120.

的史学家波尔京（Иван Болтин）这样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按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判断俄国，等于用矮个子标准为高大汉子缝制衣服。欧洲各国有许多特点彼此相通，了解半个欧洲，便可根据这一半判断另一半。但是对于俄国，不能用这种方式，因为他和他们毫不相像……自从我们向外国派出青年以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完全改变了。由于臆想的所谓宗教教育，在我们心灵里灌输了种种为我们祖先所不知道的新成见、新嗜好、新弱点、新念头，我们对祖国之爱泯灭了，对祖国信仰和习惯等依恋消失了”<sup>①</sup>。而被普希金称为“所有俄罗斯人中最俄罗斯的人”（из перерусских русский）的著名剧作家冯维辛（Денис Фонвизин），虽出生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语家庭，却在《法兰西来信》（1770）中说，“在法国，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好东西值得模仿”，“我任何一位头脑正常的同胞，与祖国的疏离感是因为俄国腐败造成的，但比起把他送往法国来，则没有更好的办法能使之回归所热爱的祖国”，“对比我们的农民与法国的农民，我可以客观地说：我们要幸福得多”，并认为晚加入欧洲是有利的，因为他们的确比俄国先进，俄国因此可以从他们那儿学到想要的任何东西、避免那里的所有不足和罪恶，“我想一个人的出生比起去世来，要幸福得多”<sup>②</sup>。曾经激进过的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1861年居然称，“我们现在被逐出欧洲，就像上帝把亚当逐出伊甸园。但为什么要假定我们认为欧洲是伊甸园并要赋予欧洲人以荣耀的光环？……我们并不羞愧我们是来自亚洲的。我们是美洲和欧洲之间的世界部分，这就足够了”<sup>③</sup>。著名的斯拉夫派理论家阿克萨科夫（К. С. Аксаков）在《俄罗斯交谈》杂志（1856年第1辑）上发表的《论俄罗斯观点》（1856）同样称，“我们站在纯属欧洲那种民族的土壤上已经有150年，我们为此牺牲了我们自己的民族性，我们正因为这样才未能拿出任何成果来丰富科学。我们俄罗斯人之所以未能给人类做出任何贡献，其原因正在于我们没有，起码是没有提出俄罗斯观点……俄罗斯作为一种民族，直接有权而无需经过西方许可才能拥有全人类性，它对欧洲抱着批判而独立自主的态度，它从欧洲只接受能够成为共同财富的东西，而摒弃欧洲的民族性……欧洲主义，在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同时也有自己非常强烈的民族性……所谓斯拉夫主义即拥护全人类性并认为俄罗斯人直接有权拥有它”。20世纪初俄国著名史学家卡列耶夫（Николай Кареев）在华沙大学所作的题为《论俄国科学精神》的演讲更宣称：“就历史发展的类型和历史经验来说，西方各民族之间彼此相似程度要远远超过俄罗

---

①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56-158页

② Д.Фонвизин: Писма из Фаранции. См.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8 века (под ред. Макогоненко). Ленинград: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70, С.338-348.

③ А.Герцен: Прологомена// сбор.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2, С.121.

斯与整个西方的相似程度”<sup>①</sup>，他主张俄国和西方分离。

对西方的这些复杂反应，甚至成了俄国的思维方式，如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开篇就批评“用西欧的尺度衡量亚洲式的俄国”的文学观，他理解的俄国文学正好与这种批评方法相反，即“俄国文学，在总体上总比西欧文学家来得更宽广些、更客观些，因为俄国文学家即使在其心理上还是一个阶级性的人，但必须提高自己，超出本阶级的使命之上”。可以说，面对“西方”概念，俄国所产生的如此复杂心态，三百年来始终没变，无论是积极面对还是消极对抗，至今如此，以至于普京时代普京和俄国民众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乃是：“俄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世界强国、最大的欧洲民族。俄国和欧洲的文化一致性——不会仿效外来形式，只是补充根据而促使政治独立而已”<sup>②</sup>。

与之相对应，当欧美人弱化“西方”观念时，就有可能正面对待俄国。1812年战胜拿破仑之后，俄国加紧西化，使得欧洲有些国家及其知识分子视俄国为西方的一部分。如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在著名的《关于普希金》演讲中曾谈及这样的现象——1820年代俄国成了受欧洲尊敬的强大帝国，“沙皇只要送给外国作家一个戒指或一只鼻烟壶，就能得到吹捧他的长诗或大作品，就能在法国和德国的重要报纸上刊出维护俄国的政策和歌颂沙皇本人的文章”<sup>③</sup>。1858年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ère）访问俄国诸多城市后发表的《俄罗斯旅行印象记》，以轻松、俏皮和有趣的笔调记录了所见到的现象和所想象的历史问题，描绘了一些著名人物的活动、居民的日常生活细节、刻画了俄国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还介绍了不为欧洲所知的俄国文学，使法国人了解了俄国诗人和小说家，并翻译了不少俄国作家的诗歌和小说作品。得知1861年俄国颁布解放农奴宣言，美国《独立报》这年4月11日就发文赞誉道，“历史会承认亚历山大二世把农民从专制下解放出来的宣言的，承认此乃19世纪基督教文明精神和趋向之最有特色的表达”。紧接着，《利特尔生活时代》（Littelli's Living Age）杂志这年4—6月号刊出文章《俄罗斯革命》称，“这是纯粹的亚洲政府——俄罗斯，拒绝了自己的亚洲根基，转向欧洲，但不是作为强大的专制国家，而是作为欧洲民族转向的……这给俄国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sup>④</sup>。尤其是，1880年代中期，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列斯科夫（Николай Лесков）、果戈

①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

② М.Межиева и Н. Конрадова: Окно в мир: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Русския язык, 2006, С.187.

③ 冯春选编：《普希金评论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705页。

④ О. Павловский и В. А. Быкова(сост.): Вопросы Путину: План Путина в 60 вопросах и ответах. М.: Европа, 2007.



理（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被许多人英译出版，美国甚至出现了“俄国热”（Russian craze），其中托尔斯泰作品的英译者哈普古德（Isabel Hapgood），就因为这种热潮而成了畅销书作者，这种情况和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类似。

20 世纪初，西方虽然对俄国及其政治制度持严厉批判姿态，但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高校的著名学者，确立了俄国文学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位置，并且把俄国的许多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大量译介到美国。与此同时，俄国著名学者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和米留科夫等 1901、1904 年在芝加哥大学、波士顿罗威尔研究所发表系列演讲。和英国一样，俄国研究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学者的业余爱好和新闻界的热衷，这些都促使美国人把俄国当作欧洲一部分和世界一部分。而欧洲同样热衷于斯拉夫学研究。1840 年法兰西学院就设立斯拉夫研究职位，1892 年和 1902 年里尔大学与索邦大学设立俄国文学研究教席，1841—1843 年柏林、维也纳等先后设立斯拉夫-俄国研究职位。虽然比起美国和英国的斯拉夫-俄国研究，欧洲大陆的斯拉夫—俄罗斯研究更多是国家支持的，但对具体研究，政府扮演的角色则同样很弱。欧洲大陆和英美许多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收藏大量俄文和西文关于俄罗斯的作品，供公众阅读和自由研究之用<sup>①</sup>。

这些情况促使有些欧美人冷静对待俄国。如美国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称，“考察欧洲对俄国的影响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为俄国毕竟属于欧洲的一个部分，俄罗斯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但是，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于欧洲其他人，他们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的有别。因此俄国一代代思想家为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问题所焦虑”<sup>②</sup>。这种矛盾性表述，在全球化时代也有呼应，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学者霍夫曼（David Hoffmann）的《欧洲现代性和苏联社会主义》（European Modernity and Soviet Socialism, 2000）就说，“已经撰写的现代俄国史是完全有别于‘西方’的历史。因而，对俄国没有沿着英国、法国或美国所代表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自由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之路前行，是可以理解的。俄罗斯帝国这个一直延续到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前的沙皇专制体制，虽然被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所替代，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即便苏联史有其独特性，“但考虑到和现代性的来临相关联的更有普遍意义的趋势，是很重要的。苏联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和贯穿 19 世

---

① Robert Byrnes, *A History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4, pp.3-20.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374 页。

纪后期—20 世纪欧洲的发展相类似。这些方面包括资产阶级和国家监控的扩展、有效控制和动员人口、科学至上、力图使社会理性化和规训、大众政治出现等。当我们在比较语境中查考这些现象时，有可能看到苏联曾有和现代欧洲政治体制同样的许多特征”，虽然西方常常把现代性定义为民族国家的出现、议会民主的确立、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展，而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显然是没有这种现代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但启蒙运动的许多方面还是被植入到现代俄国的改革历程，如信仰进步（belief in progress）、相信理性（faith in reason）、崇拜科学（veneration of science）、轻视宗教和传统（disparagement of religion and tradition）等启蒙运动理念被苏联所充分实践，这些连同城市化和工业化及其所带来的人口管理、福利社会等，都表明苏俄实际上已经和西方有很多共同的现代性特征，“如果我们接受社会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有一条过渡到后现代的线索。苏联掌控着现代工业时代特定优势的经济，但当经济增长发展到要仰赖技术和服务业的后现代时，这种经济就不景气了”<sup>①</sup>。也就是说，因为现代化进程及其后果，促使欧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西方”意识，从而正视俄国的存在和发展。

然而，客观上追求现代性普遍价值的现代化过程，在刺激俄国试图融入西方的同时，却强化俄国人的民族意识，典型者如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波戈金（Михаил Погодин）《关于俄国历史的一封信》（1837）所描述的，“俄国在世界舞台上多么不可思议……以宏大而论，哪个国家能与它相比？……有人口六千万，此外还有那些没被计算在内的……在这些人口之外，再加上三千多万我们的斯拉夫兄弟和同胞……在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和我们一样的血液，和我们操的是相同的语言，尽管在地理上和政治上有隔阂，但由于起源和语言，斯拉夫人和我们形成了一个精神实体……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正在被这一情景所感动……难道有谁能和我们相比？难道有谁不会让我们强制服从？世界的政治命运，我们随时要对它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岂不是由我们掌握么？”，“今天斯拉夫各民族中哪个居于首位？以数量、语言和全部特质而论，哪个民族会被认为是整个斯拉夫世界的代表？哪个民族对未来的幸福提供了最多的保证……啊，俄国，啊，我的祖国！不就是您吗？您被精选出来使人类的发展臻于极端完美，体现人类的所有成就……调和古代和现代的文化，使心灵和理智相一致，建立真正的正义与和平”<sup>②</sup>。这种声音自彼得大帝改革伊始至今，在俄国境内获得积极呼应之声不断，但在欧美却和“西方”观念的冲突加剧，进而导致在实际生活中，俄国越是强调自身的民族认同，同西方对俄罗斯问题之表述的

---

① David Hoffmann & Yanni Kotsonis (ed.), *Russian Modernity: Politics, Knowledge, Practices*. MacMillan Press Ltd & St. Mating Press inc, 2000, pp. 245-258

② Cohen, *Panslavism: its history and ideology*, New York, 1960, pp. 141-146.

矛盾就越是激烈。

可以说,这样的“西方”观念及其被合法化,在俄罗斯问题表述上产生了复杂效应:首先是给欧美和世界建构了不包括俄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西方”概念,不管俄国在地理上是否位于欧洲,也无论俄国融入西方的历史有多长、程度有多深。如身为印第安那大学教授的伯恩思(Robert F Byrnes),在考察本校的研究生教育时就发现,俄语语言文学系课程设置、学生训练和培养模式等,同非西方的语言文学专业具有一致性,因而把“俄国和其他非西方区域(other non-western areas)的研究生教育”视为同类<sup>①</sup>;并且,这样的研究,客观上无法积极面对俄国问题——怀疑俄国试图进入欧洲文明框架的现代化历程及其一系列重大举措,甚至影响到二战后系统的斯拉夫-俄国(苏联)学发展,以至于研究得越多,对俄国就越发排斥<sup>②</sup>;尤其是,导致俄国对自身问题及和欧洲关系的判断、对自己发展前景的观察等在主流上有别于西方,“大部分斯拉夫主义理论都以俄罗斯—西方划分为二的概念为基础:西方是‘法制’的,俄国是‘道德’的;西方是个人主义的,俄国则是‘共产主义的’;西方是物质的,俄国则是精神的等。因为他们在情绪上紧密依赖作为一个实体的‘俄国’,他们无视同样的分离也在西欧及现代化思潮中出现的事实,他们否认与西方思想家间的任何基本关联”<sup>③</sup>。可见,“俄罗斯问题”之复杂,与“西方”概念下的表述不无关系,甚至正因为如此而产生了让俄国和西方都意外的效应。

### 三

而且,西方对俄罗斯问题的表述之复杂远不限于观念层面,更是落实到实践层面的话语行为和政策导向:俄国因要解决民族构成的多元、复杂、棘手等问题,有意识在行政运作、法律实践、社会改造等方面强化俄罗斯—斯拉夫民族的主体性,结果使得在罗斯成为俄罗斯帝国—苏联—俄联邦的过程中,首先和境内各族裔矛盾重重;而罗斯—俄罗斯帝国—苏联—俄联邦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俄国崛起和变革的过程。期间俄罗斯的主体性诉求,自然使其在不断融入西方的过程屡屡被西方所拒绝,西方和其张力不仅没有消除,甚至时常随着其参与西方的程度而有所加剧。

因为协助欧洲多国政府解决 1848 年各自的内部危机,却在危机之后干预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促使欧洲对正在崛起的俄国警惕。1853—1856 年俄国—土耳其的克

---

① Cyril Black & John Thompson (ed.),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114-157.

② В.Ф.Шаповалов: *Россиевдение: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для вузов*. М.: ФАИПРЕСС, 2001, С.335

③ [美]艾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页。

里米亚之战，因英法支持土耳其而使俄国失败，导致维持欧洲局势均衡的维也纳体系瓦解，俄国由欧洲局势的平衡力量转变为利用巴尔干局势（支持南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抗衡欧洲的力量，从而加剧了俄国与西方之间的矛盾。尽管反对西方得到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呼应，却引发了俄国的内部危机（1861年改革就肇始于此）。因塞尔维亚问题（1876年10月被土耳其侵占），俄国出面干预，引发第二年6月俄土交战，1878年3月土耳其被迫签订圣斯特法诺和约，巴尔干政治版图发生了有利于俄国的大幅度变动，土耳其还要赔偿俄国3亿多卢布，这引起德、英、法、意等国不满，导致是年7月俄国被迫同意签订《柏林条约》——俄国在战场获得的胜利，在谈判桌上损失大半，从而使俄国与欧洲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情形一直在延续着，如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上台，单方面退出共同抵抗德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政府中断俄国资本主义改革进程，在西方看来，此举打破了欧洲关系的平衡和期待，故与苏俄境内反对派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围堵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德国认为是为了保卫国家统一，防御法国怒火殃及德国重建欧洲的目标，但它之所以和俄国有关，是因为“法国同专制主义的俄国结盟，而后者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对扩张有着不知餍足得近乎病态的胃口”<sup>①</sup>；苏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后欧美未因共同的反法西斯经历而同苏联和睦相处，却因苏联和西方要各自建立世界中心，导致战后很快进入东西方冷战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进行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参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方案，曾参与其中的叶利钦政府首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长谢·格拉济耶夫，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辨析并痛斥了这类方案及其实施，认为这是西方人在俄国大地上推行“非洲模式”，即没有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的政治机构，拱手相让国民经济的各种权力，完全服从跨国资本的利益，没有独立自主的民族精英，没有本国的独立资本体系，没有实际有效的社会政策等。他还进一步分析说，“西方政治思想界中患有恐俄症的意识形态专家，歇斯底里要求消灭俄国”<sup>②</sup>。不仅如此，即便是苏联解体了，但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卡莱欧（David Calleo）在《欧洲的未来》（2001）仍声称，20世纪的复杂历程，使人们无法对20世纪末的新欧洲进行预测，因为有太多不可测的因素，如“欧洲的东边和南边是一些反复无常的邻居，包括庞大而虚弱的俄罗斯”<sup>③</sup>。诸如此类的事件表明，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变化，伴随着与西方的冲突，导致西方在意识形态上拒绝俄国，尤其是十月革命以后到二战这段时间，西方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上所建立的俄国

---

① [美]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② [俄]谢·格拉济耶夫：《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佟宪国、刘淑春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

③ [美]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第23页。

形象，与俄国本土所建构的祖国是一个追求普遍真理和绝对正义的形象，相距甚远，因而加剧了西方社会对俄国的排斥。

可是，在冷战加剧的 1950 年代，西方却不再漠视苏俄及其存在。西方看到苏俄政治和社会变动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之大，于是有更多的政治学家对苏东问题研究的兴趣剧增，政府部门也加大投入力度以切实支持研究苏联问题。原来，1957 年苏联卫星上天的事实，迫使欧美必须面对意识形态上对抗、观念上不属于西方的苏俄。理查德·乔治 (Richard George) 在《哲学苏联学：学术研究》(1988) 一书中这样描述：在冷战冰点时期，也强化了回避苏联的态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在欧洲方兴未艾，分析哲学则成为英美哲学之王。在西方，没有多少哲学家知道或可能有阅读俄语或研究苏联哲学著作的冲动。但是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把西方从洋洋自得中惊醒。对苏联的学术兴趣随之增长，苏联和东欧研究中心在一所所大学建立起来。他们认为应该知道潜在敌人的信念，因而导致了对苏东历史、政治、经济和地理的研究。对苏东哲学之兴趣的增长成为后来醒目的情景。在西方，对苏联哲学的批评性研究，出现了三位开创性人物：罗马的维特 (Gustav Wetter)、瑞典的波钦斯基 (J.Bochenski) 和美国的克兰 (George Kline)，这是三位有着这种强烈兴趣的独特人物”<sup>①</sup>。的确，1958 年，维特那部特别讨论 1920 年代苏联马列主义哲学问题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1952) 译成英文，迅速促成西方关心苏联哲学。1959 年，出生于捷克的弗赖堡大学波钦斯基 (J.Bochenski)，根据 1947—1958 年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纂出一部的卷本的《苏联哲学家传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62 年，维特在德国出版涵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问题的《今日苏联意识形态》(1966 年译成英文)。这些关于苏联哲学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意识形态批判。如维特从托马斯哲学观点研究苏联马列主义哲学的僵化问题，并由此开始了系列苏联学研究，还创办了《苏联学研究》(Sovietica) 和《苏联思想研究》(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杂志。可以说，正因为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出现上述对苏联马列主义的西方认知，从而加紧研究苏联意识形态。

其实，195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对俄国尤其是苏联问题的研究，远不限于苏联意识形态。印第安那大学伯恩斯教授在《美国对苏联的研究与指教：一些反思》(1985) 中论及，二战后的一、二十年，美国的俄苏研究至关重要 (crucial)，研究遍及苏联的现代化、人口结构及健康福利、族裔诉求、生活指数和消费、参与社会进程等社会变化问题，苏联国民生产增长、农业失败、军事开支增加、技术革新欠缺、劳动

---

<sup>①</sup> Helmut Dahm, Thomas J. Blakeley, and George L. Kline Dordrecht (ed.), *Philosophical Sovietology: the pursuit of a science*. Boston: D. Reidel Pub. Co., 1988, pp.1-2.

力流动受阻、对外贸易发展失衡等经济变革问题，对其内部价值观和文化构成的多中心状况、地缘政治事件、改革苏联传统的基础、青年变化、新思维、社会管理危机等政治变革问题<sup>①</sup>。而且，对这些方面的诸多研究，形成了三个学派：著名外交家和史学家凯南（George F. Kennan）及其《列宁和斯大林视野下的俄国和西方》（1961）、《美国需要关于苏联的新看法》（1977）等，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主任乌拉姆（Adam B. Ulam）教授及其《扩张和并存：1917—1967年间苏维埃外交政策史》（1968）、《俄国政治体系》（1974）、《俄国民族主义》（1981）和《危险的关系：世界政治中的苏联，1970—1982》（1983）等，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鲁宾斯坦（Alvin Rubinstein）及其《二战以来的苏联外交政策：帝国与全球》（1985），哈佛大学教授、美国东欧俄罗斯和欧亚研究国家委员会副主席科尔顿（Timoth J. Colton）及其《莫斯科：社会主义一些主要城市的管理》（1995）等所形成的现实主义学派（the realist school），他们虽然认为列宁主义和对列宁的崇拜使苏联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进而失误地认为苏联的改革是渐进的，但能及时关注苏联政治变化及其地缘政治状况、内部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等问题。哈佛大学共产主义和俄国研究中心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及其《为何苏联认为它能打赢核战争》（1980）与《缓和：莫斯科的观点》（1981）等，布热津斯基及其《永恒的清算：苏联集权主义政治》（1956）、《苏联政治：从未来到过去》（1976）、《苏联集团：统一抑或冲突》（1967）和《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和覆灭》（1989）等，著名的国际政治评论家史密斯（Hedrick Smith）及其《俄国人》（1976）和《新俄国人》（1990）等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历史学派（the political cultural-historicist school），这些人关注的是莫斯科行为中的政治价值趋向和意识形态，以及背后的压制自由和恐惧外国的传统、苏联领导人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必然矛盾等问题。威斯康星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政治学教授、多伦多大学俄国和东欧研究中心创建者斯基林（H. Gordon Skilling）及其《一国共产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斯大林之后的东欧》（1961）、《共产主义、国家的和国际的》（1964）、《利益集团和共产主义政治》（1966）、《苏联政治集团：一些假定》（1966）等，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夫（Jerry F. Hough）及其《苏联和社会科学理论》（1977）、《苏联是怎样统治的？》（1979）、《苏联的成功：诸多问题和多种可能性》（1982）和《俄国与西方：戈尔巴乔夫和改革政治学》（1988）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恩（Stephen F. Cohen）及其《苏联意识形态之争：马克思主义对抗斯拉夫主义》（1982）、《苏联学：美国的感知和苏联的现实》（1985）及《反思苏联经验：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1985）等，他们了形成了多元视角看待苏联改革和苏联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多元学派（the

---

<sup>①</sup> See Alexander Shtromas & Morton Kaplan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New York: Paragon, 1988, p. 522.

pluralist school)。

这些学派和西方其他国家的俄苏研究者都试图提高研究质量：1969年，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举行西方研究苏联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圆桌会议。就在这时，第一部讨论如何有效运用西方科学概念、理论、方法论研究苏联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论文集《共产主义研究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帝国理论》在西方问世。此后，对如何有效描述苏联问题，西方斯拉夫学进行了方法论探讨，如洛泽尔（Gabriel Roselle）的《共产主义研究的合适模式》（1993）就回顾和总结了西方苏联学中尝试使用的集权主义模式、启发式理论、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文化、发展模式、社团主义、官僚政治、政党政治等方法论的成效和问题。特鲁杰尔大学政治学教授莫特（Alexander Motyl）的《苏联学：理性、民族性：切近苏联民族主义》（1990）和《后苏联国家：透视苏联解体》（1992）等，则随着苏俄的变化，丰富了西方苏联学研究，关注苏联共产主义所包含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各族裔诉求和苏联意识形态相冲突等问题，并揭示出苏联作为国家主体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族裔的复杂关系对苏联的解构性趋势等。

然而，西方的苏联学（Sovietology）虽然有政府的大量投入、军方的大力支持，但对1985年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却毫无准备（unprepare）。对此，对冷战时代的苏联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反思，在后苏联时期的斯拉夫学研究看来是必要的，但研究结果又是令人震惊的<sup>①</sup>。的确，新一代美国苏联学者杰纳吉斯（Christopher I. Xenakis）的《苏联出了什么事？美国的苏联学研究者如何又为何吃惊》（2002）就专门研究下列各种疑惑，包括“美国的苏联学是怎样考虑和撰写苏联最后20年时光的？1989年苏联共产主义失去合法性和1991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改革促成的突如其来的这些戏剧性事件，为何会引发政治学家的措手不及（surprise）？为何美国的绝大多数的苏联研究专家会错误地预言发生在苏联的重大变革（significant innovation），无论是任何种类的政治、经济变革，还是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呢？为何大部分美国的苏联学家没能触及到1970—1980年代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苏联要发生变化的迹象呢？”“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对苏联影响，是美国的苏联学家始料未及的”，美国国家政策态度项目主管和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库尔（Steven Kull）的《误读公众：新孤立主义神话》（1999）已经指出，苏联所进行的极不寻常的改革，西方却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发生什么。“1980年代，绝大多数的美国苏联学家视苏联领导人的改革行动为理性的有意识之举，认为莫斯科不久就会承认（更何况改革之初的判断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图谋要解构其自己的政府。这些专家相信，克里姆林

---

<sup>①</sup> Frederic J. Fleron(ed.), *Post-Communist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in Sovietology*,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1993, p. ix.

宫领导人很可能要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做出反应，因为随着对内压制和对外挑衅政策的升级，他们曾经反对过以前自由化的其他表现”，“我们那些最优秀和最重要的学者为何会错误地考虑苏联变化的迹象呢？这些男男女女的政治学家占据着一流的学术地位，有完美无缺的学术文凭，曾拥有大量的国际追随者，他们的发言被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其他学者密切关注。这些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和苏联学本身，从根本上来就误读了苏维埃特质和苏联变化的能量……美国的苏联学家应该预测到诸如 1970 年代那些变化的可能性，应该看到 1980 年代戈尔巴乔夫要进行的改革，但是他们没有做到”，于是研究美国苏联学为何没有预计到在 1970—1980 年代已经明显表露出来的苏联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以及三种学派在研究苏联问题上的各种失效，成为后苏联时期许多学者的工作<sup>①</sup>。

其实，对这种错愕的反思，早在苏联尚未解体的 1990 年就开始了：莫特尔的《苏联学、理性、民族性》（1990）就已注意到冷战时代的苏联学何以会出现对苏联的错误判断，出现加剧西方人排斥苏联正统文化并用苏联反对的文化去挑战苏联等现象，认为主要原因是对俄国问题研究格局的变化——从研究者的兴趣转变为体制性行为和战略需要。他写道：“战后苏联学研究的倾向适合于战前政治学的形式——法律的特点，充满着对集权主义内容的解读。1960—1970 年代，随着极权主义的衰落，苏联学延误了对政治学家在 1950 年代已经利用的诸多概念的察觉，包括系统、利益集团、现代化和政治文化等”。1987—1988 年苏联学的主流最终承认，自己独特领域的一些不足在很多年前就显露出来了。“如果苏联学不放弃事务性的行为主义，那么它将最终走向知识分子的真正终结。一句话，苏联学将面临危机——学术训练所依赖的苏联学之存在和成功决定于现实状况，而不是研究过程的学理性和价值中立<sup>②</sup>。稍后，莫特尔在《苏联学的窘境和理论迷宫》（1993）中进一步研究发现，“讽刺的是，虽然绝大部分当代苏联学研究者是政治学家，但他们大部分人的研究实践却不是当代政治学。相反，当代苏联学显示出来的是各种数据、政策分析、新闻之类的笨拙混合，没有察觉到这类印象式研究是没有理论、脱离学术的。关注苏联学的未来发展远不止是本质上的不足，而是要跨越到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甚至比较政治学上来”，虽然这可能有职业的特性使之拒绝理论，但是要承认，“（当时的）大学、国家、媒介的影响，使苏联学面临着毫无准备解决自身喜好的困境”<sup>③</sup>。在这期间，威尔斯学院俄国经济学教授和戴维斯中心名誉教授高曼（Marshall Goldman）的《改革出了什么过错：

① Christopher I. Xenakis, *What happened to the soviet union? How and why American Sovietologists were caught by surprise*, 2002, pp. 1-2、16.

② Alexander J. Motyl, *Sovietology, rationality, nationality : coming to grips with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8

③ Frederic J. Fleron(ed.), *Post-Communist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p. 77



戈尔巴乔夫的兴起和衰亡》(1992)与《丧失的时机：为何俄国经济改革没有发挥作用?》(1992)等，也尝试提出其他疑惑并试图予以解释。正是有着苏联解体之初的深刻反省，才使得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考克斯(Michael Cox)的《苏联发生了什么?对苏联研究的批判性反思》(1998)能根据此前的教训，即西方的苏联研究是一种特殊学术话语(a particular academic discourse)提出，他不再打算用苏联学研究方式讨论俄国问题，而用现代大学的学术立场讨论包括苏联研究和冷战、戈尔巴乔夫因素、社会主义和苏联经验等方面问题，以期探寻苏联学失败的深层原因<sup>①</sup>。

与此同时，曾在英国多所大学任教授、现任职于美国韦斯利(Wesleyan)大学政府系的政治学拉特兰教授(Peter Rutland)，结合自己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如《计划的神话：苏联计划经历的教训》(1985)、《苏联经济不景气的政治学》(1992)等，撰文《苏联学：谁搞对了和谁弄错了?为何?》(Sovietology: Who got it right and who got it wrong? And Why?)系统反思西方苏联研究的病症。他认为苏联学犯有7种错误：“1、学术研究对象因为政治偏见而变得不重要，无论是左翼的(那些似乎不敌视苏联而热心者)，还是右翼的(非常敌视苏联的)；2、苏联区域研究因为隔离了社会科学的核心科目而在方法论上软弱无力；3、关于这个地区的语言和历史——尤其是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历史，西方专家们缺乏严格训练而少有掌握的；4、试图监控苏联的研究，却面临着无可跨越的障碍：不可靠的或实际上不存在的材料、路径问题、苏联官方和学界有意识提供的错误信息等；5、职业的、个人的和政治的角力产生了大量置于冷战之外的学者，限制了苏联学来自他们内部的观点；6、让学术扮演媒介专家和预测人角色，这样的诱惑意味着，他们已经少有进行仔细的帝国研究或严密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激情；7、过分仰赖政府基金导致出现这样的局势，即在领域中，智库或军事部门有可能取代学术行为”。他主张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苏联学全然没有预料到苏联崩溃之速度或范围，这并不是因为它缺乏明智的方法论，或者险恶的政治阴谋，而是因为对苏联终结的没有能力去深思熟虑。就此而言，苏联学的失败是因为想象力的失败(Sovietology failed because of a failure of imagination)。更为严重的是，苏联研究犯了两方面非常糟糕的错误：夸大了苏联制度的稳固性和严重扩大了改革的范围”<sup>②</sup>。这些反思性批评，的确是抓住了西方斯拉夫学的问题，也促进了西方斯拉夫学在后苏联时代的研究质量。

对俄国成为和西方不一样的世界大国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却因为作为一门学科——斯拉夫—俄国—苏联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1990年代末期在西方政治学及斯拉

---

<sup>①</sup> Michael Cox (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London ; New York : Pinter, 1998, p. 15.

<sup>②</sup> Michael Cox (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p. 37、47.

夫学界引起了多方的深入检讨。在胡尔大学政治学研究者麦卡内尔（Terry McNeill）教授的《苏维埃研究和苏联解体：为现实主义辩护》（1998）看来，西方的苏联研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西方苏联学研究，虽然热衷于对苏联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作为苏联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精英、社会学和政治学、工业化社会等方面进行研究，但因囿于西方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几乎没有人搞清楚苏联意识形态及其构成的实质内容、以及它在苏联领导人决策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在苏联解体之前，忽视这点，要研究苏联体制，是完全不可能的”<sup>①</sup>。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什拉宾托赫（Vladimir Shlapentokh）的《苏联社会和美国苏联学家们：研究为何失败？》（1998）批评说，在美国的苏联研究中，任何话语所提出的批评性问题都显示出，学术界和美利坚国家的关系过于密切——一开始就着眼于苏联对美国影响方面的功利性研究，这样研究的结果可想而知。“总结美国的苏联学，似乎向我们表明，它处理的是美国自身及其所能理解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美国的苏联研究之失败，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失败，而且是对作为试图理解 20 世纪人类最重要经验的一种社会特点之陈述的失败”；苏联学把苏联视为一种反常的制度，而不清楚专制主义在俄国的强大政治传统，以及苏联产生这种制度的俄国文化基因，因而美国的苏联学研究，1917 年之后讨论苏俄问题的实质，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学者和分析家们去挖掘一些可以充分运用的有价值信息，而是美国自身的观点和信念<sup>②</sup>。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费伦（Frederic J. Fleron）的《后共产主义研究和政治学：苏联学中的方法论与帝国理论》（1993）也注意到的这样的现象，即绝大部分美国苏联问题研究专家的成果，从来就没有在政治学理论、概念和方法上得到充分运用，苏联学家被训练成只对很有限领域感兴趣的特殊专家，其学术观点和特殊的智力无法应对苏联及其庞大规模和复杂性<sup>③</sup>。这种情况在西方的俄国学研究中同样司空见惯，以至于出现了格拉斯哥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蒂克金（Hillel Ticktin）的《苏联研究和苏联解体：为马克思主义一辩》所描述的情况：“1991 年，苏联这个旧制度解体了，与此同时，苏联学不仅作为一个学科消失了，而且此时和此后许多研究者直接参与了现在俄国的管理工作。这说明，他们并不理解他们实际信仰的可操作的资本主义是能够在苏联遗留下来的残骸上建构起来的”<sup>④</sup>。这种反思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1888 年 5 月游学巴黎的俄国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根据当时法国学术界排斥性阅读俄国文化的情形，著述《俄罗斯思想》，大声呼吁，欧洲知识界应该全方位地

---

① Michael Cox (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pp. 51-72.

② Michael Cox (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pp. 95-114.

③ Frederic J.Fleron, “Soviet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Studies”, *Soviet Studies*, January 1968, 20(3), pp. 313-317.

④ Michael Cox (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pp. 90.

充分熟悉俄国，并“注意在世界历史中俄罗斯思想存在的问题”<sup>①</sup>。到了苏联时代，反而因西方加强了研究斯拉夫—俄国—苏联学的力度，而经常发生错误的判断，导致西方苏联学研究对苏联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是通过电视而不是学术平台。“要估计苏联学研究对西方的苏联政策制定者影响的程度问题是很困难的”。相应的，也导致了俄国的警惕，得不到苏联科学院有关机构提供的可靠数据，以至于1828年以来俄国所奉行的对境外/境内出版物分别审查的制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怀疑和拒斥外国理念和影响的现象，在战后的苏联，随着西方苏联学研究的扩张和深入，更为严重<sup>②</sup>。

所幸，欧美斯拉夫学在后冷战时代虽仍有“西方”特质，但因大量俄侨学者进入西方斯拉夫学研究机构，并占据了许多重要的学术位置，导致对俄国问题研究相对要冷静和深入了许多。后苏联时代因为制度更迭、法律和文化市场替代了新闻报刊审查制度，使得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俄国开始系统地重视西方斯拉夫—俄罗斯学研究，并从中反观西方是如何解读俄罗斯问题和怎样构想俄罗斯帝国的，建构了新兴的学科“俄罗斯学”（русистика）：一方面，俄国大量翻译西方斯拉夫学者关于俄罗斯问题研究的论著，如圣彼得堡“科学院方案”出版社编辑“当代西方俄国学研究”译丛（современная западная русистика）、莫斯科“新文学评论”出版社推出“学术文库”译丛（науч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两套丛书涉及西方俄罗斯研究经典的很多学科（总数远超过百种），给俄国重新研究自身的历史和当代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另一方面，改变了过去对西方有关研究的意识形态监控，而积极追踪西方斯拉夫学研究进程，如马里兰大学马季斯卡（George Magiska）教授选编《美国俄罗斯学》（2000），很快就被圣彼得堡学者卓娅·伊西多洛娃翻译（萨马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原来它汇编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各学科讨论俄国从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罗斯到20世纪俄国许多重大问题的西方重要研究文献，如列文（Eve Levin）《寻求上帝：对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之宗教认同的还原》（1993），讨论前苏联这些地区的宗教信仰之复杂性问题，对俄国人深刻认识东正教的复杂性不无启示。同时，系统研究西方怎样理解俄国，在西方视野中俄国形象有着怎样的变化，构成这种形象的稳定参数等，以及在不牺牲民族尊严，不舍弃民族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俄国自身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他人形成俄国的正面形象等<sup>③</sup>。

---

① Вл. Соловьев, Спор 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М.: ЭКСМО-ПРЕСС / Харьков: ФОЛИО, 1999, С. 622.

② See Vladimir G. Treml, *Censorship, Access and Influence: Western Soviet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 Berkeley: UC Berkeley, 1999.

③ В.Ф. Шаповалов,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для вузов...* С. 333.

总之，西方斯拉夫学对俄国问题的独特解读，因为欧洲的学术传统，使之能在相当程度上受益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整体进步，不为俄国人的观点所左右，从而问世了一系列不同于俄国学人所撰写并得到俄国学界赞赏之作的更为深刻的论作，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段帮助了中国和世界更好地认识俄国。同时，西方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斯拉夫学，客观上加大了西方对俄罗斯问题的认识与俄国自我判断的分野。又因为在 20 世纪演变成政府介入的苏联学，使西方苏联学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对俄政策，却加剧了西方和苏联的冲突，强化了西方对于苏联作为世界危险角色的认知。冷战结束，也结束了斯拉夫学的苏联学时代，开启了让俄国学界能接受与俄国政界不敌视的后斯拉夫学时代。

---

**【Abstract】**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cademia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issue of Russia is a very complicated concept, which results not only from the complexity of Russi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from the Western unique comprehension and expression of Russian issues. It is Europeancentrism, the Western Concept, Slavic Studies and Sovietology that combine to influence the Western reading about Russia and ultimately cause a different perception of the issue of Russia from Russia itself.

**【Key Words】** Russian/Soviet Studies, Sovietology, the Concept of “West”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ветология, концепция «Запада»

---

（责任编辑 卢冠霖）

##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对中国智者形象的建构

刘亚丁\*

**【内容提要】**俄罗斯汉学家的“老子—智者”套话是在文化误读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们塑造的中国君王—智者形象中隐含着俄罗斯人的哲学家—国王理想；他们赞扬孔子的为政方略时隐含着影射当下政治文本的“春秋笔法”；俄罗斯作家们塑造了具有仰慕或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向的中国智者形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中国智者形象是一种“社会总体想象物”，它的建构与当时俄罗斯的价值重建、新欧亚主义被激活和俄罗斯缺乏远古精神文化资源有关。

**【关键词】**形象 中国智者 俄罗斯汉学家 俄罗斯作家

**【中图分类号】**G13/1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3-0124-(12)

本文考察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汉学家和俄罗斯作家对中国“智者”形象的建构，力图还原到该形象建构的“现场”，讨论该形象在俄罗斯被建构的原因。

### 一、一个“中国智者”套话的来历

老子是“智者”，这是俄罗斯人的一个套话。所谓套话，巴柔的定义是：“作为他者定义的载体，套话是陈述集体知识的一个最小单位，它希望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效。”<sup>①</sup>中国“智者”来源于对老子的“子”的解释。由季塔连科主编的《中国哲学

\* 刘亚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① 转引自孟华：“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载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百科辞典》，在老子的词条后，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Престарелый мудрец”<sup>①</sup>。“Престарелый”意为“很老的、暮年的”，С. 奥热格夫《俄语词典》对“мудрец”的解释是“富有高度智慧、掌握了大量知识和经验的人”<sup>②</sup>。С. 库兹涅佐夫的《俄语大词典》：“具有丰富知识的人，思想家、哲学家”。<sup>③</sup>因此“子”就是“具有高度智慧和丰富知识的人”，当然也就是智者。以诗歌来翻译《道德经》的В.佩列列申在老子的名字后面也附上了“Старый Мудрец”的解释，<sup>④</sup>区别仅仅在于他将Мудрец（智者）大写，前面的形容词略有不同。因此在俄罗斯的汉学家看来，“老子”具有“年迈的智者”的意思。将老子的“子”解释为“智者”并不是当今俄罗斯汉学家的发明，其实他们是有所承继的。1910年列·托尔斯泰选编了老子语录（即《道德经》中的有关内容）将它编辑出版，其封面印着几行字：“Изре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мудреца Лао-Тзе”（中国智者老子语录），还印有老子骑青牛图。<sup>⑤</sup>可见在托尔斯泰时代，就有了将老子视为中国智者说法。这里有个有趣的对比。在西方汉学界有学者对“老子”的解释与俄罗斯汉学家正好相反。霍姆斯·韦尔奇（Holmes Welch）的《道的分歧》（Taoism: the parting of the Way）前面有老子小传，霍姆斯·韦尔奇称，“他母亲在吞了一颗星星之后，怀孕长达六十二年（原文有误——引者注）之久，他出生时就会说话，他指着李树说：‘就此树为我的姓。’他就姓李树的李——因为他的耳垂很大，就叫‘耳’——就这样成了李耳。同时他的头发确实雪白，很多人就称他为‘老子’，那意思是‘老孩儿’”。<sup>⑥</sup>其实在俄罗斯也有类似的说法，《中国宗教文选》的作者在介绍道教的时候说：“在古代老子就成了半神话式的人物，他的号（老子的意思是年迈的智者，甚至是年迈的婴儿）开启了神话创作的广阔的可能性。”<sup>⑦</sup>“年迈的智者”与“年迈的婴儿”的说法是截然对立的，哪一种更接近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老子呢？

我们可以看看在中国文化典籍对中老子的姓名有什么说法。《太平广记》卷一神仙传第一位立传的“神仙”就是老子，其中说到老子名字的来历采取了若干种说法：“或云：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或云：其母无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看来霍姆斯·韦尔奇的说法与此接近。“生而白首”与俄罗

①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М.Титаренко, Москва, 1994, С.159.

② С.И.Ожеков.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63, С.355.

③ Большо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С.Кузнецо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1, С.561.

④ В.В.Перешин. Дао Дэ Цзин. Опыт стихотвор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0, №3.

⑤ А.Шифман. Л.Толстий и Восток.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0.

⑥ Holmes Welch, *Taoism: the parting of the Way*, Boston, 1966, p.1.

⑦ Религия Кит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1, С.12.

斯汉学家用“Престарелый”或“Старый”有点干系。那么“年迈的智者”的说法是否还可以从别的中国的文献中可以找到依据呢？《初学记》卷二十三收录唐徐坚撰《道德经序诀》曰：老子“周时复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与此相近似，然而加入了新内容：“惟老氏乎周时，复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老子之号，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无衰老之期，故曰‘老子’。”看来，在中国的语境中，老子的“老”确实是从“生即皓然”或“生而白首”而来的，但“子”却是儿子的意思，暗含年轻之意。《广韵·止韵》：“子，子息。”《仪礼·丧服》：“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因此，“老子”在古代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指他是个头发雪白、面容像婴儿的人。同时我在我国古人关于老子的文献或传说中没有发现直接将“子”解释为尊者或智者的例子。俄罗斯汉学家对“老子”的“子”的解释，可能源于我国其他文献中对“子”的解释。《康熙字典》：“男子之通称，颜师古曰：‘子者，人之嘉称，故凡成德谓之君子。’王肃曰：‘子者，有德有爵之通称。’”其实看看《论语》及其注疏，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了。《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邢昺疏：“子者，古人称师曰子……后人称其先师之言，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为师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类是也。若非己师，而称他有德者，则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类是也。”可见在这个意义上，“子”恰好对应于俄罗斯的“Мудрец”。以此观之，俄罗斯汉学家将老子的“子”称为“智者”，是从我国古人以“子”尊称“有德者”的习俗引申过去的。老子是“年迈的智者”的表述不是直接翻译来的，而是俄罗斯汉学家“嫁接”中国文化知识的结果，是俄罗斯式的套话。这个套话被俄罗斯汉学家推广到一系列中国历史人物身上，由此他们建构了“中国智者”乌托邦。20世纪90年代，甚至在俄罗斯民间和俄罗斯作家中，也形成了阅读崇拜“中国智者”的“情结”。

俄罗斯人对老子的兴趣是比较浓的。以《道德经》为例，1892年Д.科尼西（Д.Кониси）教授成了《道德经》的第一位俄译者，其后就是1910年托尔斯泰的译本。1912年出版了象征派诗人К.巴尔蒙特以诗歌形式翻译的《道德经》。1950年苏联科学院出版了一个译得很准确的本子，译者是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杨心顺（音，Ян Хиншун）。90年代以后，老子似乎更受关注。《远东问题》1990年第3期发表了佩列列申发表的《道德经》，也是以诗歌的形式译的。Г.麦里霍夫为此译文写了一篇情感激荡的序言：“《道德经》是诞生于公元前4—3世纪的伟大中国文化的富有诗意的哲学经典。她侧身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全世界、全人类意义的文学艺术、哲学诗学作品之列，与《伊利亚特》、《奥德赛》、《诗经》和《伊戈尔远征记》等比肩而立。”<sup>①</sup>2001圣彼得堡出版的《宗教文选》也收录了以诗歌方式译的《道德经》的前二十八章。

① Г.Мелихов. Лао-Цз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0, №3.

## 二、君王—智者（Провитель-мудрец）形象

苏联/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有一个栏目叫“传统、风俗博物馆”。这个栏目从1991年第3期起连载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理论问题研究部主任瓦西里耶夫教授的系列文章《中国古代的英雄和智者》（Герои и мудрецы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瓦西里耶夫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君王—智者（правители-мудрецы），这个概念以及它所涵盖的人物，是不同寻常的，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瓦西里耶夫不是半瓶子醋式的写作者，他在第一篇文章中描绘了中国远古的尧、舜、禹三帝，他依据的是《尚书》的《尧典》、《舜典》和《大禹谟·皋陶谟》，还参照了《史记》和袁珂的《中国神话》。他认为在中国的典籍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典范的行政结构。他分别论述了尧舜禹的政绩对这个行政结构的贡献。文章对言及尧的功德，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尧倍受崇敬，光被四表，胸怀儒雅，心襟坦荡，致力和平，以至称颂其德之声遍于四方。他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昭明百姓，协和万邦，由此达至繁荣和谐之盛世。当此之际，尧授命臣下仰观天、日、星，制定历法（核定日、月、年）。王天下七十年后，尧方思谋继嗣。”<sup>①</sup>接着瓦西里耶夫描述了尧废不肖子，以二女下嫁舜，考验舜，传位舜的行为。其后有叙述舜的德行：他顺利摄政，继续关注天象历法，“献祭品于‘上’（已故者，умершие）、先祖（上帝，шан-ди）及其他诸神，他定期巡行和视察四方，五年里他视察完了一遍，各地君主四度去朝贡他。臣属向他报告治理的结果，并因政绩得到他的赏赐。舜确立了十二州，制定了刑法。”

②

在叙述完三帝的政绩对行政结构的贡献后，瓦西里耶夫提出了他对这段历史的解读：“我们注意到《尚书》和司马迁的文本中所叙述的事件的实质。在我们面前，全是刚毅而辛勤的治理人民的伟大而睿智的君王的丰功伟绩。……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中除此而外别无其他。在这个框架中一切都是推测出来的——统治天下，安抚四邻，大规模的中央集权机构，精心筹划的十二个州的外省结构，众多助手分担行政官僚机构，君王为奖掖忠良惩罚顽劣而定期巡狩四方。假如这一切都曾有过，或者大致有过这样的情形，那么它不是在尧舜禹的时代，而是在周朝的初期，即周朝的统治者还有足够权威的时候。正是在这一点上，这种行政结构的人为性十分明显：奠定了明智统治天下的基础的古代睿智君王的全部历史被创造出来，恰恰是一方面要巩固周

① Л. Л. Васильев. Герои и мудрецы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3.

② 同上注。



天子的权威，另一方面要在教训的意义上支持关于天命的宗族决定论的观点。”<sup>①</sup>

瓦西里耶夫还指出：“创造了这样的根本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说的天才的结构的周朝的史家不仅是孔子的先辈，而且是作为系统观点的儒家学说的前驱。孔子本人由衷的赞美决非偶然：‘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孔子对尧舜禹的赞美不是礼节性的夸张。决不是！孔子这几句话在中国开启了对这三位伟大睿智的君王的崇拜。同孔子接踵而至的是中国古代第二位伟大哲学家孟子的赞叹。这是后来的古代中国的政治活动家、改革家和智者的著作的共同点。更进一步说，尧舜禹成了君王睿智、仁慈、道德、统治天下和人民的典范，最终是伟大睿智、贤德和完美的典范。”A. 戈布泽夫在他的《儒家学说》中也指出，通过《尚书》、《诗经》等历史著述和艺术作品，孔子将具有圣人睿智的半神话时代的古代君王们特意加以美化。<sup>②</sup>

对尧舜禹作为智者的强调，对他们的睿智的肯定，是瓦西里耶夫这篇文章的一大特点。我统计的结果是：在这篇文章中用“睿智的”（мудрый）5次；“智者”（мудрец）3次（其中一次是上引文中的“后来古代中国的智者”，即称呼尧舜禹为“智者”2次）；“睿智”（мудрость）3次（在上面的引文中就出现了2次）。考量俄罗斯文本，以智者来称呼俄罗斯古代君王是比较罕见的现象。斯茨列茨基绘制的《13世纪初期以前的俄罗斯诸侯世袭表》中的79位诸侯，只有雅罗斯拉夫被称为“智者”（Мудрец）。<sup>③</sup>智者雅罗斯拉夫（978—1045）是基辅罗斯的基辅大公，在他统治时期开始草拟《俄罗斯法典》，法典的第一部就命名为《雅罗斯拉夫法典》。

俄罗斯对中国古代君王—智者形象的建构可能与从古希腊以来欧洲人对哲学家—国王的向往有关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了可能出现太平盛世前提：“只有……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到达完善。”<sup>④</sup>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728年在德国马堡大学发表了一次题为《哲人王与哲人政治》的演说，这篇演说以中国的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为例，

---

① 瓦西里耶夫的这种观点姑妄听之，仅仅是他的猜测而已。王记录：“《尚书》史学价值再认识”（《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4期）指出：“《尚书》对历史盛衰的考察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反映出三代以至春秋时期人们历史总结意识的发展。《尚书》记言、记事的体裁形式引起后世史家的注意，被后世史家改造发展。”

②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149. “儒家学说”是戈布泽夫为该书撰写的词条。

③ 参见李锡胤注译《伊戈尔出征记》所附“罗斯诸侯世袭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④ 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1页。

证明哲学对完善已建立的社会政体是必要的：“中国最初的三个帝王，伏羲、神农、黄帝，创建了中国的哲人政府模式。当时它远比世界上其他模式先进，它的繁荣昌盛持续了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其他的君主制国家则早已寿终正寝。”我甚至怀疑，瓦西里耶夫是有意与 200 多年前的沃尔夫对话，理由如次：首先，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往往会被同时提及，但在瓦西里耶夫的文章中仅仅将伏羲、神农、黄帝作为文章的引子，而集中分析尧舜禹，恐怕是因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关于三皇的文章已经被沃尔夫做了，故另辟蹊径。其次，沃尔夫讨论的重点是中国远古的政治体制，而瓦西里耶夫研究的也是尧舜禹对行政机构的贡献，当然他认为这种机构是周初史家的想像。为什么瓦西里耶夫恰恰对先王的此类贡献予以特别的关注，原因下文将会涉及到。

### 三、汉学家的春秋笔法

20 世纪 90 年代在俄罗斯形成的中国智者孔子的形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90 年代，俄罗斯人中出现了对孔子的大规模的接受，而且是包含着热度来接受，这其中也许存在着有意识的文化误读。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智者，‘儒家’哲学学派的奠基人”。<sup>①</sup>俄罗斯学者对孔子、对《论语》的翻译研究代有人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翻译和研究成果不断问世。B. 瓦西里耶夫院士在 1868 年翻译了《论语》，收录于他自己的《中国读本》集子中。П. 波波夫（柏百福，1886 年任驻北京总领事，1890 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10 在圣彼得堡出版《孔子及其学生和其他人语录》。1923 年，B. 阿列克谢耶夫（即后来所谓阿翰林，因他当选为院士）在俄罗斯的《东方》辑刊发表《孔子学说在中国的综合研究》（Учение Конфуц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интезе）。1982 年，莫斯科出版多人集《儒家学说在中国》。A. 戈布泽夫 1986 年在莫斯科出版《伟大的学说——孔子教义问答》。1987 年，И. 谢缅年科在莫斯科出版《孔子格言》。90 年代以来，俄罗斯翻译出版有关孔子的著作数量剧增，印数也相当可观。1991 年Л. 佩列洛莫夫在《远东问题》连载长篇文章《孔子传记》。B. 马良文有专著《孔子》，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1992 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印数 15 万。Л. 佩列洛莫夫（稽辽拉）1992 年在莫斯科出版《孔子言论》；次年他在莫斯科还出版了《孔子生平、学说和命运》。B. 尤尔丘克 1998 年在莫斯科出版《孔子：生平、学说、思想、语录、格言》。2000 年，作为“世界遗产”，莫斯科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儒家学说》两卷，第一卷是《论语》，第二卷是《孟子·荀

<sup>①</sup> В.Клепиков. Конфуций — выдающийся педагог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http://www.itop.ru/publ/Klepikov.html>

子》。2001年重印П.波波夫(柏百福)译的《论语》(原译名为《孔子及其学生和其他人语录》)。2002年И.谢缅年科和А.什图金在莫斯科出版《孔子:睿智的教益》。В.克里夫佐夫在网上发表《论语》译文。<sup>①</sup>

学者的翻译、研究是被读者市场拉动的。由儒释道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同比例地被俄罗斯接受。老子在90年代被俄罗斯接受的情况前文已经作了介绍,完全不敌孔子,道家的东西有一点,但不温不火。佛教的东西有从中国传过去的,也有从日本传过去的,也远不及孔子那么受青睐。关注孔子,也不是对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普遍关心,而更注重《论语》。在90年代之前,俄罗斯人关注孔子,可能对文化性的问题更留意。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在1807年中国旅行日记中说:“儒家学说给了中国历史、文化意识……每一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对中国文化而言,对书面语言的崇拜是颇具特色的。中国的文——是整个中国精神文化的基础。在孔子看来,文是高度智慧(мудрость)的最高表现,是最完善的语言,它把最古老的绝对真理的思想传达给了现代人。”<sup>②</sup>阿翰林从孔子学说的众多关键词中拈出了两个字,一曰“文”,二曰“智”,这与他当时作为法国汉学家沙畹中国考察队的成员,热衷于搜集研究中国的钱币和拓片的纯学者身份大有关系。

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介绍孔子学说的各个领域的同时,似乎都对他的治理国家的学说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恰好在90年代初,Л.佩列洛莫夫发表了《孔子传记》,在总结孔子人生成就的时候,他写下了以下一大段文字:

在(与齐景公的)谈话中涉及到“政”的概念——照字面讲就是“治国艺术”、“治理的要害”、“政治的本质”。当今的研究者不禁要将“政”称之为最佳的“政治艺术”,因为他们的兴趣首先要归结为理解和掌握有效治理的机制。

孔子的第一次回答,广大读者都知道,因为它必定出现在中国和外国有关孔子的文章中,但是第二次谈话不知道为什么所受到的关注就少得多。大概因为回答过于简略,但是在这里,孔子恰恰以简约的形式表达了他治国御民的洞见。

我们征引司马迁叙述的两次谈话的文本:

1、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

<sup>①</sup> 刘亚丁的《风雨俄罗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4-295页提到的两件事也可以旁证孔子近年在俄罗斯所受到特殊关注:“2001年秋天大汉学家李福清对我说:彼得堡的‘水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特殊的《论语》译本,每一句话都有五位译者的五种译法,译者中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这样的大汉学家。第一次印了一万本,他以为卖不完,可是很快就卖完了。第二年又印了一万。2002年春天我自己去参观离莫斯科100多公里远的谢尔基圣三一教堂,教堂前的广场上有很多摆地摊卖纪念品的小贩。一个卖俄罗斯漆器工艺品的男子问我:‘是中国人吧?’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对我说:‘我非常崇拜孔夫子,他是最聪明的人。’然后给我说起了大致相当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类的话。”

<sup>②</sup> В.Алексеев. 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Дневники путешестая 1907г. Москва, 1958, СС.301-302.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2、他日又复问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

司马迁在叙述第二次回答的时候用了“节财”，望文生义就是“节约财富”。但是“财”或“财富”绝不是指金银财宝。孔子用这个概念来指称国家的全部财富——首先是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源。握有支配这一财富的最高权力的政治家（Политик）应该专心致志、精打细算，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耗尽国家的财富。<sup>①</sup>

读这样的文字，不能不联想到作者写作的环境，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环境。当他写下大写的政治家的时候，能指和所指的分离，时间和空间的跳跃都是巨大的。齐景公就身份和时代来说，都与政治家（Политик）毫无干系。只可惜政治家没有时间和心思来解读汉学家的春秋笔法。这位汉学家毕竟借孔夫子的酒杯浇了郁结于自己心中的块垒。A. 戈布泽夫在 90 年代末撰写了《儒家学说》（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他同样花了很多笔墨来介绍孔子关于天子、国家和人民及其关系的言论。<sup>②</sup>

#### 四、作家笔下的中国智者

1989 年，定居莫斯科的阿布哈兹族作家法·伊斯坎德尔出版了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契革木的桑德罗》。1990 年，他凭借此书获得了苏联国家文学奖。该小说第一卷有一章为《哈布加老爹骡子的故事》，这里，骡子转述了他听到科尔切卢茨基对哈布加老爹讲的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中国皇帝特使的离奇故事，其略云：

中国皇帝得知我们的布尔舍乌瑟（Большеусый）杀了沙皇尼古拉和他的妻小。声称要停止向我们供应茶叶。布尔舍乌瑟谎称，沙皇同家人一起住在克里姆林宫。于是中国皇帝派心腹特使到克里姆林宫。人们给他看了一个无论从哪面看都像沙皇尼古拉的人，还有皇后和几位王子。中国特使打量了他们半晌，又特别仔细地打量了几个孩子。问像沙皇的人：“你真有把握，这些是你的孩子？”。像沙皇的人好像受了冤屈。此时中国人对布尔舍乌瑟的下属言道：“沙皇在十五年中不变老，你们可以说斯大林为他安排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你们怎么解释十五年间几个王子丝毫不见长大呢？”就这样，中国特使看出了破绽：他们都是契卡装扮的。他们想贿赂他。他严词拒绝。他们又说：我们就杀了你，然后派一个苏联的中国人去，他会向皇帝说我们想让他说的话。中国皇帝会相信他，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长一个模样。中国特使含笑答道：“我的睿智的中国皇上(мудрый китайский царь)早就预见到你们会杀

① Л.Переломов.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Конфуция( II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4.

②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С. 149—150.

我，他派我来时曾口授暗语，我回宫朝见时要对答的。”<sup>①</sup>

《契草木的桑德罗》满纸荒唐言，故事也不乏滑稽突兀，它是阿布哈兹族作家伊斯坎德尔为 20 世纪苏联/俄罗斯历史树立的一面哈哈镜。<sup>②</sup>伊斯坎德尔将中国皇帝的特使塑造成了中国智者，他的机智果敢与布尔舍乌瑟们的愚钝颞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中国皇帝也是睿智的（мудрый），这似乎与上文的君王—智者尧舜禹形成了呼应。小说的深层结构似乎不难窥见：中国睿智的皇帝与聪明的智者—使者是一极，另一极则是愚不可及的布尔舍乌瑟及其下属。居于他们之间的则是第一叙述者，阿布哈兹农夫科尔切卢茨基。他的讲述方式——动词都用的未完成体现在时（这是及时性的、现场感很强的用法），似乎使他成了是这场交锋的旁观者，他冷眼旁观，洞穿一切，超越两造，成了更高的智者。第二叙述者则是哈布加老爹的骡子——毕竟不失滑稽风格。可是骡子在转述那故事前发了句酷似格言的牢骚：“世界生成如此，叫你无可奈何——睿智总毁于邻人不知感恩”（Но ничего не поделаешь, так устроен этот мир——мудрость всегда обречена на не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окружающих），真让笔者失去了赞颂中国智者的勇气，区区含灵，一只骡子居然把十方神圣，天下智者都给盖了，教你只能佩服阿布兹人伊斯坎德尔的聪明。

伊斯坎德尔只是写出了寓言主人公式的“中国智者”，他对中国的了解毕竟皮相。在世纪交替的时候，一些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已然深入实质。俄罗斯当红作家В.佩列文的《苏联太守传》就是明证。小说写得煞是怪诞，中国农民张七梦见自己到苏联首都莫斯科做了高官，娶妻生子，好不风光，而从梦中醒来却看到了自家仓库里的一个蚂蚁穴。<sup>③</sup>迷者自迷，悟者自悟。作品的主人公张七，迷恋于尘世间的种种荣华富贵，到头来只是竹篮打水。中国智者的形象出现在小说煞尾：“华州党委季昭同志有云：‘可以倾国的功名、财富、高位、权势，在智者看来，不过是蚁群而已。’”

读此奇文，我们似乎又被抛进了博尔赫斯那小径分岔的花园。佩列文的灵感大概来自唐代李公佐的《南柯记》（一作《南柯太守传》）。此传奇小说略云：淳于棼宦途失意，醉后入梦，到了大槐安国，国王以女妻之，并封其为南柯太守。棼廉能称职，显赫一时。后檀萝国来伐，王命棼征之，交战即败，单身只骑逃回，公主亦谢世。于是宠衰谗起，被国王遣送出国。淳于棼醒后惊异，寻踪发掘，始知槐安国是槐树下之蚁穴，南柯郡则是槐树南枝下的小蚁穴，从此深叹人生虚幻，乃遁入道门。<sup>④</sup>古老的中国故事 20 世纪末在俄国被激活，佩列文并非为发思古之幽情。“华州

① Ф. Искандер Сандро из Чегема, Москва, 1989, Т.1, С.292-297.

② 参见：刘亚丁：《苏联文学沉思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09-226 页。

③ В.Пелевин СССР Тайшоу Чжуань, В книге «Встроенный напоминатель», Москва, 2002, С. 21-38.《俄罗斯文艺》2003 年第 2 期发表译文题为《一个中国人的俄国南柯梦》。

④ [唐]李公佐：“南柯记”，《旧小说》，乙集二册，第 45—50 页。

党委季昭同志有云”其实就是《南柯记》末尾“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的俄罗斯翻版，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华州（Хуачжоу）的地名也许不是信手拈来的，当有其寓意。道教名籍《云笈七签》卷二十七云：“第四西岳华山洞，周回三百里，名曰‘忽仙洞天’，在华州华阴县，真人惠车子主之。”原来华山洞乃道教名山三十六小洞天之一。涵养神仙洞天的华州与汲汲于功名利禄的长安莫斯科何啻霄壤，因此李肇季昭们才能说出这般大彻大悟的话来。与前面儒家所赞美的叱咤风云吞吐宇宙的君王—智者相对比，佩列文首肯的是道家的潇洒出尘。佩列文还声称其《夏伯阳与普斯托塔》（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sup>①</sup>很有佛教色彩。在这里所用虚无（пустота）一词恰恰就是主人公的姓氏普斯托塔（Пустота）。佩氏何其饕餮，道家的出世和释子的虚无尽皆揽作彀核。

这两篇作品中的中国智者，或智胜苏联同行，或嘲笑尘世荣华，从中可以体会到俄苏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仰慕或超越的意向。

## 五、余 论

从老子—“智者”套话的产生、先秦三帝的智者形象、孔子—智者形象和虚构作品中的中国智者形象等方面着眼，可以看到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人在集体建构着中国智者的形象，这是一种被美化的乌托邦。这种集体想象背后具有复杂的社会和心理的原因。

首先，90 年代俄罗斯出现了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退席的现实。社会价值观念失范，导致严峻的社会、心理危机。当整个社会的主体信仰缺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会产生重建价值观念的社会使命意识。价值观念重建的时候要调动激活各种精神资源。在此过程中，激活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资源，东正教的复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也纷纷涌现，如自由主义思想、西方化的思潮、欧亚主义的思潮等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在部分俄罗斯人中，比如汉学家（但远远不只是汉学家，还有大量的普通读者），产生了亲近感（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那种重建价值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举动，大概也给了他们理论资源以外的精神动力）。在 90 年代前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的学术界曾探讨了东亚地区若干国家经济腾飞的原因，他们认为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是东亚若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Б. 波斯佩洛夫在《作为经济发展事实的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综合》中全面研究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日本以

---

<sup>①</sup> В.Пелевин. 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 Москва, 2001.

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成就，预计到 2000 年这一地区将达到两亿人口，占世界工业产品的 20%。他介绍了儒家文化处理人际关系和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仁、义、孝、忠、礼，认为它们具有现代价值，他分别分析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影响的状况，指出“在西方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的影响下，儒家观点的体系发生了变革。在日本、南朝鲜、中国，这种变革的形态不同，但是应该指出，恰恰是在东亚大多数国家，两种社会文化互相影响的结果形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最重要的因素，这种工业文明被称为‘人性化的事实’，保障这些国家步入了经济发达的前列。”<sup>①</sup>这就为俄罗斯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国智者形象提供了现实的动力。

其次，19 世纪 20 年代作为调解西方派和斯拉夫的尖锐矛盾出现在俄罗斯侨民中的欧亚主义，在 90 年代被重新激活。新欧亚主义的倡导者关注地缘政治，在经济上对环太平洋诸国联合开发东亚寄托希望，希望借此振兴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在文化上则采取多元并存的策略。<sup>②</sup>这也为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建构中国形象提供了精神空间。

最后，文化传播中的互补原则也起着潜在的作用。做国际双边贸易的人讲究“互通有无”，出口对方缺乏的本国的特产，购进本国缺乏的对方的特产，这样就能签其大单，畅其物流。其实在文化交流中这个原理在自发地调节着“国际智力贸易”。中国智者、中国传统文化对一些俄罗斯人有诱惑力，其原因，大概正出于文化上的“互通有无”：俄国有文字的历史过于短暂，只能追溯到公元 10 世纪（公元 10 世纪后期，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这两位希腊传教士创造了斯拉夫字母，俄罗斯始有文字）。因此俄罗斯未见 9 世纪前的古圣先贤给予嗣留下睿智明训，而这恰恰就是中国文化之所长。<sup>③</sup>90 年代以来俄罗斯对中国智者形象的建构也是一种“取长补短”的策略在起作用。

---

**【Abstract】** The Russian Sinologists' stereotyped expression of “Laozi—the aged wisdom” was produced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misreading;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king—the wisdom” in China implies the Russian ideal of “the philosopher—the king”; their praise of Confucius's political strategies metaphorized into the political texts at that

---

① Б.Поспелов. Ситез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 как факто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5.

② А.Мурадян.Евразий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модел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 2, 3.

③ 参见刘亚丁“‘中国好奇’与‘拾遗补阙’”，载《俄罗斯文艺》2004 年 2 期。

time; the Russian writers portray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wisdom reflecting the intension of admiring and surpass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wisdom in Russia in the 1990s is the “social imagi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which is relevant to 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the activation of Eurasianism, the lack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remote antiquity in Russia at that time.

**【Key Words】** Image, Chinese Sages, Russian Sinologists, Russian writers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образ, китайские мудрецы, российские китаеведы,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

(责任编辑 常喆)

(上接封 3)

- 俄国家杜马对俄 2009 年预算案做出修改。
- 16 日 俄罗斯宣布结束车臣长达数年的反恐行动。  
俄常驻北约 (NATO) 代表罗戈津 (Dmitry Rogozin) 要求北约取消五月在格鲁吉亚举行系列军演的计划。
- 17 日 俄罗斯海军表示愿意与美国展开合作打击索马里海盗。
- 21 日 俄罗斯与中国签署石油合作协议, 协议内容包括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eft) 和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 (Transneft) 提供 250 亿美元贷款。
- 22 日 乌克兰宣布, 由于今年第一季度欧洲消费减少, 导致俄罗斯石油传输量减少 50%。
- 23 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朝鲜外务长会面后表示, 朝鲜半岛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 26 日 俄反对党认为“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帕克霍莫夫 (Anatoli Pakhomov) 赢得索契市长选举的背后存在舞弊行为。
- 28 日 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无意批准《能源宪章》。  
乌克兰国家油气公司表示, 今年第二季度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的价格将从每千立方米 350 美元下降到 270 美元。
- 29 日 俄总理普京在与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 (Yulia Tymoshenko) 举行会谈时表示, 俄罗斯无意控制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 而是寻求建立由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伙伴”共同参与的天然气管道联盟。季莫申科邀请俄罗斯参与升级乌克兰天然气管道系统。
- 30 日 俄副总理谢钦称《能源宪章》“不可行”。  
俄谴责北约“无故”驱逐两名俄罗斯外交官。  
俄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签署协议, 同意为二者提供“国家边境”防卫, 直到其拥有自身的边境防卫体系。

(于璐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2009年3-4月)

## 3月

- 1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表示计划在综合考虑生产国、消费国和运输国利益的基础上拟定新《能源宪章》(Energy Charter)。
- 2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表示,不应单纯延长《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1),必须制定新条约以维持既有的“良好机制”。
- 3日 在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出访西班牙期间,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与西班牙天然气公司(Gas Natural)签署供气协议。  
俄联邦原子能机构(Rosatom)与德国西门子(Siemens)签署共建核电站的协议。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Yushenko)的支持者称,乌外长弗拉基米尔·奥格雷兹科(Volodymyr Ohryzko)的撤职与俄罗斯背后操纵有关。
- 4日 俄卫生和社会发展部部长戈莉科娃(Tatiana Golikova)表示,全国待就业人数约为600万,登记失业人数为200万。
- 5日 Gazprom宣布将在塞尔维亚开设自己的银行Gazprombank,主要职能是处理其为重建塞尔维亚石油工业部门的7亿欧元投资。  
Gazprom证实,乌克兰已还清其所有天然气欠款。
- 7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伊朗核计划与美国反导部署无关。
- 9日 俄罗斯总统助理德沃科维奇(Arkadi Dvorkovich)称,俄无国有化计划。
- 11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要求地方官员着力重点解决食品价格和失业问题。
- 12日 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形容已看到经济复苏的“嫩枝”(green shoots)。  
俄外长拉夫罗夫抵达阿塞拜疆,与阿总统阿利耶夫(Ilham Aliyev)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以及里海局势问题进行磋商。
- 15日 俄副总理谢钦(Igor Sechin)在欧佩克(OPEC)维也纳会议上要求获得特别观察员身份,但又明确表示俄不会加入欧佩克。  
俄罗斯和伊朗签署一份关于石油天然气合作备忘录,涉及两国合作向第三世界国家供应能源问题。
- 17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谴责拉脱维亚当局与新纳粹主义分子勾结。  
俄总理普京(Vladimir Putin)与蒙古总理桑吉·巴雅尔(Sanjaa Bayar)商谈合作事宜,并承诺向蒙古提供3亿美元贷款支持其农业发展。  
俄外交部表示,不应应对朝鲜发射卫星做出过度反应。
- 18日 摩尔多瓦总统沃罗宁(Vladimir Voronin)、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Transdnestr)当局领导人斯米尔诺夫(Igor Smirnov)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声明,承诺继续为协商解决德左冲突互通有无。  
俄否认向中东国家,包括伊朗,供应S-300空防导弹。
- 19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就能源合作和联合应对金融危机等问题举行磋商。
- 20日 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证实,俄计划再为白俄提供5亿美元贷款,但首先必须对本国财政预算进行审议。

-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通过一项法案，同意授予地方罢免市长的权力，并许可政党提名官员。
- 23 日 欧盟和乌克兰达成共同完成乌克兰输气管道系统现代化的协议。俄罗斯批评该协议具有“政治意图”，且“从经济角度看，荒诞不稽”。
- 24 日 由于乌克兰单方面与欧盟合作升级其输气系统，俄决定中止与其政府间对话。  
俄地区发展部长巴萨尔金（Viktor Basargin）表示，俄半数城镇都受到了经济危机冲击。  
俄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表示，俄已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修订。
- 26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车臣局势已区域正常化，安全限制状态可相机解除。
- 27 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愿意与北约合作解决阿富汗问题。
- 30 日 普京参观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公司(AvtoVAZ)工厂，表示国家将为其提供 3000 万美元的扶助资金。
- 31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会见独联体各国财长时表示，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平衡”的储备货币体系。  
Gazprom 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Nord Stream）将如期投建，并称欧盟与乌克兰签署的天然气协议是对俄罗斯的“不负责和不友善”。

#### 4 月

- 1 日 Gazprom 与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签署协议，计划展开能源开采合作。
- 2 日 俄政府组建隶属总检察长办公室（Prosecutor-General's Office）的新部门，负责监察非法商业活动。
- 3 日 阿塞拜疆外长马梅德亚罗夫（Elmar Mammadyarov）表示，阿塞拜疆石油公司（SOCAR）与 Gazprom 上月签署的天然气合作协议不会对纳布科（Nabucco）项目产生影响。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呼吁俄罗斯银行家与政府展开建设性对话。  
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表示，俄已向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EC）提供了 100 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因此俄暂时不会加入 G-20 推出的 1.1 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 4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呼吁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  
车臣总统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表示，因 2003 年 3 月即作出从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决定，今后不再允许任何人谈及“车臣独立”。
- 7 日 乌克兰国家油气公司（Naftogaz Ukrainy）证实，将遵守与 Gazprom 在今年 1 月签署的天然气过境运输协议。
- 9 日 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对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原因各执一词，前者指责错在 Gazprom 单边减少供应，后者则指是技术原因。  
Gazprom 表示，未来四到五年内俄天然气产量将缩减 10%。
- 10 日 俄总理普京会见伊拉克总理马利基（Nuri al-Maliki）时表示，俄已准备好与伊展开经济合作。
- 11 日 俄卢克石油公司（Lukoil）总裁阿列克佩罗夫（Vagit Alekperov）表示，该公司已准备恢复实施开发西古尔纳-2 油田的合同。
- 15 日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三国就里海大陆架（Caspian shelf）北部分界和开发问题签署协议。  
俄总理普京承诺将继续为白俄罗斯提供贷款。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09 年第 3 期

(总第 157 期)

## 《俄罗斯研究》刊期变更启事

经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沪新出报[2007]33号),从2007年起,《俄罗斯研究》的刊期由此前的季刊变更为双月刊,逢双月23日出刊,其他项目保持不变。

改为双月刊以后,《俄罗斯研究》杂志社将进一步注重刊物的刊发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以期为关心国际关系及俄罗斯问题的各界人士提供更切实有效的服务。

《俄罗斯研究》以研究和介绍俄罗斯现状问题与信息为重点,反映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兼及历史、文化等领域和相关的东欧中亚研究,目前设有“专论”、“政治·社会”、“经济”、“国际关系”、“斯拉夫欧亚”、“苏联时期·苏共”、“历史·文化”、“书评”和“学术动态”等栏目。

本刊热忱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得到广大作者、读者和专家的帮助与支持。同时,提请各位投稿者关注本刊的有关规范,可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

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mailto: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http://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http://www.qikan.com.cn)

ISSN 1009-721X

CN31-1843/D

定价: 8.00 元